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近代后期经济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本书以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为主线，充分反映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东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过程，较翔实地记述了世界主要区域和民族的经济史实。全书从资本扩张的必然性出发，客观、全面反映与评价世界近代后期经济发展历程，注重反映多年来学术成果的同时，侧重突出学术研究上的整体性，因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融资料性和学术性为一体。

世界近代后期经济史

一、概述

世界近代后期经济史是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运动和东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为特征的。

1790—1815年，法国革命和分裂欧洲战争随着拿破仑的失败和1815年维也纳和约的签订已成为过去，而从英国开始的另一场革命却在全球如火如荼。这场革命主要是经济性的革命，即涉及到财富创造、制造技术、资源开发以及资本形成等多方面。通过这场革命，建立和扩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在工业化进程中壮大、产业革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迅速增长并向世界扩散。西方近代后期经济历史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成熟时期（1816—1850）和资本主义经济高涨时期（1850—1872）两个阶段。

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价格低廉的商品，加上刀枪火炮，摧毁一切抵御外国入侵的万里长城和一道又一道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从亚洲、非洲、大洋洲到拉丁美洲，它迫使一切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资本主义强国利用经济上的优势，用价格低廉的商品和自由贸易的手段，把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变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东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当中国、印度等国家还停留在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阶段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并积极向东方扩张。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巩固了对印度的殖民地经济地位后，于1840年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获得了开放商港、在长江自由通航、给予外侨治外法权等特殊利益；美国、法国在“一体均沾”的要求下与清政府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40—1894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初步形成。

1.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

18世纪末在英国开始建立的“工厂制度”，到19世纪不仅在英国本土，而且在法国、瑞士、比利时、德国及美国等国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据门德尔逊的研究：“1821年，英国全国家庭中，从事农业的只占33%，从事工商业的却占了48%。”世界工业发展的年增长率以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发展中所占比重情况，揭示了西方近代后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

据W·W.罗斯托的研究：1705—1785年，世界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1780—1830年达到2.6，1830—1840年达到2.9，而1840—1860年达到3.5，1860—1870年达到2.9。

世界工业生产

表 1-1

（单位：百分比）

年份	大不列颠	法国	德国	欧洲其他国家	美国
1820	24	20	15	37	4
1840	21	18	17	38	5
1860	21	16	15	34	14

资料来源：罗斯托《世界经济》第 52—53 页

19 世纪期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是通过机械化工业的建立而扩展的。大机器工业生产使商品价格不断下降，从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败竞争对手，夺取工业垄断地位。产业革命以后，大机器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在对外贸易出口的产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1822 年英国的出口贸易（不包括再出口）总计 3700 万英镑，其中：纺织品、金属加工、制革和陶器制品 3000 万英镑，占总计的 81.00%；棉纺织品 1730 万英镑，占总计的 46.70%；毛纺织品 6.50 百万英镑，占总计的 17.60%。大机器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出口比重增加在英国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表 1—2 是英国 1819—1846 年期间棉纺织品的产值和出口值的情况。

英国棉纺织品产值与出口值

表 1—2

产值与出口值	单位	1819 — 1821	1829 — 1831	1844 — 1846
棉纱产值	万英镑/年	10650	21650	52330
棉纱和棉布出口	万英镑/年	7090	14590	37370
出口占产值百分比		6660	6740	7140

资料来源：艾利逊：《大不列颠的棉业》，伦敦 1886 年版，第 59 页

19 世纪初，法国开始了产业革命。它首先是采用英国的棉纺织机器，并发明了丝织机和麻织机。但是，由于拿破仑进行战争，军费开支十分浩大，后来战争又在法国本土上进行，1815 年拿破仑最终彻底失败，从而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延缓了产业革命的进程。20 年代中期，法国逐渐恢复战争的创伤，经济重新活跃起来，加之 1825 年英国废除了关于机器出口的禁令，法国利用有利的好时机，大量输入英国机器，广泛招聘国外各类技术人员，使机器的采用和工厂制度首先在纺织业中得到普遍推广。与此同时，冶金、金属加工、采煤、印刷等工业部门在技术上和生产上，以及规模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里乌的《工业革命》资料：“多尔夫斯·弥格公司在 1834 年有 26000 纺锤；3000 机械织机，120 座印刷台，雇有 4200 名工人；勒克勒佐的施奈特工厂，1812 年雇有 230 名工人，1850 年有 3250 名工人，1870 年有 12500 名工人；洛林的温台尔工厂 1870 年有 9000 名靠工资为生的工人。”法国在 19 世纪中叶的工业发展还体现在工业中使用的蒸汽机迅速增加，1831 年建成了第一条铁路，到 1848 年法国建成的铁路已达 2000 公里。但是，法国的工业部门结构承袭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特点，高级服饰、奢侈品的生产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小工厂在法国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因而，小手工业在法国远远超过大机器生产而占主导地位。此外，法国小农经济普遍存在，

高利贷资本特别发达。因而，法国虽然仅次于英国开始和完成了产业革命，但法国的工业发展比英国要缓慢得多。

西方近代后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最能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杰出代表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从 1815 年起，李嘉图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维护土地贵族利益而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谷物法；1817 年，李嘉图出版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具有科学论点的杰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就是宣扬只有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最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李嘉图的这部著作中找到了反对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因为李嘉图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建议降低粮价和减低租税；李嘉图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绝对进步的自然形式，自由竞争既保证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也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开创了可能性；李嘉图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李嘉图比斯密更为关心资本增殖与财富的分配规律。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基本完成产业革命，它标志英国已经从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变成了机器大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1846 年，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到 1870 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 32%；煤产量、铁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50%；英国的对外贸易额相当于法国、德国、美国的总和，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5%；此外，英国拥有的商船吨位高居各国的首位，相当于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以及俄国商船吨位的总和；伦敦成为世界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各国的公债、公司证券纷纷来伦敦上市；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英国农业生产得到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使英国最早在农业中使用机器，推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业产品产量的提高。英国近代工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使废除谷物法后的英国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自由贸易政策取得“最伟大的胜利，”而且使生产率迅速增长，成为确立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决定因素，使英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

1848 年欧洲革命后，法国资本主义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国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机器大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法国继英国之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法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进入 60 年代以后发展缓慢，相继被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较快的美国、德国超越过去了。

美国于 1776 年 7 月 4 日宣布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在经济上却仍然依赖英国，直到 1812—1814 年的美国争取“产业独立”的第二次英美战争，才使美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经济，开始产业革命的道路。美国的产业革命和英国、法国一样，也是从棉纺织业开始，进而扩展到其它部门。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美国工农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开发西部不发达地区，加强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促进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修筑沟通南北、连接东西水路的大小运河。1825 年建成伊利运

河，使东部的哈得逊河同西部的大湖区联为一体，成为沟通东西部的第一条水路通道。例如，过去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要 20 天，伊利运河的建成使其缩短了 14 天，运输费用从每吨 90~100 美元下降到 9 美元左右。到 1840 年，美国基本上形成一个以运河为主体的水上网络；与此同时，美国的铁路以比水上运输发展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1830 年，美国建成第一条铁路，到 1840 年，美国铁路已初具规模，总长度超过 5000 公里，到 1860 年已建成 50000 公里，担负了全国货运量的 $\frac{2}{3}$ ，1869 年建成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干线，使全国铁路长度超过了 80000 公里。美国农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在产业革命进程中，改良农具、发明农业新机器成为美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一大特点，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马拉的小麦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玉米栽种机等农业机器开始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在 1855 年的国际博览会上，美国的打谷机、收割机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打谷机、收割机而获得大奖。1855 年，美国已有 10000 台收割机在农业机械化进程中发挥效力。1860 年美国农业生产总值比 1800 年增加了五倍以上，发达的农业有力地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美国式道路”的一个典型特征。

在欧洲大陆上继英国、法国后的工业化发展国家是德国。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第二阶段是 50—60 年代；第三阶段是 70—80 年代。与英、法、美等国一样，纺织业在工业化进程中首先成为先进部门。麻纺织业是德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工业，1831 年普鲁士境内有 252000 架麻布织机，其中有 35500 架属于专靠织布为生的麻布织匠；1839 年，普鲁士境内已有 11 个生产亚麻纱的工厂；1846 年，已有 313 个纺纱厂和 750274 个机械纱锭。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境内特别是莱茵河流域已出现了一批工业中心，采矿业、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1834 年，德国 38 个邦国中的 18 个主要邦国联合建立了关税同盟，废除内地关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度，国内市场开始走向统一。产业革命在德国开始了，到 1848 年，德国工业各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新技术和机器；1835 年德国第一条铁路建成，到 1848 年，德国铁路总长度已达到了 2500 公里，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但是，当时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部分，德国的基本政策还是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占 70% 以上，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 以上。1850 年，德国政府颁布法令，把赎买封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农民，1852 年，德国在 38 个邦国中实行关税同盟，这些措施加上 1848 年欧洲革命及英、法工业革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式道路”取得胜利，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从 1850 年至 1870 年，德国产业革命进入高潮，工业资本飞速增长。在这段时间，工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3.5%，煤产量从 690 万吨增加至 3400 万吨，生铁产量从 21 万吨增至 126.10 万吨，铁路线从 5856 公里增至 18876 公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从 21% 提高到 28%，各种不同工业部门大企业的股份公司纷纷创建，在 1851 年至 1870 年期间，仅在普鲁士就创立了 295 个大公司，包括矿山公司、冶金公司、保险公司、铁路公司等，拥有 24 亿马克的资本。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是 50 年代至 70 年代德国工业高涨的典型特征，也是德国能迅速克服落后状况，跻身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重要原因。从 1861 年至 1870 年间，生产资料的生产提高

了 23%，消费资料生产增长 9%，出现生产资料生产快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现象，重工业在德国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中占统治地位。德国的工业化进程的第三阶段是从 1871 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开始的，70 年代至 80 年代，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并开始了德国工业的跳跃式发展。

1867 年 9 月 14 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在德国汉堡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是一划时代的事件。从 16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发展至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从重商主义学说至古典经济理论的演变，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系统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又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西方的其它国家，如荷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家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却落后于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意大利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意大利长期的封建割据以及地中海贸易中心的转移等使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1848 年欧洲革命打击了封建制度，使意大利从 50—60 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在北部的庇蒙特、伦巴底、托斯坎尼等地区，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企业日益增多，尤其以纺织业的发展最为显著。在这段期间，棉织品的产量增加了三倍，毛织品产量增加了二倍，丝织品产量增加了一倍。新的工业部门如冶金和机械制造业也开始建立。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大农场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出现，同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谷物和其它农产品产量的措施也在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领地上应用。1870 年意大利实现了统一，意大利的统一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它能够充分利用英国、美国等国的先进技术和经济成就。意大利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之路，进入产业革命进程。

俄国由于农奴制长期统治着全国的政治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但是，俄国在世界近代历史中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属于欧洲强国之列。尤其是彼得大帝，在其统治期间效仿英、法，大力鼓励和扶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建立使用机器的工厂等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61 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使俄国有条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产业化进程。

2. 东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

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是商品经济发达、自由贸易条件下市场扩大、生产率提高促使封建制度解体的必然结果；而东方的资本主义在其缓慢的萌芽过程中，还经过“外力”的强行影响，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各国在 19 世纪上半叶加紧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外国资本的经济扩张。在亚洲，奥斯曼帝国不能用关税保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8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11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护措施来阻止外国廉价商品在亚洲市场的倾销；马赫穆德二世废除农产品专卖制度，更加有利于外国商人廉价获取原料和粮食，继而将其变成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1838年，英国强行要求土耳其政府签订新的商务协定，规定土耳其只能对进口的外国商品征收值百抽五的关税，并且禁止对任何进出口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外国人有权在帝国境内从事自由贸易；是年，法国和土耳其也签订了类似的协定。这些特权条约的签订，使英国、法国大量商品倾销在土耳其市场，土耳其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扩张和向亚洲扩展的基地和桥梁。1839年，土耳其的“坦志麦特”即改革，是土耳其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倡导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改良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9世纪是英国用武力征服和完全占领印度，并把印度经济演变为殖民地经济的最后阶段。1820年，英国在印度推行莱特瓦尔制，即农民租佃制。莱特瓦尔制主要在马德拉斯和孟买实行，它是继1793年实行的柴明达尔制，即永久租佃制后的又一种保存和利用封建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制度的目的主要是实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为了从殖民地获取更多的廉价原材料，以满足英国国内日益发达的工业需要。新土地税制实行后，东印度公司收入增加很快。公司征收的土地税总额，1800年为420万英镑，到1857年增加到1530万英镑。保存和利用封建土地制度，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得以方便地搜刮田赋，掠夺农产品。据东印度公司官方公布的数字，19世纪中叶，在印度的纯收入之中，近 $\frac{3}{5}$ 来自土地，除田赋以外，英殖民主义者还垄断了食盐、酒以及鸦片的专卖权。据19世纪50年代的统计，在印度的全部纯收入中， $\frac{1}{7}$ 来自鸦片， $\frac{1}{9}$ 来自食盐，加上土地的收入，三项共占印度全部收入的85%。印度本是一个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基础上发展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手工棉纺产品，曾经输往英国和其它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享有盛誉。英国为了实现将印度变为英国商品销售市场的目标，1813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使英国工厂主和商人获得了直接把商品销往印度的机会，英国棉纺织品开始大量涌入印度市场，从1818年到1836年，英国对印度输出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输出总值8024000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即占5220000英镑，占英国对外出口总值的 $\frac{1}{8}$ 以上，占其棉织品对外输出的 $\frac{1}{4}$ 以上。从1833年开始，英国人被允许在印度独立经营种植园，从此，从印度输出的原料明显增加，仅1833至1848年期间，从印度的原棉输出额从3200万磅增加至8800万磅，羊毛的输出额从3700磅增加至270万磅。大米和小麦等谷物输出总值也从1849年的858000英镑增加至1858年的380万英镑。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度的其它手工业中，英国的玻璃、纸张、铁器、陶器等工业品大量涌入印度。英国的机器大工业不仅摧毁了印度的城市手工业、农村手工业，而且将印度演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工业品输出市场，使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最后形成农业原料附庸型的殖民地经济。英国工业资本在印度的扩张也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如为了输出原料产品和输入工业制成品而修建了铁路、建立了英国银行、统一了印度的货币制度等等，均为印度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19 世纪的英国作为海上霸主和工业强国不断拓展殖民地经济和扩张土地，1825 年宣布塔斯马尼亚为自治殖民地，尔后，西澳大利亚于 1829 年，北澳大利亚于 1836 年，新西兰则于 1839 年，维多利亚于 1850 年，相继被宣布为自治殖民地；1819 年占领新加坡、1839 年占领亚丁、1843 年占领纳塔尔，1842 年通过 1840 年的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占领了香港。英国在巩固对印度的统治，基本完成对印度的殖民地经济后，开始致力于入侵中国的活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从 1840 年开始。自封建制度产生到 1840 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处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在……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广泛的分工和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中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广泛存在，在 16 世纪中叶就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840 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曾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渗透，均因封建帝国比较强有力的反抗和西方资本主义还不强大而未能打开中国的大门。19 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用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市场。从此，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与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相联系，并受其影响和支配。

英国的大炮促使太平天国革命于 1851 年 1 月 11 日爆发，并于 1853 年 4 月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以农民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于 1853 年 3 月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在这个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中，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本任务，规定了土地分配的具体办法；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思想的重要文件，还有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一个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资政新篇》并没有在太平天国全面实现，因而它对太平天国也没起很大作用。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兴起了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刘铭传以及后期的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机器、兴办军事工业、发展民用工业，自强求富，实现新政。洋务运动的代表们一方面倚仗、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及其技术、设备，主张通过仿效西方达到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另一方面，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并不是主张纸上谈兵的经济思想，而是付诸行动。1861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1863 年，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1865 年运回上海装备江南制造总局，从此揭开了中国办机器工业的序幕。曾国藩成为兴办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首创者。同时，李鸿章于 1862 年在上海设立上海制炮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3—62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73—374 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6 页。

局，由丁日昌督办、1863年在苏州设立苏州炮局、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1869年在西安创办西安机器局；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机器局；丁宝桢于1875年在济南泺口建立山东机器局、1876年创办四川机器局。此外，还有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英桂创办的福州机器局，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制造局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企业。这些工厂的机器从国外购进，各种原材料如钢、铁、铜、铅、煤、木料等也主要从国外进口，在生产技术上则完全依赖外国技师。然而，在这批军事工厂里，产生了一大批使用近代机器的生产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有一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后来转入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中发挥骨干作用。近代军事工厂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在这些工厂中，还翻译了一批科技书籍，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对于传播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介绍、推广西方的工艺技术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1868年，江南造船厂造成的第一艘“恬吉号”轮船，该船的机器是从国外进口的，而气锅和船壳则由中国制造；到1888年，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依靠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建成了“龙威号”钢甲兵舰。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的制造技术、工艺水平能达到，如此水平，客观上使军事工业成为民用工艺技术的先导。这一切也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近代机器工业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军事工业不能长期依赖国外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技术，客观上一方面要求有相应的燃料、采掘、钢铁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条件，另一方面要求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民用工业的建设是基础，也是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兴办民用工业的主张。民用工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和纺织工业等。1872年，李鸿章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拟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并购置了三条船；1876年又添购轮船九艘；由于轮船招商局需要煤炭，1876年，李鸿章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1887年由李鸿章和恭镛筹划开采漠河金矿。1889年，张之洞筹划建立炼铁厂，1890年开始兴建汉阳铁厂。纺织业1878年建立了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1891年又建成湖北织布局。电讯业，也从1879年开始架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间电话线，全长64公里；到1894年共设立了39条线，全长23296公里。铁路，1876年修建最早的从台湾基隆煤矿老寮坑至泊船处1.6公里的短程铁路；1881年建成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全长11公里，经多次延伸，1888年修到天津，全程长130公里。到1895年，修铁路364公里。航运业，1872年开业的轮船招商局，拥有20余艘近5万吨商轮。这些民用企业主要采用“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19世纪70年代就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如1873年陈启源创办缫丝厂，使用“法国式之器械制丝”；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创办怡和机器磨坊等。到了80年代，又产生了机器轧花厂、火柴厂、制纸厂、船舶修理以及煤矿开采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80年代以后，民族资本在金、银、铜、铅等金属矿业中投资，同时，创办电灯公司等。

由洋务运动引发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是顺应中国经济从古代经济向近代经济前进的历史趋势。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修筑了第

一条铁路，如此等等。从地点来看，这些企业不仅限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内地和边远省份。从时间及规模上看，这些企业虽然比外国在华企业稍迟，投资规模及其所占比例比外国在华企业小；但是，它们是作为外国在华企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因而，它们揭开了中国采用机器生产历史的第一页，拉开了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并构成了中国新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不仅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示范，而且对中国近、现代的工业资本发展均具有影响作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由洋务运动引发的近代企业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为了维持封建制度，它排挤、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有阻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一面。

日本在资本主义诸强国中是一个落后的国家。19世纪中叶，日本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面临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改良。“明治维新”成为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以睦仁天皇为首，由维新派武士掌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总方针指导下实行改革。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有：废除诸侯的封建土地领有权、地方封建割据和等级身份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榜样，改革和普及教育，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和科技成果；引进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业；扶植私人资本；等等。日本“明治维新”改良是日本封建制度危机的必然结果。日本德川幕府的财政进入19世纪后日益拮据，1834年至1836年间，每年平均赤字已达59万两金，1854年至1856年间，平均每年的赤字达到70余万两金；大名财政更为困难，19世纪20年代末，萨摩藩负债达到500万两金，仅利息每年即须支付35万两金；将军大名向高利贷商人借贷，大名仅从大阪一地商人的贷款即有6000万两，每年利息值大米300万石。日本“明治维新”改良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入和欧美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日本从16世纪始已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从18世纪初起，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入日本。19世纪以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留学西方的人士发起了资本主义改良运动；欧美西方列强的资本扩张和武力威胁迫使日本开港通商，1853年，美国强迫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英国、法国、俄国和荷兰等国也先后迫使日本同它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结果是加重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危机、加速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兴起。因此，欧美资本主义扩张是日本资本主义改良发生的催化剂。日本“明治维新”实行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改良措施，有力地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从1868年至1870年，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禁止各藩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允许一切人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买卖土地；设置通商司，奖励贸易；统一并保护全国汇兑业务；建筑铁路并募集所需资金；整顿伪币、劣币并统一币制等。日本“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经济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日本的产业革命由此开始。

亚洲的其它国家的近代后期经济史，如越南、朝鲜、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印度、中国一样，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和武力威胁下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非洲，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为殖民地后，开始向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扩张。西非、南非等均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扩张的对象。

在拉丁美洲,拉美各国利用原宗主国衰弱的机会,争取国家独立。到1821年,中南美洲已建立了20个新独立国家,但拉美国家刚摆脱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统治,又被英国等资本主义扩张演变为其半殖民地。

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经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是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这些国家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在刀枪火炮和资本扩张中被一起囊括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附庸经济。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成熟时期（1816—1850）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成熟时期大致从拿破仑战败至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注重大机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扩展；同时，适合国情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理论的出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产业化迈进的步伐。在这一时期，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法国、美国、德国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工业化发展。

1.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1）英国“世界工厂”的形成

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对英国商品重新开放，因而投资者扩大投资范围，企业主扩大生产规模，商人扩大囤集的货物数量。但是，欧洲大陆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破坏后，购买力极为有限；战争的结束使军需定货停止；各国在战争期间也将自己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加之美国在 1812 年的美英战争胜利后也实行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等，各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量大为减少，英国工业生产过剩、大批工业企业倒闭、生产减缩，经济呈现萧条景象。1815 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土地贵族利益而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国内市场的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 80 先令时，禁止外国谷物输入。“谷物法”对土地贵族阶级有利，因为它把国内的谷物价格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之上，从而可以提高地租；“谷物法”对工业资产阶级不利，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开始需要大量的农产品，而高昂的谷物价格势必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利润的降低。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围绕“谷物法”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斗争。“谷物法”颁布后，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昂贵的谷物，使工人货币工资被迫提高，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昂贵的谷物，扩大了英国各阶层的吃粮开支，从而减少了对工业产品的消费；同时，欧洲许多农业国也采取限制英国工业品进口的措施，以抑制谷物法，使英国的对外贸易额锐减。1815 年，英国出口总值为 5100 万英镑，1819 年减至 3500 万英镑；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 1800 年为 33%，1820 年降至 27%。

从 1820 年起，英国经济开始复苏。国王乔治三世死后，其子即位，即乔治四世（1820—1830）。政府内出现了以坎宁和庇尔为首的革新人物，迫于形势，他们感到只有对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作一些让步；才能巩固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统治。英政府在自由主义策略的影响下，废除了部分法令，并于 1826 年放宽谷物进口的限制，规定国内粮食价格高于一夸特 60 先令时即准许粮食进口。工业资产阶级发动了反谷物条例的运动，因为“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地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工厂主难于压低工资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削弱了英国工业品的竞争能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当时在大不列颠棉织布厂内使用的 10 万架蒸汽机和 25 万架手织机，每年要消费 4100 万磅面粉来浆刷经线。漂白等过程所用的面粉，又等于此量的三分之一。这样消费的面粉的总价值，依他计算，在过去 10 年间，每年等于 342083 镑。和大陆面粉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由谷物关税强加在工厂主头上的面粉高价一项，每年已经等于 17 万镑。格勒估计，1837 年，至

少等于 20 万镑。” 19 世纪 20 年代，工业资产阶级曾企图用改变谷物价格的办法来废除谷物条例，但没有成功；以后，资产阶级又试图在改革议会制度的同时取消谷物条例，也没有收到效果。但是，工业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种种手段迫使英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让步：1823 年通过了《哈斯基森林法》，英政府放宽了对其他国家航运的抑制和对外粮食进口的限制，同时，迫使英国政府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规定把输入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平均降低 30%，还取消了丝织品的进口禁令，降低了原料、特别是生丝、羊毛、煤等的进口税率，在 1824 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政府废除了于 1719 年和 1750 年先后颁布的关于禁止熟练技工出境的禁令；1825 年又迫使政府废除了于 1774 年、1781 年、1785 年先后颁布的禁止工具、机器图样和机器出口的禁令；1841 年至 1846 年期间，英国又取消了 605 种商品的进口税，降低了 1035 种商品的进口税；1846 年，在激进的自由贸易派推动下，皮尔保守党政府废除了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1849 年，罗素辉格党内阁又废除保持近 200 年的《航海条例》。这些法令和措施，特别是《谷物法》的废除，在英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自由贸易原则对关税保护主义的胜利，也标志着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英国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产业革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产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主要研究英国产业革命后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魔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英国的产业革命是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导，并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英国的产业革命进入近代后期的初始状况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业的革命。大不列颠大片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延伸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 25 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了出去，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 1815 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的前面了。”20 年代初，英国经济由复苏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初期，英国拥有纺纱锭，比法国大约多了 3~4 倍，比德国多了几乎十几倍。”但是英国本国的人口却又比这些国家少得多。如“1830—1831 年大不列颠人口为 1650 万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0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88 页。

法国为 3250 万人，德国为 2970 万人，美国为 1290 万人。”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已将蒸汽机运用于纺织工业，到 19 世纪上半叶，蒸汽机已在英国棉纺织业较为广泛的应用。蒸汽机的运用，是人类生产技术上的一大飞跃。蒸汽机作为动力，它既不受地点条件的限制，又能普遍应用于各种工艺上。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一切工业部门的机械化。英国资产阶级采用蒸汽机于棉纺织业，使英国棉纺织品价格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打败竞争对手，夺取了棉纺织品的垄断地位。如“1786 年英国 100 支棉纱每磅为 38 先令，1790 年为 30 先令，1800 年为 9.5 先令，1807 年为 6.75 先令，1830 年为 3 先令。”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刺激了煤炭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促使煤炭生产中更多地使用蒸汽机。“19 世纪 20 年代初期，英国煤的产量已经超过 1400 万吨，而法国和普鲁士各为 100 万吨左右，美国仅有 5—6 万吨。”¹⁸²⁵ 年，英国已有近 15000 台蒸汽机，总功率达 375000 马力，而法国仅有 328 台蒸汽机，总功率为 5000 马力，只相当于英国总功率的 1/75，1837 年普鲁士仅使用 423 台蒸汽机，总功率不过 7500 马力。”英国在黑色冶金业的生产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如“1825 年生铁产量英国为 590 万吨，法国 200 万吨，俄国为 158 万吨，美国为 91 万吨，德国为 40 万吨。”在冶金生产中，英国不仅在产量方面处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领先地位，而且在生产技术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在 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已基本不用木炭冶炼生铁，而其他国家中木炭炼铁几乎占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在炼铁和煤炭生产方面出现和采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发明。例如，在煤的开采中使用凿井机、曳运机、蒸汽抽水机、安全灯等；炼铁在采用煤或焦炭炼铁的同时，利用鼓风设备使炉火不断地燃烧，发明了搅拌法和碾压精炼法，提高了炼铁的效率和质量。因而，英国的煤产量、铁产量大幅度增长，1850 年煤产量达到了 5000 万吨，铁产量达到了 230 万吨。纺织、冶金、煤炭成为英国在产业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三大支柱工业，为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以及促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此外，英国的铁路、运河以及其他各种工业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 世纪以前，英国的交通主要是马路，靠马车作交通工具。未经铺修路面的土路，往往被车轮压出很深的辙痕，凹凸不平；到了冬季，情况更糟，城市间因道路受阻中断联系，因此，改善道路成为政府、社会支持的事业。1815 年英国发明耐久铺路方法。在 1818—1829 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分别修建了约 1000 里长的优良公路。改良的道路成为把资本主义方式引向穷乡僻壤的渠道。19 世纪初期，英国造船业是采用进口的木料制造帆船。自从蒸汽机用在帆船上以后，英国把钢铁材料造船和蒸汽机结合在一起，于 1820 年制成第一艘蒸汽铁船。1838 年，第一艘蒸汽铁船横渡大西洋。蒸汽机运用于矿山、工厂和水上交通也取得了成功。但是陆上交通仍然依靠马拉的车，载重量小，速度慢，很不方便。研制适用于陆上交通的蒸汽机车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英国人斯蒂芬逊 1814 年试制成功“转运发动机”，促进了英国铁路的大发展。在历史上，斯蒂芬逊是自学成才的伟大发明家之一，他生于 1771 年，父亲在一个煤矿当伙夫，没有钱

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 1 卷上册，第 294 页。

波特尔：《国家与进步》，伦敦 1957 年版，第 187 页。

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 1 卷上册，第 294 页。

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 1 卷上册，第 294 页。

供他上学。斯蒂芬逊幼年生活艰难，当过牧童，他干过其它谋生的工作，后来成为一名管理煤矿发动机的工人。斯蒂芬逊对瓦特的蒸汽机和富尔顿的蒸汽机船非常感兴趣，很想知道其中的奥秘，由于不识字，斯蒂芬逊从 18 岁开始进夜校读书。在一个煤矿主的支持下，斯蒂芬逊的“转运发动机”在一条 9 英里长的路轨上行驶取得了成功。经过不断改进，1825 年，斯蒂芬逊亲自驾驶他所设计制造的机车，牵引着几十节煤车和客车，在从斯托克敦到达林顿长达 40 公里的铁路上，以每小时 24 公里的速度顺利到达终点。斯蒂芬逊开创了近代铁路运输的历史。1826 年，英国又修建了从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 年正式营运通车。1847 年英国修建的铁路已达到 9400 英里，1850 年达到 10500 英里。蒸汽机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在英国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从而带动了工作机和蒸汽动力机的发明和改良，又促成连接这二者的传动机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组成的完整的机械体系。蒸汽机通过传动机推动工作机运转，形成一个发达的生产体系。随着英国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机器生产规格化，英国机器制造业所生产的蒸汽发动机、纺织机和蒸汽机车等向国外出口。1825 年英国废除了机器出口的禁令，从而使英国输出的机器不断增多，机器制造业已成为英国重要的出口工业部门之一。当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率水平还比较低，而英国的机器制造业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早并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所以，英国的机器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在这一段时期，英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也很快。根据官方估价的出口额，在“1801—1850 年间从 2490 万英镑增加到 17540 万英镑，即增加 600%。”“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在 1820 年占 18%，1850 年则上升为 21%。”英国在世界工业、贸易、运输、科技等方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因而英国便成为了“世界工厂”。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的确立从英国国内来看是以蒸汽机广泛应用于纺织、煤炭、钢铁、交通运输，并以机器制造机器、大机器工业替代手工工业而占主导地位，于 19 世纪 40 年代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为特征的；从国际范围来看是以英国在世界工业品的输出和先进技术的输出方面具有垄断地位而言的。具体表现为英国成为世界各国的工业品、先进技术与设备的主要供应者，而其他各国相对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廉价商品推销地。

1760—1844 年英国圈地数

年代	圈地数(单位:英亩)
1760—1769	704550
1770—1779	1207800
1780—1789	450180
1790—1799	858270
1800—1809	1550010
1810—1819	1560990
1820—1829	375150
1830—1839	248880
1840—1844	120780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第 270 页。

库钦斯基：《世界资本主义研究》三联书店，1955 年版，第 52 页。

资料来源：掘经夫：《英国经济史》第 131—132 页。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双向推进的结果。英国的农业，在工业革命以前就以“圈地运动”的形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而为英国较早开始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生产技术的发达，又给了农业以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农业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英国又出现了“圈地运动”的高潮。表 2—2，可以看出 19 世纪上半叶各年份圈地规模。

英国土地制度的特点，在于农民的土地占有制被剥夺得十分彻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英国那样，把直接生产者剥夺得一干二净。例如英格兰有一个贵族夫人，为了圈地养羊，“从 1814 年到 1820 年，用暴力赶走了 15000 个居民，大约有 3000 户。他们的村庄全部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 794000 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到 1825 年，15000 个盖尔人已经被 131000 只羊所代替。”工业革命促使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人口向城市集中，对粮食和农业原料的需求增加；同时，价廉物美的资本主义工业品进入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农业革命消灭了自耕农，广泛地采用一系列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反过来推动了英国产业革命的进程。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不仅体现在 19 世纪上半期通过技术革命实现产业化，而且体现在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1825 年，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 1825 年至 1826 年，有 75 家银行破产，3300 余家工商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加上 1829 年农业歉收，粮价暴涨，经济萧条连续了四五年。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罢工与饥民骚动，中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捣毁农业机器和地主住宅，要求取消教会什一税和提高工资。在经济发展中增强了实力的资产阶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议会改革运动，取得了成功，他们在国会中取得了多数地位，和土地贵族、金融巨头结成同盟，共同统治英国。较为稳定的政局以及生产关系变革的一些措施使英国经济发展很快。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工人争取 10 小时工作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强大的宪章运动压力下，迫使资产阶级议会先后颁布 1833 年的工厂法、1842 年的煤矿法、1844 年的工厂法和 1847 年的工厂法等。1847 年 6 月议会颁布的 10 小时工作日法规定：从 1847 年 7 月 1 日起，13 岁以上的少年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时间缩短为 11 小时，从 1848 年 5 月 1 日起最终限制为 10 小时。尔后扩大到全体工人。据统计，30 年代末，女工占英国全体工人的 57.8% 左右，其中在棉纺织厂中女工占 56.25%，毛纺厂中女工占 69.5%，丝织和麻织厂中女工占 70.5%。18 岁以下的工人占 46%，而 18 岁以上的男工不到 1/4。这一法案通过和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促使了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

（2）1817 年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成熟时期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英国产业革命进程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产生

了重要的作用。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出身于伦敦一个交易所经纪人的家庭，从14岁起他跟随父亲从事交易所的活动，并在25岁左右成为拥有百万英镑的大资产者。1799年，李嘉图阅读了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从此，他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李嘉图最早的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著是关于货币银行的问题。李嘉图的第一篇经济论文是《黄金的价格》，匿名发表在1809年8月29日的英国《晨报》上，并在此基础上于1810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书名为《金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这本小册子在短期内再版了多次，使李嘉图博得货币流通理论家的声誉。1811年，李嘉图发表了《答博赞克特先生关于金块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见》，1816年发表了《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李嘉图在其关于通货问题的论著中，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尖锐批评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要求制止通货膨胀，恢复银行券的兑付。当时，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阶级正围绕《谷物法》的存废进行激烈争执，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找到谷物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的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和根据〉》。在这本著作中，李嘉图对于马尔萨斯维护土地贵族阶级《谷物法》的论调进行批判，指出《谷物法》引起的谷物价格上涨将导致利润降低，使普通居民生活状况恶化，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1817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利益”的理论。他认为，英国不仅要从外国进口粮食，而且要大量从国外进口，因为英国在纺织品生产上所占的优势比在粮食生产上的优势大得多。因此，英国应发展纺织品生产，以其出口换取粮食，取得比较利益，实现商品价值的增殖。1822年，李嘉图出版了《论对农业的保护》一书，在书中，李嘉图抨击禁止外国廉价谷物进口的关税政策。李嘉图关于农业的论著，反映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最紧迫的要求，即降低商品生产的费用、废止《谷物法》、争取廉价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1823年，李嘉图逝世。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完成者。

李嘉图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这部著作的出版和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样具有很大的反响，李嘉图由此博得了第一流经济学家的名声。《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全书共分为三十二章，其核心是分配问题。李嘉图指出：“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李嘉图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的，就象斯密《国富论》研究的本质一样，李嘉图也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斯密和李嘉图都强调资本积累对社会财富增加的作用。但处于产业革命前夕的斯密首先注重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国富论》以分工开始，而在讲到资本时，虽然强调资本在增加雇佣工人人数和促进分工中的作用，但他却把资本积累的形成归结于资本家的节俭；处于产业革命后期的李嘉图，从资本的

开源方面来考察资本积累形成和扩大的最大可能性。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侧重于分析在价值分割为社会三收入的条件下，地主、工人、资本家三阶级所得份额如何影响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扩大再生产。李嘉图经济理论的重点从财富的生产转向财富的分配，但分配的分析是以生产为目的的。因此，马克思说，李嘉图并没有割裂分配和生产，他仍然是一个生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理论，即一是工资的大小决定于工人及其家属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利润为商品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三是地租是商品的价值超过工资加利润的余额，这是由于在同等面积或同一土地上连续投入等量资本和劳动所得产品数量不同而造成的。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论机器”，这不是偶然的。李嘉图认为，机器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其巨大的生产率不仅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将对社会各阶级产生影响。李嘉图在书中表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使用可能损害工人的利益。李嘉图把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看作是要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即一种人的份额只能比例于另一种人的份额的减少而增加，也只能比例于另一种人的份额的增加而减少，李嘉图得出了工资与利润是相互对立的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曾把李嘉图的这个见解归结为如下三条原理：第一，无论劳动生产率怎样变化，从而无论生产物数量和单个生产物价值怎样变化，大小一定的工作日总是创造相同的价值。第二，工资和利润是按相反方向发生变化的，而引起这种变化的最终原因，则是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下降，工资跟着下降，于是利润就增加；相反地，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生活品的价值上涨，工资跟着下降，于是利润就增加；同理，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生活品的价值上涨，工资跟着上涨，于是利润就减少。第三，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先影响工资，然后再影响利润，所以工资的变化是原因，而利润的变化则是结果。李嘉图清楚地看到了并在书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对立。但是，李嘉图认为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本积累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增大，是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收入吞食了国民收入中日益增加的份额。但同时，李嘉图又提出了级差地租的理论，认为级差地租量取决于不同土地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坚持用劳动价值学说来解释地租的形成。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实际上是以当时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前提条件的。第一，资本主义以前的土地占有形式已经被摧毁，资本已经可以自由投资于土地上；第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已经充分得到发展，因而无论工业资本还是农业资本都受到平均利润规律的支配；第三，资本积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而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准备用在农业上。李嘉图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为了养活无节制增长的人口，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耕种所有的劣等地，这些劣等地与优等地相比产量低，势必引起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的不断上涨。因此，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是与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的。在李嘉图的分配体系中，工资是由生理上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决定的，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工业资本家不能随着工资的增长提高商品的价格，因而他们的利润就在不断提高的地租和不断提高的工资情形下，利润率呈绝对下降的趋势。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中科学成分和错误成分都存在，他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不讳言利润和工资在分配中的矛

盾，但他认为它只是从属于利润和地租之间的矛盾。李嘉图经济理论主要是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土地贵族阶级提供理论依据的，对于英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嘉图 1817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从经济理论上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李嘉图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并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李嘉图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李嘉图在斯密关于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成本理论，使自由贸易理论更加具有系统性，对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论证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一个国家不仅应当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出口进行贸易取得贸易的绝对优势利益，还应当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出口，通过对外贸易交换可使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李嘉图假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只需要 80 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只需要 90 个工人劳动一年；而在英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毛呢，则分别需要 120 个工人和 100 个工人劳动一年。葡萄牙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占优势，但葡萄牙在葡萄酒生产效率上比英国高 $\frac{1}{3}$ ，在毛呢生产效率上比英国高 $\frac{1}{10}$ ，因而，葡萄牙在葡萄酒的生产上优势更大。因此，对于葡萄牙来说，与其用一部分资本来生产葡萄酒，用另一部分资本来生产毛呢，还不如把全部资本都投资在葡萄酒的生产上，而由英国专门生产毛呢。对于英国来说，生产葡萄酒和毛呢相对于葡萄牙来说都处于劣势，但劣势当中生产毛呢又具有比较优势，英国将投资全部用来生产毛呢，而由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这样通过自由贸易两国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因为如果由葡萄牙自己来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就需要 90 个工人劳动一年，而现在只要用 80 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的葡萄酒就可以交换到同样数量的毛呢。从英国方面来看，虽然需要 100 个工人劳动一年的生产物毛呢只换来了 80 个工人劳动一年的生产物葡萄酒，但是如果由英国自己生产葡萄酒，则需要 120 个工人劳动一年才能生产出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制订比较优势原则是李嘉图的科学功绩。马克思称赞这一原则，认为专业化甚至对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可能是有利的，因为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时期的其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还有约翰·巴顿（生卒年代不详），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时期“有很大的功劳”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于同一年即 1817 年出版。巴顿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需求相对减少这一重大问题。乔治·拉姆赛（1800—1871 年），他于 1836 年出版了《论财富的分配》，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的一些重要观点。马克思指出：拉姆赛：“他事实上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查·琼斯（1790—1855 年），他的经济理论著作有《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 年）、《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 年）和《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 年）。和斯图亚特相似，琼斯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

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76—1834年），马尔萨斯在这期间的主要著作有《价值的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马尔萨斯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阶级的代表。马尔萨斯为《谷物法》辩护，他认为，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在英国增加谷物生产必然引起单位成本的提高，但是，这是为了使英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所应付的代价。他认为废除《谷物法》虽然会促进英国工业的发展，可是“不应该由此推论，工业制度不会发展得过分的，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流弊在超过某一限度之后，不可能多于它的优点。”马尔萨斯根据其人口理论，断言英国开放进出口口岸的结果会使谷物价格低贱，刺激人口增长，从而引起下层阶级生活状况恶化。在马尔萨斯看来，谷物贸易的限制政策将给社会各阶级带来利益和幸福。因此，马尔萨斯主张对进口的谷物征收“一种保护性的和有利的课税”，并继续实行谷物出口的补贴制度。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是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纲要》。穆勒是李嘉图学说的积极拥护者，他积极维护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反对土地贵族阶级，在阐述李嘉图关于地租的理论时，他要求对地租课以高额的税收。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年），他1825年出版其主要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麦克库洛赫试图发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却采用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理论作基础。纳索·威廉·西尼耳（1790—1864年），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年），此外还有《政治经济学结论》（1827年）、《人口论二讲》（1831年）、《论工厂法对于棉纱制造业影响的书信》（1837年）等。西尼耳从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出发，他说：萨伊等人把生产三要素“叫做劳动、土地和资本。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的分类；……我们还打算用节欲（abstinence）这个词来代替资本。”这样，生产三要素就成为“劳动、节欲和自然要素”。西尼耳认为：“利润是节欲的报酬，而节欲是推迟享乐。靠了节欲才能存在或保持的那种商品是资本。”西尼耳还提出了另一个“新发现”，即“最后一小时”论。1836年，英国工厂主为了反对工厂法和10小时工作日运动，请西尼耳为其资本家利益辩护。西尼耳为工厂主写成了《论工厂法对于棉纱制造业影响的书信》，力图证明：工厂主的利润是11.5小时工作日中的最后一小时创造出来的。因此，若将工作日从11.5小时缩减到10小时，那么工厂主的利润就会消失，工厂就会倒闭，而工人也就会找不到工作。约·斯·穆勒（1806—1873年），他的经济著作是《论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1844年）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年）。他的经济理论具有中和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经济规律都是永恒不变的观点。在他看来，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生产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不依社会制度而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874年版，第472、473页。

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15页。

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3页。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3、94页。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5页。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76页。

而财富的分配“完全是人类的制度问题。一经有了物品，人类就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处理它们。他们可以随意把它们交给任何人来支配，并随意规定条件。所以，财富的分配是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决定分配的规律是统治着社会的那部分人的意见和情感所制造出来的，并且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里是不大相同的；假如人类要这样做的话，还会更不相同。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欧文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其著作有《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状态》（1830年）等，欧文认为体力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不是个别劳动而是作为平均劳动的一般的劳动是价值的尺度。欧文考察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不断扩大的生产和市场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工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认为，在未来社会即理性社会中，机器将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恩惠。约翰·格雷（1798—1850年），他是英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著作主要有《论交换原则》（1831年）、《论货币的性质和用途》（1848年），他认为劳动时间应作为货币的直接计量单位，并建议建立发行“劳动货币”的国民银行。同时，他提倡建立小私有制。

查尔斯·巴贝吉（1792—1871年），以研究工场手工业并提出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成为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1832年，巴贝吉发表了著名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他赞同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三条经济效益，提出可以按不同的工序所要求的技艺来雇佣不同的工人，支付不同的工资，即所谓“边际熟练”原则。1822年，巴贝吉发明了一种称之为“差值机器”的机器计算机；1833年又设计一种“分析机器”，有着现代计算机所具有的储存装置、穿孔卡输入系统、运算装置和外部储存系统。因此，巴贝吉被称为是计算机之父。

安德鲁·尤尔（1778—1857年），1835年，他发表《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经济》。他明确提出要在工厂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提出对工人实行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产品给予一定数量的报酬的办法等。

2.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

（1）“普法战争”后的法国经济

拿破仑战败后，波旁王朝第二次在法国复辟封建贵族统治。但是，法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封建制度已被摧毁，资本主义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都向前发展了。复辟时期，法国虽然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在300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约占2300万，但是法国的工业生产仅次于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约占20%的份额。拿破仑战败和波旁王朝复辟，15万反法联军占领法国，根据1815年11月第二次巴黎和约，法国不仅要付出7亿法郎的赔款，而且还须负担占领军的给养。尽管波旁王朝不得不把政权建立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比英国落后了许多，并在近代经济发展中被后起的美国、德国超过。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了缓慢的发展。首先是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伦敦朗门斯·格林公司1911年版，第123—124页。

工业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数量逐渐增多。1814 年仅有 15 家工厂使用机器生产，到 1830 年已有 625 家工厂使用蒸汽机和新式机器。工业中棉花用量，1812 年为 1030 万公斤，1829 年增加到 3500 万公斤。1815 年丝织品生产总值为 4000 万法郎，到 1830 年增加为 8000 万法郎。蒸汽机的功率从 1815 年到 1826 年增加 15 倍，生铁产量从 1810 年到 1830 年增加 2 倍。煤的开采量 1814 年为 100 万吨，1825 年为 150 万吨。贸易总额 1815 年仅为 6.21 亿法郎，到 1829 年增加至 12.24 亿法郎。

19 世纪初法国开始产业革命，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同时在战争期间对英国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使许多法国工业部门因原料来源断绝而陷入困境，加上封建王朝复辟等，这一切都延缓了法国产业革命的进程，因而法国产业革命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才真正开始。1825 年，英国废除了关于机器出口的禁令，法国利用有利的时机，取消了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从国外聘请熟练技工并大批输入英国机器以提高国内工业技术水平，工业革命在法国大规模开展起来。随着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劳动和蒸汽机的日益广泛使用，最先普遍采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工业到 40 年代末已拥有 11.6 万台纺织机和 350 万纱锭，全国已有棉纺织厂 566 家。伴随法国资本主义的增长，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多。1828 年，巴黎有 24 万多工人，占首都人口的 34%。此外，巴黎和其它大城市每年还雇佣成千上万的季节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工人的日工作时间平均长达 14 至 16 小时，工资却极其低微。资本家还大量雇佣廉价的女工和童工，女工的工资只及男工工资的 50—60%。1825 年，从南特来的一位医生对工人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免于死。除了指望养活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块面包之外，除了指望使他一时不再意识自己的一瓶酒外，他无所企求，无所期望。……无产者回到家中，就是进入他那悲惨之地——冷风从壁板、顶棚的裂缝中刮入的屋子。一天 14 小时的劳动之后已是满身臭汗，但他回家时并不换衣服，因为他没有衣服可换。”法国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英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一样，伴随大机器广泛使用的同时是以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夺发展起来的。

1830 年 7 月法国再次发生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如果说波旁王朝是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迈进，则七月王朝已经是资产阶级王朝了。不过，其政权并非掌握在整个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手里。因而，七月王朝实行的政策都是有利的金融贵族集团的。但这些政策的实行打击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士恢复旧制的企图，减少了对外战争，控制了资金外流，因而，在这一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棉纺织工业中的棉花用量从 1831 年的约 2800 万公斤，增加到 1845 年 6400 万公斤；工业投资总额从 1830 年的 300 亿法郎，增加到 1848 年的 450 亿法郎；工业中广泛采用机器生产，1830 年全国仅有 625 台蒸汽机，到 1847 年增加到 4853 台；煤产量 1830 年为 170 万吨，到 1847 年达到 550.30 万吨；铁产量 1832 年仅为 71.40 万吨，到 1847 年达到 160.80 万吨；铁路线 1831 年为 38 公里，到 1848 年增加到 1900 公里。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工业在世界上仍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但是，七月王朝是代表少数金融贵族集

A、盖潘《十九世纪的南特》1825，引自爱德华·多尔莱昂《工人运动史》，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36—1953，第 1 卷第 16、17 页。

团利益的。他们垄断了金融、粮食、工业原料、铁路、矿山、贸易等部门。工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被排斥，经济上也受到很大限制，工人和农民处境不仅没有任何改善，而且每况愈下。七月王朝每年从农民身上取得的苛捐杂税达 5.6 亿法郎，几乎占国家预算总额的一半。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更大的利润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给工人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所得工资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来自北部的一位工业家米梅里尔写道：“工人的命运并不坏，他们的劳动既然没有超过 13 个小时，也就不为过多。……得到一星半点利润的工厂主才是值得可怜的人。” 1831 年至 1834 年间，工人阶级先后在巴黎和里昂等地起义，尤以里昂起义规模最大。里昂是法国丝织工业的中心，当时法国的丝织业大部分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因而除了手工工场以外还有大量的家庭手工业。丝织工人多数是家庭手工业者或帮工。帮工每天工作 15 至 18 个小时，但仅能得到 15 苏的工资，只相当于一磅面包的价格；而女工和童工的工资则更少。从 1831 年的 5 月至 9 月期间，里昂工人多次要求提高工资。10 月 25 日，作坊主与厂商代表议定了新的工资标准，六千多工人示威支持工人代表，迫使里昂地方当局批准了新的工资标准草案。但资本家拒绝执行并向法国政府上诉，而政府按照资本家的意图拒不批准新的工资标准，从而引发工人大规模里昂起义。在七月王朝统治下，广大的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贫困和破产，到 19 世纪 40 年代，1600 万农民中，失去土地的人数达到 400 万户，濒于破产的约在 500 万户以上。但是这一时期法国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在小农分化破产过程中，少数富裕农民开始购买土地，组织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法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日益扩展，但是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商业中，小生产都占有很大比重并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法国工业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法国，工业中小生产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有：传统的工匠，在家里作工的农民家庭，到法兰西旅游的短工，建筑工人，专业工人（装订工人，钢铁、青铜和铸造工人）和那些不能胜任机械化工厂中工作的人。正如巴尔扎克在《阿尔西的议员》一书中所指出的：“几乎法国的所有针织品、相当多的贸易，都是在特鲁瓦周围完成的。方圆十里格（一里格为 30 公里，引者注）的乡村住满了工人，如果你经过那儿，你会从敞开的大门中看见工人们织机的。这些工人是适应中产阶级的，这就使得投机商被称作制造商。”在里昂的丝绸制造业中，许许多多的“行商”或“商人——制造商”购进原料，再把原料交给“工场主”去制作。这些人是熟练工人，家里有自己的织机。有 3 万名短工在这些织机上工作；他们的工资论件支付，通常领取行商付给工场主价钱的一半。此外，法国的工业部门结构还承袭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即高级服饰和奢侈品生产一般均由小手工业制作，因而小企业在法国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正是法国的传统特点。

法国 19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封建贵族复辟以及金融贵族的垄断；从经济历史发展的原因来看则主要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还不够发达，小手工业生产比重远远超过大机器生产比重而占主导地位，再加上法国小农业经济普遍存在和高利贷资本的特别发达以及 1815 年拿破仑战败造成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等，使法国的工业发展相对

引自里乌《工业革命》第 176 页。

引自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第 113 页。

缓慢。从经济发展的时间上看，1820年至1830年是法国经济的复苏时期，1830年至1850年是法国经济的增长时期。法国的工业生产已从1781—1790年的43%上升到1835—1844年的55%；对外贸易额从1830年的11.31亿法郎增加至1847年的24.37亿法郎；1851年法国的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百分比分别为75%和25%，而同一时期英国的百分比分别为48%和52%。

（2）法国经济理论主要代表人物

法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进入成熟时期孕育了这一时期的法国经济理论。法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较早的国家，同时又是小生产广泛存在并占较大比例的国家，因此，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最初出现于法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让·沙尔·列奥尔·西斯蒙第（1773—1842）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西斯蒙第和大卫·李嘉图是同时代人，马克思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以李嘉图告终的，而在法国则是以西斯蒙第告终的。“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西斯蒙第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在瑞士法语区长大的，对工业革命给小生产者和工人带来的破产与贫困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西斯蒙第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早期著作《论商业财富》（1803年）中，西斯蒙第详细介绍和阐述了斯密的《国富论》的内容和经济理论。西斯蒙第在宣传斯密的经济理论时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制度，赞扬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学说，认为只有自由的企业家活动的原则才是有益的。当英国在1815年和1818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工业革命在法国和瑞士威胁小生产者的利益时，西斯蒙第则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转变为反对者。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西斯蒙第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修正，对李嘉图的学说进行尖锐批评。

西斯蒙第试图建立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反对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抽象法，他写道：“英国的新经济学家所写的作品是非常晦涩的，需要费很大力量才能理解，因为我们的脑筋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抽象能力是不肯接受的……。”西斯蒙第认为政治学是一门“道德的”和“精神的”科学，不涉及经济关系，仅涉及人类的行为。西斯蒙第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异议，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的生产，重要的在于人们对财富的享受，且在交换发生以后，收入决定人的享受或消费，因此，收入的分配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他在其论著中写道：“我相信我给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因为我确定了全民的收入，和研究了这种收入的分配；收入既然给国家带来莫大的幸福，那么通过研究收入就能够最好地达到这门科学的目的。”西斯蒙第认为，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情况给予物质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的物质福利合乎伦理要求的分配，才能使社会得到顺利发展。因此，要使社会经济发展能够真正地为人们提供物质福利，只有国家和政府来指导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

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才能实现。西斯蒙第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研究国家如何指导和调整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即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政府的经济政策作为研究的任务。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坚持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并认为货币象其它商品一样也是劳动产品、具有一般价值尺度的职能。西斯蒙第还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和劳动条件相分离，从而劳动的成果不得不分割为地租、利润和工资。西斯蒙第写道：“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费者、因而把它从流转中抽出来使它变成消费基金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才能具有这种性质。”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决定收入，但是生产本身还不能立即变成为收入，作为收入只能被实现以后才开始；而收入决定支出，支出不能超过收入，国民收入限制着国民的支出；而支出决定消费，国民的支出消费着国民的全部生产物，如果支出不能购买全部生产物，就会出现过剩的生产物。消费虽然决定着再生产，但消费本身是决定于收入的，因此生产最终取决于收入。西斯蒙第继而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再生产的原理，即收入是由生产决定的，但是这种收入决定了下一次再生产，因为支付今年生产的是去年的收入，所以生产和收入并不能直接相等，然而社会生产必须和收入相适合，那些不顾收入而一味鼓吹生产的人，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而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破产。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利润，生产者受自由竞争规律的影响，在工业中广泛应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张，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的分配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国民多数的劳动者收入不足，造成了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从而使生产和收入之间的比例破坏了，产品的实现遇到障碍。西斯蒙第在书中写道：“由此可见，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在生产上往往不以需要为转移，而是以拥有大量资本为转移的富有的国家里，……一旦生产猛然超过消费，就会引起严重的贫困。”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提出把社会经济的重心放在小生产之上则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由它所产生的经济危机都可以消除。

19世纪中叶，法国有很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蒲鲁东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亲身经历了法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的境遇有切身的了解。蒲鲁东少年时代，他的家庭就破产了，他做过雇工、排字工人，后来成为一家小印刷厂厂主，不久也因资金不足而倒闭。蒲鲁东在19世纪下半叶出来捍卫小生产者的利益时，法国小生产者仍然大量存在，工人生活状况恶化、已爆发里昂起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已形成，西斯蒙第理想的回到宗法制度上去的实践纲领已不现实。因而，蒲鲁东试图用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式来“改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蒲鲁东是最“纯种的”和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蒲鲁东1840年写成了《什么是财产》一书，作出了“财产就是赃物”的结论。为了替自己的改良主义制造理论依据，蒲鲁东1846年出版了他的主要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7—218页、第221页。

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8年，蒲鲁东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革纲领。蒲鲁东的整个经济学说是以其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他写道：“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所以，我特别保证我自己产品的数量始终超过我所能消费的数量；同样，我的同辈们，他们也保证他们各自产品的数量也超过他们使用的数量。这项不言而喻的默约通过商业作用完成了。”蒲鲁东认为，凡是产品能够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被列入社会财富之内，它就成为构成价值，如果不被社会承认，就是“非价值”。一个生产者的产品要被社会所承认成为“构成价值”依据于直接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交换比例关系。蒲鲁东认为，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之所以不能实现或不能按照他所耗费的劳动完全实现是由于货币在作怪，如果取消货币，把所有商品都变成象货币那样的等价物能随时随地根据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直接进行交换，则供求可以一致，商品生产的矛盾也可以消除。蒲鲁东提出建立交换银行的设想，这个银行接受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发给劳动券，它表明耗费在生产这个或那个商品上的劳动的数量。交换银行采用劳动券组织市场交换。在改良交换的方案中，蒲鲁东主张取消利息，交换银行向工人和小生产者提供“无息信贷”。1849年，蒲鲁东着手根据当时很时髦的股份公司原则组织“人民银行”。根据蒲鲁东的计划，“人民银行”的资本为500万法郎，分为100万股，每股5法郎，实行无息贷款。“人民银行”于1849年2月11日宣布成立，加入股东的人数达1.2万人，由于蒲鲁东被判监禁，银行在不久宣布关闭。

19世纪法国另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让·巴蒂斯特·萨伊(1766—1832年)，萨伊继180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问答》、1828至1830年出版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这两部著作中，前一部著作只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压缩本，后一部著作虽然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加进了许多关于社会制度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但在理论上和《政治经济学概论》基本相同。萨伊在后面的研究中重复政治经济学分为生产、分配、消费的分类方法；商品的价值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共同协作的结果，因此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效用的生产费用，即工资、利息和地租；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就是物品的有用性；一切生产者的主要兴趣都不在交换价值，而在于用一种产品交换到另一种产品，货币只起媒介作用，因此，每一个卖者同时又是买者，在社会的范围内，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不可能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活跃于法国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学家是费雷德里克·巴师夏(1801—1850年)，巴师夏在40年代发表一系列小册子为自由贸易和反对关税保护主义辩论；他在1850年出版的其主要著作《经济和谐》中写道：“我说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服务，因此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贸易的乐土，使资本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卷，第63页。

巴师夏：《经济和谐》，1860年英译本第108页。参阅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页。

主义成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

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年)和费朗斯瓦·沙利·傅利叶(1772—1837年)是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圣西门从1802年发表著作,1817—1818年,他出版选集《工业或者政治、精神和哲学的推论》、1821年出版《论实业制度》等。圣西门认为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生产和分配的无政府状态、竞争、人民群众的贫困化以及工人的困苦状况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银行用一个统一的信贷体系把工业家阶级联合成为一支货币力量;未来社会制度是实业制度,在未来社会里,社会将把一切力量用于发展工业、科学和艺术,对人的管理和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所替代,国家将变成只是管理生产的机关,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生产;在未来实业制度里“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作者。”傅立叶与圣西门是同时代人,他们试图将未来经济理想化。傅立叶从经济因素解释社会发展,他把理想社会设想为由许多工农业相结合的“法朗吉”所组成的整体。每一个法朗吉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大家共同劳动、生活、平等,共同分享公共收入,实行免费普及教育,既学科学知识,也学工艺和劳动技能。法朗吉中全部的生产收入分配给成员,“必须使分配这样确定: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这样的分配是公正、和谐的理想社会。

3. 德国、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

(1) 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改良

德国是继英、法以后,19世纪欧洲大陆发展最快的国家。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地带,但是直到19世纪初,英、法已先后开始产业革命,德国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割据、经济上农奴制统治的国家。拿破仑战争对德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德国战败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失去了领土,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同时,拿破仑为了不战而征服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结果使德国和其它海外国家的贸易大为减少,工商业受到很大损失,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以及产品没有销路而被迫停工,经济更为困难。另一方面,拿破仑征服德国后,为了便于统治,便于在德国推销法国的商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政策,为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提供了前提。废除封建的农奴制度和建立强大和有效的近代国家机器是德国弃旧图新、富强国家的道路。1807年普鲁士首相斯太因颁布“农奴解放令”,揭开了德国的资本主义演进的序幕。

1815年拿破仑被打败后,德国参加了对法国的占领和要求战争赔款;同时,德国各邦诸侯力图利用拿破仑的失败机会来维护其封建统治,限制正在进行的农奴制改革。1816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皇家宣言”,规定只有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而且是两三代以来一直占有份地的农户,才能按1811年颁布的“调整法令”赎买封建义务。而且,森林、沼泽地和牧场都归领主所有,因而广大农民失去了使用它们的权利。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了“义务解除法”重申只有富裕农民才能赎买封建义务和“公有地分割

《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6页。

《傅利叶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1页。

法”规定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地分割变为私人所有。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具有很多局限性，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专制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德国经济落后与政治分裂这两大难题也未能解决。农奴制改革也涉及到普鲁士以外的德国其它公国，在巴伐利亚、拿骚、符腾堡、赫森—达姆施塔特、巴登、库尔格辛也先后开始改革、废除农奴制。但是，各公国农奴制废除并不彻底，或多或少保留了封建制度残余。德国1845—1846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增长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同时也加剧了上层统治层的矛盾。184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解决财政困难召开联邦议会，但议会提出只有在制定宪法的条件下才给国王拨款。国王拒绝制定宪法并决定解散议会，从而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不满。1848年，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邦国爆发了反封建专制的起义，才使德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全面地走上了“普鲁士道路”。农奴制改革，为德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816—1848年，仅在普鲁士就有35万农户赎回了封建义务，变成了自己份地的所有者，农民有了人身自由；地主在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过程中，得到了150万摩根的土地和1850万塔勒的赎金，成为资本积累；在赎买过程中，农民被剥夺了许多土地，以后又发生农民分化的过程，土地更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增长，农民比过去的农奴消费量提高，国内市场扩大了。这样，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变为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地主利用得到的土地和赎金逐渐地将其庄园改变为资本主义农场。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德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期间，德国农业中轮耕制代替了三圃制，人造肥料被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土壤得到了改良，使农业与畜牧业都得到了发展，养羊业的发展使德国取代西班牙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羊毛生产国。“普鲁士道路”不是经过革命手段废除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农民分化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而是在保存君主制度、贵族特权、农民无权以及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行改革，由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经济并分化出少数“大农”，使资本、土地相对集中，这种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为主线的改良道路与德国近代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德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普鲁士道路”的改革还伴随着允许开业自由、改革地方行政和法律制度、保障私人财产、造就技术人才、奖励发明以及军事改革等措施，从而为德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尽管德国在19世纪初政治上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拉开序幕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促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缓慢但稳步地发展了起来。1800年，德国工业产值为6000万英镑，1820年增加到8500万英镑，采矿业从1800年至1830年产量提高了50%，冶金工业增长了2倍。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已有明显增长，莱茵和威斯特发利亚的工业生产已逐渐采用机器，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先进地区；克里菲尔、巴门、萨克森的纺织业以及西里西亚的麻织业都有较显著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1824年开始在内河航运用汽船；1825年成立普鲁士莱茵轮船公司。这一切均为德国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随着德国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取消各邦间的关税壁垒，实行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政治分裂使各邦之间相互征收过境关税，各地币制、度量衡和工商条例差别很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例如一个商人从柏林运送货物到瑞士，途中还要经过10个国家，办10次出入境手续，上10道关税，税款总额远远超过了货物本身的价值。德国商人在国

外也因得不到统一的保护而无力与英法等国商人竞争。这种状况显然对工商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普鲁士率先进行关税方面的改革,1818年5月颁布了《关税法》,废除国内60个关税区,实行统一税则;随后,普鲁士又与其它邦国订立通商条约、相互协调对外贸易政策、订立统一关税条约。1826年,北德六个邦成立关税同盟;两年后,南德各邦也成立关税同盟。1834年1月,两个同盟合并,以普鲁士为盟主,包括18个邦,后来逐步扩大,除奥地利之外所有德意志邦国都加入了进来,称为德意志关税同盟。合并后的同盟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种封建关卡藩篱被取消,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这一切不仅为德国政治统一打下了基础,也为德国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德国产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同英国、法国一样,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纺织业首先成为先进部门。麻纺织业是德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工业,当时农民普遍种植亚麻和大麻,农民的家庭副业就是制作麻纺织品,也有专门从事麻纺织的手工业者。以普鲁士为例,1831年有252000架麻布织机,其中35500架属于专靠织布为生的麻布织匠,其他大部分织匠或者是农民家属在农闲时的副业,或者是农民兼乡村织匠。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包买商。到1839年,在普鲁士境内已经有11个生产亚麻纱的工厂;1837—1846年期间,采用机器生产的亚麻织厂由5个增加到14个;1834—1838年的四年间,在萨克森出现了40个较大的纺织厂,开姆尼斯成为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棉纺织业所用原料主要是从英国进口,如1834—1835年间关税同盟境内输入的棉花,就从155156公担增加到340969公担。到1846年,在关税同盟各区已有313个纺纱厂和750274个机械纱锭。但是,当时棉纺织业厂工作的工人人数仅有2327人,因为织布生产主要仍由家庭手工业者或分散的手工工场进行。德国在产业革命的初始阶段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蒸汽机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工业中还看不到。德国还是一个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占70%以上、农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70%以上的农业国。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工业发展加快,工业各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机器和新技术。1837年和1844年,在柏林和开姆尼斯先后设立机械制造厂。到1847年,仅普鲁士已有蒸汽机1100多架。19世纪初,全德仅有少数工厂,到40年代,仅普鲁士就拥有各种大小手工工场和工厂约7.80万家,到40年代中期,工人人数约70万人。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就是工人力量壮大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德国对煤田开始较大规模开采,资本主要来自科伦的商人。1846年,开采鲁尔煤矿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公司经营方式。到1850年,德国的煤产量已达700万吨。冶金行业从40年代以来也开始有了发展,1840年德国冶金产量为14.30万吨,到1850年则达到20.80万吨。1847年,在普鲁士拥有227座高炉,其中有32座高炉采用煤炭作燃料,在鲁尔甚至出现了使用焦炭的高炉。交通运输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普鲁士在1835年开始修筑铁路,到1845年全德铁路总长为2131公里,1850年达到6044公里。1837年和1847年又先后创办了汉萨汽船公司和汉堡——美洲汽船公司。德国产业革命以来,科技发明与创造也迈入新的里程。1837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分析了土壤的化学成分的组成,提出了合成肥料理论。19世纪50年代,氮肥、磷肥、钾肥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1833年德国教授高斯和韦伯发明了输电能力技术,1836年韦伯向来比锡——德累斯顿铁路提供发明,没有被

采纳，而同一年美国人摩斯的发明被采用了。但是，电力作为一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不仅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一系列技术发明的涌现和新兴工业的诞生。

“普鲁士道路”推动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艺技术、扩大了耕作面积。19世纪初有30%以上的耕地是休耕地，1850年休耕地仅为15%；“1816—1849年，德国牲畜头数增长很快，其中马匹由120万头增加到152万头，牛由400万头增加到530万头，绵羊从800万头增加到1620万头，猪从140万头增加到240万头”。“普鲁士道路”为德国进入产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和直接先驱者。李斯特的主要经济著作是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的整个经济学说是围绕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主张保护关税政策，因而李斯特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李斯特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根本缺点就是所谓世界主义和忽视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因此政治经济学应着重探讨的是如何发展本民族经济，它应“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为贸易保护辩论，按照李斯特的观点，向外国购买廉价商品，初看起来似乎会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德国将长期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

“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李斯特还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他写道：“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各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李斯特认为德国正处于第四发展阶段，幼稚工业应当实行关税保护，到第五阶段就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年)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9年)是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创立者。罗雪尔在其主要著作《历史方法观的国民经济学纲要》中勾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方法的一般轮廓，提出要用历史方法来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断言利用抽象分析在理论上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是不可能的。用罗雪尔的话说，不可能有适合于一切国民的一般经济理想，正如一件上衣不能适合一切人的身体一样，“我们的目的是单纯地描述人的经济本性和他的经济欲望，考察适于满足这些欲望的各种制度的规律和性质，以及他们所达到的大一些或小一些的成功程度。因此，我们的课题可以说是社会经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第170页。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3页。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8—129页。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页。

济或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希尔德布兰德的主要著作《现在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学》（1848年），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再是一些学者的财产”，他把经济科学看作仅仅是研究某一国经济的“国民科学”。希尔德布兰德认为，各个民族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克尼斯的主要著作是《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年），他否认经济客观规律，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只是简单地记述经济现象的科学。在克尼斯看来，认识经济现象的工具是统计学和历史研究著作。

（2）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一个后起之秀，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经历了“美国式道路”的过程。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在没有封建关系束缚的条件下，由小农经济的分化而自由发展为资本主义农场，这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典型。

在英国开始产业革命时，美国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当时是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块殖民地。在经济上，它是英国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庸，居民90%以上从事农业，手工业多是家庭副业和不大的手工作坊。美国独立革命后在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但在经济上却仍然依赖英国。虽然美国在19世纪初已有一些英国机器在纺织业等行业中应用，自己已有一些机器的发明，如著名的惠特尼轧棉机。但是，英国廉价的工业品源源流入美国，幼稚的美国工业无力与之竞争，美国50%的出口流向英国，75%的进口也来自英国，英国仍然控制着美国的市场。然而，英国不仅还想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美国，而且在经济上限制美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工业、商业的发展。结果导致了1812年至1814年英美战争，美国人称之为第二次独立战争，或争取产业独立的战争。从此，美国才开始真正的产业革命，走上了独立发展经济的道路。

美国为建立近代工业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是靠战争以及领土扩张。美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同时便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通过大规模向西扩张领土，到19世纪中叶已将国土迅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从独立时的37万平方英里扩大到302万平方英里。美国扩张领土的办法主要有二个，一是直接采用武力、强迫订约的手段吞并印第安人的土地。如1830年5月，杰克逊总统签署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把印第安人赶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二是进行战争兼并或强行购买。如1819年美国继1803年以每亩4美分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纳后又从西班牙手中强行以较低价格购买佛罗里达的东部。1846年美国把英国从俄勒冈挤走，同一年，美国通过对墨西哥的战争夺取了包括当前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亚利桑斯、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各洲及怀俄明州的一部分。这些土地资源丰富，为美国提供了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要优越的发展条件。此外，欧洲大量移民也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790年，美国人口总数不到400万人，1860年人口调查数字是3100万人。美国人口的大量增长不是靠自然增长，而是靠外来移民。仅在“1846—1855这10年中，就有100多万德国人逃来美国。1815—1860年期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要比这个国家

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英译本）第111页。参阅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7—328页。

1790 年时的全部人口还多。”移民中大部分是强壮劳动力，就“1820—1860 年的情况来看，15 到 40 岁的青壮年占男性移民的 67%。”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欧洲，其中有破产的农民，也有许多技术工人。19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城市人口约占 13%，农村人口约占 87%。外来移民和“西进运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许多商人、大牧场主和农民受到西部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肥美草原的引诱而大量移居西部。西部地区兴起了农业、畜牧业、商业、矿业以及各种加工工业。西部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美国产业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工业原料。西部地区同时也成为北部工业品的市场。西部畜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美国肉类加工业、罐头工业发达的主要原因。19 世纪美国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重要条件。

根据美国宪法以及《邦联条例》，美国政府将新取得的土地宣布为国有，从而使美国国有土地的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75%，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国有化土地最多的国家。广阔的西部国有土地的存在，使小农有可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获得土地，甚至无偿获得土地，从而产生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愿意采用无偿分配土地的办法将国有土地转变为自由农场主的私有土地。围绕着出售土地的最低限额、地价和支付条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土地运动的中心内容。19 世纪 20 年代初东部工人提出了平分土地的要求。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在纽约发生了与土地问题有关的抗租运动。在赫德森河和摩和克河谷的佃农还进一步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当地最大的地主温·伦塞勒家族和利文斯顿家族被迫同意将一部分土地分成小块减价出售，美国政府也被迫多次颁布关于变动出售西部国有土地条件的法令。到 1820 年 4 月，规定一人可承买土地最低限额由 1785 年的 640 英亩、1804 年的 160 英亩降为 80 英亩，每英亩售价也从 2 美元降为 1.25 美元。此外，农民还迫使政府于 1841 年颁布了《先买权法案》。该法案规定，自行占地进行开垦的农民有权按照最低价格优先购买自己已占用的土地。这样，一般农民获得廉价土地的要求基本上实现了。小农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在西部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美国农业没有旧的封建制度的束缚，通过“美国式道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大量个体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促进了产业革命。

美国的产业革命也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美国从国外引进的第一项技术是水力纺纱机，1813 年引进了动力织布机，到 1820 年，由于普遍采用动力织布机与多轴纺纱机，使美国棉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 1840 年，美国共有 1200 家棉纺织厂，开工纱锭 225 万。”美国在输入和采用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时，注重在使用过程中改进和创新。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美国发明了环形纺纱机、高压蒸汽机、无烟煤冶铁法、富尔顿汽船、惠特尼轧棉机以及缝纫机、收割机等。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许多工厂用一个高架的动力轴，经过密如丛林的皮带轮将动力传送到机器。惠特尼还应用零部件标准化的原理使一些机械设备的基本零件能够通用互换。零件的通用化和标准化是美国机器制造业方面的一个特点，也是美国工业技术发展的一个特征。美国在发

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上卷，第 586 页。

张友伦等：《美国工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5 页。

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 589 页。

展经济的同时注重采用贸易保护措施。1789年通过第一个关税法，1808年又相继通过了12个关税法，关税额逐步提高。但这一时期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库收入，还不是真正的保护关税。真正的保护关税是从1816年颁布的关税法开始的。当时美国的幼稚工业正遭到大量英国廉价商品倾销的冲击。1814年，从英国进口货物价值约1200万美元，1816年上升到14700万美元，美国的商品在国内市场也受到排挤，年轻的美国工业面临破产的危险。为此，美国1816年的关税法把进口税普遍提高到20%，其中棉纺织品提高到25%。1824年又普遍提高到30%以上，1828年，关税又大幅度提高，达到进口货物价格的40%以上。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兴起了交通运输热。美国交通运输的革新是从修筑公路开始的，美国第一条公路是从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通往兰开斯特的全长62英里的砂石路。到1825年，新英格兰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免费公路和收费公路体系。1830年，纽约州拥有长达4000英里的收费公路而居全国首位；居第二位的宾夕法尼亚拥有2400英里公路。收费道路的修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交通落后状况，对于西部早期的开发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成本高、赢利难等局限性。在修筑收费公路的同时，水上运输开发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开凿伊利运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1817年，联结美国东北部和西部的伊利运河开始动工，纽约州政府专为这条运河的修建拨款700万美元。1825年伊利运河竣工，全长363英里，宽40英尺，它把东部的哈得逊河同西部的大湖区联结起来，成为沟通东西部的第一条水路通道。过去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需要20天，现在只需6天时间，运输费用也从每吨90多美元降到9美元左右。伊利运河开凿的成功及其经济效益为其它州修建运河起到示范作用，许多州都拨经费、修运河。1840年，美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总长度约3000英里的运河网，成为世界上运河最发达的国家。1828年，美国开始修筑铁路，最早通车的路段是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之间的一段长13英里的铁路。许多州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资金并且允许私人投资和鼓励外国资本投资。联邦政府为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规定每修筑1英里铁路，无偿地拨给铁路线两旁各10至30英里土地，并提供补助金，即平原地区每英里铁路补助1.6万美元、丘陵地区3.2万美元、山区则4.8万美元。在这种优惠条件的刺激下，美国又掀起了兴建铁路的热潮。1850年，美国铁路线已经长达9021英里，成为世界上铁路线最长的国家。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大批华工被美国资本家诱骗“招募”去，从事最苦重而又报酬最低的劳动，如开矿、筑路等。中国的移民以艰苦的劳动参加了美国西部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开发。

美国蒸汽机的广泛运用较为迟缓。虽然美国在18世纪80年代已开始将蒸汽动力机用于矿井排水，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在工业中采用蒸汽机仍不普遍。即使在煤比较充足的宾夕法尼亚州，蒸汽动力也比水力约贵4倍。美国有很丰富的水力资源。沿大西洋西岸，美国有很多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的江河，它们流过硬质土地皮德蒙特高原而流经大西洋沿岸平原的松软土地时形成一些大瀑布。这些瀑布是设立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的良好条件。因此，19世纪初的美国工业主要依靠的动力是水力，而不是燃煤蒸汽机作为动力。早期的美国工业主要集中于新英格兰，而新英格兰又拥有许多的湖泊溪流和丰富的降雨量与森林地区，到处形成瀑布，以致于到1880年，新英格兰还被誉为“使用水力动力的魁首”。随着蒸汽动力在交通运输业中的

广泛使用、蒸汽动力成本的降低以及工业向城市的集中，19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采用蒸汽动力才迅速增加，从而也促使美国的钢铁、石油、化工以及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发明进入新的热潮。“1790—1811年，美国平均每年有77项发明。1841—1850年的10年中，美国商标局就发出了6,460件专利证，以后的10年发出了25250件。”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拍发了世界上第一份电报，报文是“上帝创造了奇迹”。揭开了世界通信业的新篇章。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促进了美国农业技术革命。在美国独立革命以前，美国农民使用的是笨重的木犁，1825年以后铁犁逐渐取代木犁；1833年，约翰·狄尔发明了全钢犁，为开发西部草原提供了锋利的农具；1839年，著名农业科学家杰西·布埃耳曾对新旧犁头作过对比，指出旧犁需4头牛和2个人才能拉动，而新犁只需要2头牛和1个人就可以拉动。新犁比旧犁效率高一倍。19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了研制新式农业机械的高潮。如奥贝德·赫西和赛拉斯·麦考尔研制的收割机获得专利；1835年，哈斯卡尔研制的马拉收割机也获得了成功；1831年，新泽西的威廉·曼宁发明割草机并获得专利；丘奇和乔治·威斯汀豪斯开始试制打谷机；赫伦姆和约翰·匹茨于1832年获得脱粒机专利权；1850年，在打谷机上安装了分离器使脱粒和簸谷可以同时进行，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此外，在1820年还发明了马拉干草耙，可以替代7至10人的劳动。19世纪40年代，又有小麦播种机、玉米播种机，以及各种类型的种植机。1855年在国际博览会的比赛中，美国的收割机、打谷机都胜过英国、法国的同类机器。美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化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齐头并进是美国产业革命进程中的特点。

丹尼尔·雷孟德（1786—1849）是美国第一个对经济学问题作系统阐述的人，在他之前的富兰克林和哈密尔登都没有建立起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体系。1823年，雷孟德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正式探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发展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哈密尔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决定经济作用的理论，断言国家所实行的高额关税和公债制度是促进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美国是研究和实践政治经济学规律的最好场所。

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高涨时期（1850—1872）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高涨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比以前更为有利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英国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全面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法国、德国1848年革命后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解脱了各种政治牵挂，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局面；美国通过南北战争，1862年宣布“黑奴解放令”，以及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宅地法》。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时代”。英国整个工业生产在20年间翻了约一番、德国翻了约两番，法国工业产值增长了两倍、美国工业的发展，从19世纪50年代初期到19世纪末，总产值增长了约12倍。

1. 英国产业革命后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

（1）废除《谷物法》后的英国农业经济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从1850年到1870年的20年间，英国的煤产量从4980万吨增加到11200万吨，增长2倍多；生铁产量从230万吨增加到610万吨，钢产量在1870年为24万吨；棉花消费量从5.90亿磅增加到10.80亿磅；棉纱工厂也从1900家增加到2400家；机械纺锤约有3000万锭，比法国或美国多6倍；重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资料指数从16.1%增长到36.3%。“187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32%，美国占23%，法国为13%。”在1870年的374亿马克世界贸易总额中，英国占14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法、德、美三国对外贸易额的总和。这与当时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是相符的。1870年英国拥有的商船吨位超过荷、法、美、德、俄诸国商船吨位的总和。伦敦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出售的外国有价证券，1860—1866年期间平均每年为3300英镑。英国还向欧美各国和殖民地输出大量资本，到1870年已达14亿英镑。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应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大农场已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优势，英国的农业产量增加一倍。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英国产业革命后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年这20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

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它标志着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决定性胜利。从此，资本主义在英国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面积为2470万英亩，200—500英亩的农场占地在1/3以上（8821000英亩），500英亩以上的农场约占1/6（3954000英亩），100—200英亩的农场占总面积的1/4强（6556000英亩）。到50年代中叶，英国小麦和裸麦的单位面积平均产量是每公顷25公石，超过法国一倍，英国宰杀的牲畜每头可得250公斤肉，为

库钦斯基：《世界资本主义研究》，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0页。

法国的一倍半。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为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农业采用机器，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1850年，伊普斯威奇的兰索姆—梅公司雇用了800多名工人，除搅土器、耙、打禾机、碎土机和其它很多工具之外，还制造了300多种各式各样的犁。”1846年废除谷物条例后，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英国市场，英国农场主受到外国廉价粮食的竞争，被迫进一步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粮价水平，以应付竞争。在1846年，即废除谷物法的那一年，每星期价格波动的极限是47先令5便士和56先令3便士；但是爱尔兰的饥馑年，即1847年，却有过1月的66先令10便士，5月的102先令5便士和12月的53先令。这样又逐步降到了1850年40先令强和1851年40先令弱的平均数，而在羊毛、牛油或牛肉方面并没有补偿性的上涨。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英国农业最早完成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农业中形成了地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

《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原则对保护关税主义的胜利。产业革命前，英国不仅对进口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对进口的羊毛、木材、生丝、煤及其它60种商品征收高关税，并且禁止机器、图样出口；产业革命后，英国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保护关税政策对英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不仅没有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障碍，它阻碍了英国以廉价的工业品打入世界各国的市场、发挥“世界工厂”的作用。19世纪中期，英国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主要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该党从1848年至1868年间，连续执政达16年之久，因此，自由贸易在此期间成为英国的国策。恩格斯说：“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自由贸易政策推行的结果缓解了人口迅速增长和粮食相对不足的矛盾。“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不列颠尤其早早地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1851年，大不列颠居民达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个，而法国是5个。伦敦的人口已达到230万，而巴黎仅逾100万。曼彻斯特的居民超过40万，格拉斯哥达30万，伯明翰有20万。”英国在1851年2400多万总人口中，约有五六百万人“靠外国面包生活”。1841—1846年，英国取消了605种商品的进口税和降低了1035种商品的进口税；1850—1860年，降低和取消了许多消费品的消费税，以及各种原料免税进口等，消除了关税保护的残余，从而既降低了英国产品的成本费用，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和进出口业务发达，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推动了其它国家改进关税政策，从而扩展了世界贸易，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俄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普鲁士、西班牙、法国等国先后降低了对英国商品的关税。1860年英法缔结通商条约，法国废除了一切禁止税则，降低了对英国工业品的关税。英国1862年同比利时、1863年同意大利、1865年同德意志缔结关税同盟、1864年同奥地利、瑞士缔结友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9—57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8页。

吴艾美等译：《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第110页。

好通商条约。1850年，英国输出的机器总值为100万英镑，1870年达到530万英镑。世界各国都向英国购买机器，英国还为世界各国制造船只。与此同时，英国经济的繁荣是与其殖民扩张政策分不开的，它力图把一切其它国家都变为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工业品市场，以巩固它在世界上的最大工业中心的地位。例如，英国殖民者为了侵占中国市场，1840年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又伙同法国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他们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除迫使中国割地（香港、九龙）、赔款外，还迫使中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和13处商埠，并从中国获得了任何进口商品只交纳5%特惠关税的特权。英国在1854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战后控制了土耳其；在伊朗、缅甸、南非、埃及、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等，英国在这一时期都进行了政治、军事扩张和经济渗入，要把它们都纳入其“世界工厂”的市场体系。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在论述英国19世纪中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的特殊地位时，曾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林木生产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放牧着我们牛群；秘鲁送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替我们种植茶叶，在东西印度扩大了我们的咖啡园、甘蔗和香料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菜园。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分布在美国南部，而现在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去了。”到1870年，英国殖民地面积已达225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00多万。英国资产阶级在扩张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仅向中国贩运鸦片一项，从1835年到1872年就获得14000多万英镑的利润；60年代，英国从印度征收的税款达6500万英镑。

（2）产业革命后的生产率增长

产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而后遍及工业各部门以及农业、交通运输等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的革命。英国产业革命完成以后进入50年代、60年代工业高涨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蓝皮书《联合王国简要统计一览》来说明英国这段时期的真正的“工厂”进步。马克思继续引用以下数字分析这一时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

表3—1

转引自《世界通史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9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表3—1，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5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输出量			
	1848年	1851年	1860年	1865年
棉纺织厂				
棉纱(磅)	135 831 162	143 966 106	197 343 655	103 751 455
棉线(磅)		4 392 176	6 297 554	4 648 611
棉织品(码)	1 091 373 930	1 543 161 789	2 776 218 427	2 015 237 851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磅)	11 722 182	18 841 326	31 210 612	36 777 334
麻织品(码)	88 901 519	129 106 753	143 996 773	247 012 329
织造厂				
经丝、捻丝、纺丝(磅)	466 825	462 513	897 402	812 589
毛纺织厂		1 181 455	1 307 293	2 869 837

	输出量			
	1848年	1851年	1860年	1865年
毛纱和精梳毛纱(磅)		14 670 880	27 533 968	31 669 267
毛织品(码)		151 231 153	190 371 537	278 837 418
		输出价值(镑)		
棉纺织厂				
棉纱	5 927 831	6 634 026	9 870 875	10 351 049
棉织品	16 753 369	23 454 810	42 141 505	46 903 796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	493 449	951 426	1 801 272	2 505 497
麻织品	2 802 789	4 107 396	4 804 803	9 155 358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	77 789	196 380	826 107	768 064
丝织品		1 130 398	1 587 303	1 409 221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纱	776 975	1 484 544	3 843 450	5 424 047
毛织品	5 733 828	8 377 183	12 156 998	20 102 259

(见蓝皮书《联合王国简要统计一览》1861年和1866年伦敦版第8卷和第13卷)

工厂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046	2715	2405
苏格兰	152	163	131
爱尔兰	12	9	13
联合王国	2210	2887	2549

纱锭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25 818 576	28 352 125	30 478 228
苏格兰	2 041 129	1 915 398	139 564

爱尔兰	150 512	119 944	124 240
联合王国	2 810 217	30 387 467	32 000 014

蒸汽织机台数

	1856 年	1861 年	1868 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75 590	368 125	344 719
苏格兰	21 624	30 110	31 864
爱尔兰	1 633	1 757	2 746
联合王国	298 847	399 992	379 329

在业人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341 170	407 598	357 052
苏格兰	34 698	41 237	39 809
爱尔兰	3 345	2 734	4 203
联合王国	379 213	451 569	401 064

“可见，从 1861 年至 1868 年减少了 338 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 20663 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量增加了，可见，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 1612547 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 50505 人。”

1851 年 5 月 1 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37—1901 年）主持了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式。博览会展出了近 14000 件展品，包括汽锤、水压机、工作母机、铁路设备、望远镜、照相机、形形色色的纺织品，以及各种贵金属。博览会还展出了法国、德国、美国等外国产品，但英国参展产品占了绝大多数。博览会表明，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不仅有发达的纺织工业，而且煤、铁工业、机器制造业、造船工业都具有当时的一流水平。从 5 月到 10 月，参观博览会的人数不下 600 万人。英国经济在 50 年代、60 年代能获得迅速发展与这段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1856 年发明了贝塞麦炼钢法；1867 年发明了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大大提高了钢铁生产的效率，“铣铁的产量在 1855 年—1865 年从 3218000 吨增加到 4819000 吨。在钢的大量生产有了相当基础之后，约有 50%—55% 的铣铁不是制成熟铁，就是制成钢。在 1855—1863 年英国的熟铁从 125 万吨增加到 170 万吨，到 1874 年（不景气的一年）熟铁产量为 180 万吨。”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英国的机器制造业产品越来越占显要的地位，它的机器、机床以及机车在许多国家畅销。从 1845 年到 1870 年，英国的机器输出量增加了 9 倍。在造船业方面也得到了发展。英国是第一个由用木材造船改用金属造船的国家。1850 年，英国造成并登记的船舶吨位为 13.40 万吨，1870 年达到 34.30 万吨。英国是最早将蒸汽动力运用于铁路运输上的国家。1847 年英国修建的铁路已达 9400 英里，以后开始了兴建铁路的狂热时期。1854 年到 1864 年，铁路线增加 4000 英里；1863 年，伦敦第一条地下铁路通车；到 1870 年，英国已基本筑成了现代铁路网。冶金业、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在 1869—1871 年英国采煤业的机构经过了扩充，矿井数增加了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476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中册，第 76 页。

1870年，英国已经是工厂林立、巨大的工业城市纷纷兴起、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从事工商业的工业国。“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与此同时，在19世纪中期，英国还大量向国外倾销工业产品、输出资本和技术。5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的铁路由英国人承包建造，英国还提供部分筑路资金。1857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进一步对殖民地经济渗透，例如，英国大规模在印度兴建铁路。殖民地既是英国的原料产地，又是英国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19世纪上半期，英国资本投向全世界，但投入殖民地的资本并不多。50到70年代，投入殖民地的资本比重增加。1850年，英国的国外投资，三分之一在美洲，其余的主要在欧洲；1854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总数约为3亿英镑，1860年约为6.5亿英镑；1868年英国投入印度铁路的投资约7500万英镑；1870年，在7.5亿英镑的国外投资中，约四分之一作为借款贷给殖民地政府。

工业、农业的发达也促使了英国信贷事业的发达，为金融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信贷业务也加速了流通过程，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以后，从50年代开始，英国股份银行大批涌现。1826年，英国曾颁布条例在法律上认可了股份银行，到1855年，英国认可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并于1862年颁布了股份公司法。“1854年6月8日，伦敦各私人银行家允许各股份银行参加票据交换所的组织，此后不久就由英格兰银行实行最后的票据交换。每天的结算都是通过各银行在英格兰银行所开的户头的转账来进行的。这个制度的采用，使各银行以前用来互相结算的大额券成为多余。”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工人却处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之中。1863年，自由党财政大臣格拉斯顿在下院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英国的贫民人数在增加，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然而，英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总体来说还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19世纪人们的生活状况比18世纪有了明显的改变。据统计，1850年至1882年间，在同一行业中的工人工资提高30%，平均增加50%。同一时期，有产阶级的税收占工资的16%，而1882年时只占工资的7.5%，大多数工人逐渐晋升为熟练工人，享受着与他们的熟练程度相称的工资待遇。30年代以来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日斗争的胜利使工人劳动时间

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1卷上册，第24、12—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6页。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59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71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同上书第717页。

一般每周 54 小时左右，比 19 世纪早期有了较大的改变。此外，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科学文化的繁荣，如出现了文学大师狄更斯（1812—1870 年）等，自然科学方面有代表性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及英国 19 世纪经济的迅速增长使英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英国一直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起领导作用。它曾是“世界工厂”，世界金融中心，掌握了海上霸权，成为殖民帝国；它曾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把资本的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英国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进入经济衰落时期。

2. 美国、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

（1）法兰西第二帝国经济

七月王朝（1830—1848 年）统治法国 18 年，实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和推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但七月王朝是一个由金融贵族统治的王朝，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七月王朝实行的内外政策大都是有损于金融贵族集团的，因而引起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并随着国内经济困难而加剧。1845 年和 1846 年，法国遭受因马铃薯病害和农业歉收造成的严重饥荒，地主和资本家乘机进行粮食投机，粮价暴涨；加之 1847 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法国，使法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在色当、圣德田和加莱的失业工人已达三分之二以上。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 50—60%。因此，饥民骚动遍及全国，他们捣毁地主的庄园，强行占领地方粮仓；工人罢工和游行反对工厂主降低工资和七月王朝统治。1848 年爆发了以工人为主发动的二月革命，他们占领王宫，把国王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焚毁，七月王朝被推翻，资产阶级共和派立即采取行动，组成了临时政府，即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1848～1852 年）。临时政府颁布了《劳动权利法令》，规定政府必须“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保证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成立了解决工人问题的“政府劳动委员会”，会址设在卢森堡宫，因而又称“卢森堡委员会”；先后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大城市开办“国家工厂”，保障所有失业者都能就业，但不保证职业的性质。国家工厂采取半军事性组织形式收容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每天安排工人做植树、筑墙、挖土等一般性劳动，每个工作日给 2 个法郎，非工作日减半或更少些。当时仅巴黎一地的国家工厂就收容工人 10 万人。此外，临时政府还颁布了将工人的工作日缩短一小时的法令，规定巴黎工作日为 10 小时，外地为 11 小时；同时临时政府加紧了对小生产者和农民征收新税，并说收税的主要目的是养活国家工厂的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根据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举行总统选举，结果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国总统，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此后，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于 1852 年 12 月 2 日宣布法兰西为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 年），他自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这是一个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工业家的帝国。

拿破仑三世称帝后，为了维护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工业巨头的利益和巩固

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在经济方面，拿破仑三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对工业的干预；还设立了一些专门银行对工业和农业贷款；他还积极引进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加快国内交通运输的改革；大规模改造巴黎市区，在塞纳省省长胡斯曼男爵的精心筹划下，拆除了2万栋房屋。巴黎出现了宽敞笔直的林荫大道、巨大的商场、华丽的歌剧院、环境优雅的公园并修建了许多富人的宅第。拿破仑三世改造巴黎的意图是让巴黎作广告来显示第二帝国的繁荣。此外，巴黎在当时还举办了多次大型国际博览会，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帝国力图发展经济以使法国在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在这一时期，拿破仑三世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专政和一系列政策，使国内出现了一个政治比较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样也就为法国50年代、60年代的工业发展和经济高涨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大到极大规模。这一时期，法国整个国民经济都非常活跃，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法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51年至1869年，法国煤产量从450万吨增加到1350万吨；铁产量从44.50万吨增加到138.10万吨；钢产量由1.40万吨增加到11万吨。主要工业部门如采煤工业、冶金工业都已广泛使用机器。1852年法国有蒸汽机6000多架，到1869年增加至26000架，蒸汽机增加4倍多；1848年法国铁路线只有1900多公里，到1870年增加至11000公里，铁路线长度增加5倍多。轻工业发展更快，到60年代末，法国奢侈品、服装等产业每年生产总值约为15亿法郎，而全部矿业、采煤和金属工业品的生产总值只有5.65亿法郎。1866年，在巴黎有44.20万工人，在大企业中做工的仅5万余人，其余均分布在法国的中小企业里。20年间，法国的工业增长了两倍，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两倍；航海商船吨位增加了6倍，1852年对外贸易额为20.46亿法郎，到1869年增加至80亿法郎，对外贸易增加3倍。

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业和交易所投机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法国银行资本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工业资本的发展。银行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非常发达，仅法兰西银行的业务总额就由15.90亿法郎增加到83.20亿法郎，共增加4倍。在50至60年代，法国不仅旧银行业迅速扩大，而且还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组织机构，如信贷总公司、地产信托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如巴黎证券交易所1861年有价证券总额还只有110亿法郎，到1869年就增加到了330亿法郎。这些金融组织或享有抵押贷款独占权，或投资于外国的铁路建设。1870年，法国已成为14个国家的债主，对外的投资和贷款达到120亿法郎，金融资本不仅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要影响、控制世界资本市场，巴黎开始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银行业的发达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1863年，183家大富豪拥有200亿法郎的股票和债券，他们控制了银行、航运、铁路以及工业企业等。大金融家一般都和皇室有较密切的联系，因而经常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为了满足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工业家扩大投资场所、占领更多市场的要求，拿破仑三世对外采取了不断扩大的政策。法国多次参加欧洲战争，1854—1856年，法国与英国联合进行瓜分地中海东部势力范围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对外扩张中，法国参加了和英国一起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和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60年代，法国又支持殖民主义

者开凿苏伊士运河与英国争夺埃及。到 1870 年，法国已占有 600 多万人口、90 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原料基地。1870 年，法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殖民大帝国。

拿破仑三世上台时曾得到农民的支持，但他对农民的承诺并没有实现。在第二帝国时期，农民的赋税负担从 7 亿法郎增加到 12 亿法郎；小农土地被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仅 1862 年，农民出卖土地的总值已达 20 亿法郎；由于苛捐杂税和物价不断上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生活相对贫困。到 1860 年法国还有不少企业保持 12 小时的工作日。此外，拿破仑三世对外政策的失误也造成了第二帝国的危机。1860 年，法国同英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规定两国相互大幅度减让进口关税税率。例如，英国的煤、铁、机器和纺织品输入法国，而法国的葡萄酒与烈性酒输入英国，都相互减让进口关税。由于法国工业当时还远不如英国发达，因而，完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采取降低关税的措施，使法国许多工业部门面对进口的廉价商品的竞争而受到损失。因此，英法商约的签订引起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不满。拿破仑三世原本期望英法商约的签订可以建立英法之间更为友好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结果却失去了法国资产阶级对第二帝国的支持。第二帝国后期外交政策失误较多，如拿破仑三世 60 年代对墨西哥战争的失败，使帝国财政每月需付出 1400 万法郎，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870 年 7 月 19 日，第二帝国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失败，同时也结束了第二帝国的统治。19 世纪最后 30 年，法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与后起的德国、美国相比则显得相对的缓慢。70 年代以后，法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已从第 2 位下降到第 4 位。

（2）美国工业资本的迅速增长

美国在 1850—1860 年期间，工业生产又有了较大的增长，铁路线从 1.50 万公里增加到了 4.80 万公里，工业投资约增加了 2 倍，达到了 1 亿美元。工人人数从 95.70 万人增加到 130 万人，全国人口从 2300 万增加到 3140 万，西北部各州人口 10 年内增加了 67%。美国人口的大量增长不是靠自然增长，而是靠外来移民。“仅在 1846—1855 年这 10 年中，就有 100 多万德国人逃来美国。”土地开垦的面积也迅速扩大，西部是小农的天地，移民可以从三条渠道取得土地。首先是购买国有土地。“1840 年到 1860 年这 20 年间，联邦政府共处理了 269466415 英亩国有土地，其中出售的有 68752889 英亩，其余的作为无偿馈赠”。其次，可以购买公司、铁路、土地投机商的土地。如“联邦政府曾赠给一家铁路公司 250 万英亩，而该公司在 7 年间以 1400 万美元卖掉了这片土地的一半”。最后就是自己在西部还未开垦的地方占地。50 年代，西部移民一般只能选择前两种方法，即购买土地。1860 年，美国的农场数已达到 2044000 个。西北部农场经济的发展为东北部各州的工业产品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但是，在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经济却呈现另一种景象。奴隶制严重地阻碍了工业发展，生产技术落后，人口增长缓慢。南部还盛行奴隶制式的大种植园经济。南部平原辽阔，土地肥美，气候温暖，比较适宜进行粗放种植经营方式。殖民初期，南部殖民者建立封建制没有成功，

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上卷，第 586 页。

卡尔·桑得堡：《林肯传》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62 页。

卡年·桑得堡：《林肯传》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62 页。

转而采用强迫性的奴隶劳动。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成为南部殖民地的主要经济形式。“南部各州虽然在 19 世纪上半叶生产了大约占世界 7/8 的棉花，”满足了英国产业革命中机器棉纺织业以及美国北部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而南部各州的棉纺织却发展迟缓。例如，1850 年，南部各州有棉纺织厂 166 个，工人约 1 万人左右；而北部的新英格兰州就有棉纺织厂 564 个，工人约 6 万人左右。1857 年，南部棉花产量达 538 万包，而到 1860 年则降到 384 万包。南部的其它工业也没有多大发展。1860 年，北部和中北部各州的工业企业已占全国的 61.4%，资金占 83.3%，工人数占 83.4%，产值占 83.2%，而南部和中南部各州所占比重仅分别为 20%、14.5%、12.8%和 13.1%。19 世纪中叶，在政治上表现为废除奴隶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西部土地问题、工业革命的全面发展等威胁美国的独立和统一，经济上严重阻碍美国资本主义的深入推进。美国南北战争 1861 年开始，以 1865 年南部奴隶制的失败而告终。

美国获得幅员辽阔的新领土和广大移民到西部定居，是南北战争前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内战结束以后，移民继续向西部迁徙，占据和开发了西部的农业用地，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国外新移民源源而来。从 1861 年到 1870 年，移民数达到 2064000 人。新的移民既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又带来了技术和经验，为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862 年，林肯政府正式颁布《宅地法》，规定凡年满 21 岁的美国公民，在缴纳 10 美元手续费以后，就可以领取 160 英亩的宅地，耕种 5 年以后，就可以领取执照，成为宅地的所有者。《宅地法》宣布无偿分配土地，从而解决了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的西部土地问题。《宅地法》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经济基础。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又继续颁布了一系列优惠的土地法令。例如 1873 年颁布了《育林法》、1877 年颁布《荒地法》，以及 1878 年的《木材石料法》等。通过一系列的法令与措施，不仅使农民较普遍地拥有了归自身所有的耕地，而且允许农民在宅地之外还可按照一定条件，如承诺扩大树木种植、对荒地实行灌溉等，申请领取额外的土地，或以低价购买大量荒地。1862 年《宅地法》的实行，兴起了美国又一个西部热潮，大批农民向广阔的西部地区涌进。1868~1900 年，根据《宅地法》的有关规定，约有 60 万农户分到宅地，总面积达到 8000 万英亩。美国的农业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新建农场数也迅速增加。据统计，1840 年，美国总的土地面积约 11.20 亿英亩，1850 年扩大至 18.80 亿英亩，1860 年以后至 1910 年约为 19 亿英亩，其中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例由 1850 年的 15.6% 增加至 1860 年的 21.4%、1880 年的 28.2%、1890 年的 32.7%和 1910 年的 38.8%。“1860—1916 年期间，美国农场的数目从 200 万多一些，增加到近 640 万个，即增加了 2 倍多。”以致农场的平均规模由占地 199 英亩减至 1880 年的 134 英亩和 1910 年的 139 英亩。它表明，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拥有较少土地的中小农民在美国增加得很快。与此同时，《宅地法》颁布后，土地集中的趋势也在日趋加强。许多银行家、土地投机者和政客纷纷抢购西部的土地，从而加速了土地的集中。特别是在西部的几个新州中，土地集中的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第 409 页。

吉尔伯特·C·菲特、吉斯·E·黑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5 页。

情况更为突出。如，“加利福尼亚就有数百万英亩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中查普曼是一个最大的地主，他一人就拥有近百万英亩的土地；还有米勒和米奇尔也拥有 10 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土地集中的结果，一方面是大农场和租场数目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小农迅速丧失土地而成为佃农、农业工人或失业者。随着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增加和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标志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即“美国式道路”取得成功。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当时美国经济的支柱，农业的产值增长情况如表 3—2。

1800—1860 年美国农业产值增长情况
表 3—2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家畜产值	农作物产值	合计
1800	127	93	220
1810	186	125	311
1820	178	180	308
1830	251	176	427
1840	431	268	699
1850	414	423	837
1860	700	769	1469

资料来源：[美]《百科全书·经济》第 664 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农业生产在 1800—1860 年间增长了 5.7 倍。农业产值在 1869—1878 年间占私人国内总产值的 38%，占工矿业（包括建筑业）1869 年产值比重的 51%。当时美国工业中的半数以上是以农畜产品为原料。因此农业不仅是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美国历年来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 1862 年在“美国农业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局，专门从事指导和管理农业方面的事务。1889 年，这个局升格为部，并在部之下建立若干局，分工负责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产品销售、农业信贷以及农业统计资料的搜集与公布等。继联邦政府之后，美国各州相继建立起管理农业的部或局。美国建立的农业组织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美国农业发展的措施。首先是要发展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从根本上改进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186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梅里尔法》，规定各州至少要拨出 3 万英亩土地作为建立农业高等学校的创办费和维持费，全国先后拨出了 1100 万英亩土地。1887 年制订了《哈奇法》，规定每年拨给各州 15000 美元，在各州建立农业试验站，进行因地制宜的农业科学研究与推广。其次是要协调农业的发展。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农民所垦殖的土地大多位于干旱地区和半干旱地区，联邦从财政上支持解决灌溉问题。美国农业从 60 年代以后有了更快的发展，许多农场广泛采用机器耕种，使用人造肥料，改进耕作技术。如 1861 年，美国使用的收割机达到了十几万台，从南北战争结束到 1900 年，约有 12000 多项农业方面的发明取得专利权，从备耕到农作物收获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美国农机和农具的总值（按当年美元计算），1860 年为 246 188 141 美元，半个世纪后

增加到 12 650 149 783 美元。” 1860 年，全国化肥使用量为 16.4 万吨，到 1910 年增加到 554 万吨。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农业生产有了很快的增长。1860~1900 年，小麦增加 3 倍，占世界产量的 23%；玉米增加 2.5 倍；棉花增加 1.5 倍；牲畜总数 1867—1900 年增加 1 倍。美国成了世界市场中粮食和肉类的主要出口国。随着美国农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美国的工业也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1860 年美国工业产值 19.07 亿美元，超过了农业产值 14.69 亿美元，这说明，美国经济从 60 年代起已开始走向工业发展的道路。1840 年，美国共有 1200 家棉纺织厂，开工纱锭 225 万，1860 年，美国已拥有纱锭 520 万枚左右，占世界第二位，与法国并列。从此，资本主义机器棉纺织业在美国替代了手工纺织业。1860—1913 年，美国棉纺织业产量增加 6 倍。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铁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867—1873 年，已建成的铁路有 3,300 英里。”美国在 1850 年铁路线已长达 9021 英里，是世界上铁路线最长的国家；1860 年，中西部铁路已占全国铁路长度的 31%，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已达 1800 英里；1865 年，美国铁路已担负了全国货运量的 2/3；1869 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接着又建成 4 条横贯大陆的干线。大规模修建铁路，密切了西部农业和东北工业区的经济联系，加速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飞速发展。铁路刺激美国钢铁工业增长，它对机车、车辆、铁轨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钢铁工业的技术改造并对炼铁炉的熔炼规格要求增大。“南北战争前的高炉每天约生产 40 吨；19 世纪末，每天就能生产 400 吨。1873 年，美国钢产量是 14 万吨，1886 年就达 250 万吨。19 世纪末，仅仅卡内基钢铁公司的生产能力就相当于英国全部钢生产能力的 4/5”。1860 年以后，美国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蒸汽动力，到 70 年代蒸汽动力已超过水力动力而居主导地位。电动机的发明与应用也使工厂动力数迅速增加，“1869 年，美国安装动力是 200 多万匹马力，可是到 1899 年就达 1000 多万匹马力”。美国石油工业诞生于产业革命后期。“1859 年，德雷克在克利夫兰打开第一口油井以后，石油工业就发展起来。1863 年，大西洋铁路线就运载了石油 150 万桶以上。”克利夫兰成为一座石油工业城市。1870 年，美国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由洛克菲勒创立。“美国在 1870 年时石油开采量为 2 亿加仑，1900 年时增至 27 亿加仑。1839 年，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把巴西的天然橡胶与硫磺混合起来，发明了橡胶硫化法。”次年，固特异轮胎公司成功地进行了橡胶硫化工艺。从 50 年代起硬胶胎应用于马车；1849 年，美国橡胶工业已拥有职工 2000 多人，橡胶制品的年产值达到 300 多万美元。尔后美国的橡胶工业在这个基础上迅速发展并为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新兴工业推动下，美国经济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1860 年，美国工业总产量还排在英、法、德三国之后，居世界第四位，到 1894 年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860 年美国工

吉尔伯特·C·菲特、吉斯·E·黑斯：《美国经济史》第 518 页。

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史纲》第 151—152 页。

奎特：《美国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伊利诺斯 1978 年版第 2 卷，第 21 页。

科克兰德：《美国工业的成年》纽约 1961 年版，第 164 页。

柯利尔：《洛克菲勒王朝》中文版，第 9 页。

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4 页。

业总产值 19 亿美元，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17%，1894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达到 94 亿美元，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30%。

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为了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美国于 1861 年通过了《莫里尔法令》，将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 1861 年的 18.8% 提高到 1862 年的 36.2%；1864 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战争关税法》，进一步把进口平均税提高到 1865 年的 47.6% 和 1866 年的 48.3%。美国政府高筑关税壁垒，不仅保证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在抵御英国廉价商品冲击、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工业发展，特别是钢铁工业、毛纺与丝织工业等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76 年起，美国结束了长期进口大于出口的状况，开始出现贸易顺差。高额关税保护是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也是 19 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美国为了发展经济，从法规政策的制定到政治体制的确定均围绕这个中心。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美国政府采取鼓励移民、招收外国劳工政策。1864 年，联邦政府颁布《契约劳工法》，使外国契约工人入境获得法律依据，移民人数快速增加；为了使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具有坚实基础，美国注重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1870 年，美国获各种学位的人数为 7000 人，1863 年，美国建立了国家科学院；美国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体制的建立，“人权法案”的实施，政府内外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等造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些均是美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美国近代后期经济（1816—1870）主要还是以农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历史，从 1860 年开始工业总值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经过南北战争，到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经济跳跃式地迅猛发展。

19 世纪中叶，亨利·查理士·凯里（1793—1879 年）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社会科学原理》（1857—1860 年）主要阐述其经济和谐论，其经济理论与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相适合。凯里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房屋、斧头，即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价值逐渐下降”而“使劳动者所耗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报酬随着增长，”因为人类比过去已经能够更容易地创造资本；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有四个时期，即用石斧进行生产、用铜斧进行生产、用铁斧进行生产、用钢斧进行生产。具体变化过程如表 3—3。

劳动生产率发展四个时期

表 3—3

劳动生产率提高时期	总收入	工人的份额	资本有的份额
用石斧进行生产	4	1	3
用铜斧进行生产	8	2.66	5.33
用铁斧进行生产	16	8	8
用钢斧进行生产	32	19.20	12.80

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总收入增加一倍，而工人的收入不仅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工人在第一个时期只得到总收入的 1/4，而在最后一个时期则得到总收入的 3/5。而资本家从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由 3/4 降低到

凯里：《社会科学原理》第 1 卷，第四章第三节。见《经济思想史读本》（斯·荷·帕特逊编），英文 1932 年版，第 453 页。

了2/5，但绝对量却由3增加到12.8。凯里称：“这就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这个规律可以说是一切科学书籍中所记载的最美好的规律，因为它而建立了人类各阶级之间一个真实利益的完满的调和。”

3. 德国产业革命进入高潮

(1) 普鲁士道路与工业资本的发展

从1848年起到1870年，“普鲁士道路”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取得全面胜利的阶段。它使德国19世纪50、60年代产业革命进入了有决定意义的发展阶段。工业在20年发展中带来的成果比过去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德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

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使德国农村中的封建关系逐渐瓦解，许多墨守陈规的贵族纷纷破产，大部分容克转而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1850年3月，普鲁士政府颁布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该法令规定：在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无偿取消农民一切次要的封建义务，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与土地占有直接有关的其它封建义务。赎买的办法有两种：一是交纳赎金，其赎金数额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相当于由主要封建义务折算成的货币地租额的18倍；二是农民出让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相当于赎金。1850—1865年，在普鲁士有1.30万户大农和101万户小农办理了赎买封建义务的手续。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为赎买封建义务而缴纳给地主的现金达1970万塔勒，割让给地主11.30万摩根的土地。在其它邦国，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也进行了类似的赎买。巴伐利亚和纽伦堡等德国的其它地区，绝大多数农奴赎买了封建义务变成了农民。与此同时，各邦国政府还通过法律，强行破坏农村公社，使公有土地的面积大为削弱。如1849年到1859年普鲁士的农村公社的荒地和牧场面积从800万公顷缩减为440万公顷。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结果，一方面使因赎买封建义务而丧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成为富裕农民或容克地主的农场雇工，或者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富裕农民人数增多，形成一个富农阶层。与此同时，容克地主还继续从农民那里获取大量赎金和土地并不断扩大他们的农场。由于大量土地集中在容克地主和富农手里，在农村中形成容克地主和富农联盟。60年代，仅普鲁士就有350万雇农；60年代末，占全国农民总数71.4%的小农户只拥有耕地总面积的9%，而占农户28.6%的地主和大中农户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91%。

19世纪50年代后，德国城市规模增大、人口增多、粮价高涨，加上马铃薯酒在国外市场畅销等原因使容克地主感到实行资本主义经营对他们更为有利。因此，容克地主阶级利用在农民赎买封建义务以及50年代后国内粮价上涨条件下积累的大量货币财富，加上部分政府与私人信贷，开始建立起资本主义农场。他们采用先进生产工具和优质肥料从事生产，改良土壤，同时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如甜菜工业和酿酒工业，从而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商品率增大。1850—1870年，普鲁士小麦单产增长20%以上，甜菜单产增加了25%。容克经营的农场遍布东普鲁士。全国大农场控制了德国总耕地面积的54%，一些容克地主兴办农副产品工业或者直接投资近代工业，成为企业

凯里：《社会科学原理》第一卷，第四章第三节，见《经济思想史读本》（斯·荷·帕特逊编），英文1932年版，第463—464页。

家。

德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是封建地主经济逐渐过渡到资产阶级—地主经济的改良道路。经过这种资本主义的改良，容克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同时，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趋一致，因而实现统一、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他们共同的迫切要求。德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工业资本与农业大地产的密切结合，从而为加速德国产业化进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德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鲁士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851年颁布了《财产所有者法》，保护企业主的权益；1865年颁布了《通用矿山法》，统一了矿山管理的法规并给予矿主一定的自治权。

进入19世纪50年代，德国产业革命以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在统一前出现了一次产业革命大发展的高潮。从1850年到1870年的20年间，德国经济发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1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5%；煤产量从690万吨增加到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至126.10万吨；铁路线从5856公里增加至18876公里。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1861—1870年间，生产资料的生产提高了23%，而消费品生产增长了9%。工厂制度在重工业中占主导地位，从而带动了其它工业的发展，使德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正是由于德国较快地把发展工业的重心转移到重工业领域，才使德国能够迅速克服落后状况，跻身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13.2%，仅次于英国（占32%）和美国（占23%），超过法国（占13%）而居世界第三位。

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铁路与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1835年德国才铺成第一条从纽伦堡到费尔特，全长仅12公里的铁路，但10年之后，在德国已形成柏林、科隆、慕尼黑、纽伦堡、法兰克福等铁路中心。尔后，德国兴起了大规模投资铁路热。在1851—1870年间，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从6000公里增加到19600公里，机车的数量由498辆增加到3485辆，增加了7倍；货车车厢由6825个增加到76824个，增加11倍；在1850—1870年间铁路的货运量增加了19倍。铁路是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是促进统一、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一些封建王公诸侯最初对铁路的建筑有疑惧心理，有的邦国曾采用不同的轨距，最后又不得不扒掉重建。汉诺威国王曾表示他不同意修筑铁路，因为他不想“让裁缝和鞋匠旅行起来和他走得一样快”。但是工业化进程以及德国战略需要使德国铁路发达起来，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各邦已基本联成了统一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在兴建铁路的同时，公路建设、内河航运和海运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世纪中期，铁路的铺设，机床的制造，轮船以及武器的生产，迫切需要大量钢铁，推动了新炼钢法的产生。在英国工程师贝塞麦炼钢法问世后不久，1864年德国的西门子和法国的马丁发明了平炉炼钢法，使钢铁生产能够大规模进行，新的炼钢技术得以推广应用。1867年克虏伯父子发明了坩锅法，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冶金工业的发展。化学工业在德国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化学工业的兴起和纺织、农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最早纺织品漂白是用酸牛奶和草木灰作为碱性，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蒸汽纺织机的应用要求加速这个过程。德国化学家霍夫曼和柏林大学的一些学者集中研究了煤焦油染

料化工技术，先后合成了多种染料、香料、杀菌剂、解毒剂等，促进了德国煤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1847年，普鲁士炮兵军官维尔纳·西门子创办电报机制造所。50年代德国有了海底电缆，60年代铺入大西洋海底。德国的毛纺织工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1840—1860年，德国原毛进口从8300吨增加到18800吨，而原毛出口则从7500吨减少到4700吨。1861年，在德国境内已经有1067个呢绒工厂，拥有2592台机械织机，但也还有手工织机约11818台。1848年后，德国兴起创公司热，在1851—1870年间，仅在普鲁士就创立了295个大公司，包括矿山公司、冶金公司、保险公司、铁路公司等，拥有资本约24亿马克。这时，德国一些大公司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设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1851年只有704名职工，到1870年增加到了16000人。这一时期，比利时、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外国资本家也纷纷涌进莱茵区的工业企业，这对德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19世纪中、下半期，德国的商业和金融业已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体系，许多大银行、大股份公司纷纷建立。1851—1870年间，仅在普鲁士一地就产生了20个银行，它们拥有9470万马克的资本；在巴伐利亚出现的两个银行，拥有资本5660万马克；1848年创办了拥有1710万马克的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1856年产生了拥有1680万马克的柏林商业公司和拥有2400万马克的中德意志银行；1870年建立德意志银行，1872年又建立德累斯顿银行。银行开展对工商业的信贷作用，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银行资本也开始逐渐渗透到工业企业中，从而为卡特尔等垄断集团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显然是国家的分裂状况。19世纪30年代建立的关税同盟并没有包括整个德国，不同货币和不统一的度量衡等不仅使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难于进行，也使德国以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竞争遇到了困难。因此，消除分割，统一德国，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本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化容克，拥有大片庄园，同时又开办工厂、从事证券投机。俾斯麦原来不赞成统一，50年代以后，他认识到只有顺应历史大势、完成统一，才能更好地维护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阶级的利益，促使德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而他成为德国统一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铁血宰相”俾斯麦以一系列改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配合外交权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于1871年统一了德国。

1870年后，德国工业革命进入最后完成的阶段。1870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不仅使德国根据法兰克福和约条件得到50亿金法郎的法国战争赔款，而且兼并了有着发达的棉纺织业和丰富的钾盐矿藏和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德国加速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德国统一以后，实行了以金马克为基础的币制改革，建立了中央银行，统一了纸币发行权，统一了全国的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交通运输的管理。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也在加快；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一开始就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建立了大型企业；垄断组织在采煤、冶金、电气、化学、纺织等许多工业部门相继形成。19世纪后半期德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科技领先，国家支持和鼓励科学研究，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很多企业也建立了研究机构，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技术。德国还注意引进国外的技术和人才并大力发展教育。德国统一后，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领域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德国工业开始了跳跃式发展，不仅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且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2）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67年，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是对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巨大贡献。《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毕生心血、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结晶。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富裕的犹太族律师家庭。1835年中学毕业以后，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后来转入柏林大学，1841年毕业。除了法学外，马克思在大学里重视哲学研究，他大学毕业时作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1842—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并担任主编。1842年10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的第一篇经济论文；1843年初，马克思又发表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分析了摩塞尔河沿岸酿酒农民的贫困状况，为他们的利益辩护。分析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的论文使马克思产生了对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动力。马克思后来谈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也曾说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结识了恩格斯，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对马克思有较大影响；马克思曾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并给予极高评价。40年代，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他阅读了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人著作，并作了详细摘录，即后来被称为“巴黎笔记”的马克思的第一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笔记。马克思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也是马克思最早的经济著作。50年代前期是马克思为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作准备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马克思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重新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专门研读了关于经济发展史、货币银行学、人口理论等有关书籍和资料。从1850年8月到1853年6月，先后写下了有关经济学笔记24册；1857年11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完成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这份手稿共有七个笔记本，308页，是马克思第一次系统阐述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其内容涉及了后来《资本论》的主要内容；1859年6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阐明了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写了另一部政治经济学手稿，手稿共有笔记本23册，1742页，它是《资本论》的第二稿；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工厂主的家庭。青少年时期恩格斯先后在巴门中学和爱北斐特理科中学读书，1837年，恩格斯在父亲的要求下退学去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学习经商。因此，恩格斯没有念完高中，也没有到大学接受系统教育，恩格斯依靠自学获得渊博的知识。1839年，恩格斯以“乌培河谷来信”为题在《德意志电讯》杂志发表一组文章，他指出了工厂工人以及在家工作的织工艰辛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这是恩格斯最早发表的关于经济方面的研究论文。1842年，恩

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实习经商，当时，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因而恩格斯对近代产业革命进程有着切身的体验。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1844年恩格斯和马克思相识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了科学研究计划。恩格斯积极支持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资本论》理论体系工作，他还为马克思提供了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活动的各种具体资料，他从物质上等多方面帮助马克思，他为《资本论》整理、出版付出了毕生的努力。没有恩格斯的支持，《资本论》不可能完成。《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资本论》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关于《资本论》研究的目的，马克思在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运动开始于生产过程，并且以生产过程作为整个运动的核心和基础。第一卷第一版分为六章，第二版把原来的章改为篇，又将原来的第五章分为两篇，共分七篇二十五章。第一篇研究商品和货币，分为商品、交换过程和货币或商品流通三章。这是因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在这一篇里，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等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第二篇到第六篇研究资本怎样生产剩余价值，阐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讨论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劳动力成为商品；通过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讨论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创造的，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率是 m/v 的比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生产方法，它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过程有协作、手工制造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主要阶段；资本主义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第七篇，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原始积累、殖民理论，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四、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亚洲扩张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创造空前、巨大的生产力的时期，资产阶级的胜利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世纪那种长期停滞不前、田园诗般的宁静和安谧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不断的变革、高速的发展、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铁路的通行、汽船的行驶、电报的使用，以及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和人口的急剧增长等等。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新的文明，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要超越国界向世界扩张，这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利用廉价商品和炮舰在亚洲扩张，将许多国家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 外国资本主义在印度等亚洲国家扩张（1816—1872）

（1）印度成为殖民地经济的典型

印度是东方文明古国，印度是殖民地经济的一个典型。1600年，英国为了保护它在印度一些地方的商馆和货栈而建立了经营印度事务的东印度公司。从1689年开始占领土地，使之成为其领地和公司收入的税赋来源。从1757年开始，英国用武力征服印度，占领了孟加拉，接着占领了比哈尔、奥里萨、迈索尔等地。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将印度北部还保持独立的信德和旁遮普变成其殖民地。英国已占领了全印度土地的三分之二，人口的四分之三。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约500个大小土邦王公统治之下，而王公或为英国驻扎官所控制，或为殖民者一手培植，都直接或间接受制于英国。英国实际上已控制了整个印度，使之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控制了从欧洲到东方的海道中心印度后，把印度作为向中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伊朗、阿富汗，以及东非等地进行殖民扩张的基地。“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东印度公司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征收高额土地税。印度的封建制度，原来是国王分封土地给封建主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英国在印度保存和利用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两种形式的私人土地所有制。从18世纪末以来，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柴明达尔制”，即永久租佃制。这些地区里小封建主和农村公社土地的继承权都被取消，土地成为包税者柴明达尔的私有财产，农民成为佃农，柴明达尔必须向东印度公司缴纳相当于1793年实际

税额的十分之九的定额土地税，若不能按期缴纳，土地就被拍卖。以后随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地租的提高，柴明达尔的收入相应增加，但公司税额的绝对数未变，在印度的孟买和马德拉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反对没收他们的土地给柴明达尔，因此英国殖民者在 1820 年实行“莱特瓦尔制”，即农民租佃制。殖民当局剥夺公社的牧场和荒地，被认为具备充分权利的农民享有耕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典当和继承；上层分化出的小封建主所占有的土地，也被确认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成为佃农。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有义务耕种土地，而且必须向殖民当局缴纳相当全年收成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在印度中部的很多地区，英国殖民者在 1822 年实行“不固定柴明达尔制”。它和固定柴明达尔制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税额不固定，每隔 25 年到 30 年修改一次柴明达尔与东印度公司分配份额；二是采用不固定柴明达尔制时，被承认的柴明达尔主要是中小封建主，而不是包税人。新土地税制实行后，东印度公司收入增加很快，据东印度公司公布的官方数字，19 世纪 50 年代，在印度的纯收入中，将近五分之三来自土地。公司征收的土地税总额，1800—1801 年度为 420 万英镑，到 1857—1858 年增加至 1530 万英镑。但是，英国殖民者却对水利灌溉等漠不关心，尽管殖民者从印度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大到这样，以致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都严厉地受到威胁，以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的，并压迫直接生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度的生活资料。”

据统计，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英国殖民者在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三省用于水利灌溉等公共工程的开支还不到全部土地税的 1%。印度农业逐年衰落，早在 18 世纪末，孟加拉已经有 1/3 地区变成丛林；到 1830 年，马德拉斯又有近 1/4 土地荒废。饥荒连续发生，居民大批死亡。仅 19 世纪上半期就在印度连续发生了七次大饥荒，约有 150 万人死亡。英国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迫切需要从印度获取大量的原料和粮食。英国工厂主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就力图在印度扩大棉花、黄麻的生产，把从美国进口的棉花和从俄国进口的亚麻，转到印度殖民地来生产。1833 年，英国国会通过决议，允许英国人去印度占有土地，直接经营种植园。这样，许多英国人来印度直接投资经营种植园，种植棉花、黄麻、蓝靛、茶叶、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从此，从印度输出的原料明显增加。1833 年—1848 年间，原棉的输出额从 3200 万英镑增加到 8800 万英镑，羊毛的输出额从 3700 万英镑增加到 270 万英镑；在 1849—1858 年的 10 年间，印度的原棉输出从 178 万英镑增加到 430 万英镑，黄麻从不到 7 万英镑增加为 30 万英镑，大米和小麦等谷物输出总值也从 85.80 万英镑增加到 380 万英镑。据 1860 年的调查，在印度从事茶叶、橡胶和咖啡种植等非谷物类的工人达到了 100 万人。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本国工业的需要，从 1848 年戴贺胥任印度总督以后，颁布了取消王公特权和兼并土地的政策。他制定了“丧失权利制”，不承认封建统治者的立嗣权，剥夺了他们的恤养金，兼并了詹西、奥德等 10 多个邦，使土邦的面积约减少了三分之一。经济矛盾加剧了政治矛盾，印度反英起义不断。1858 年 8 月，英国国会通过“改善印度管理法”，取消东印度公司，由女王直接统治；撤销伦敦管理局，设立阁员担任大臣具体管理印度事务。印度总督又是副王，代表女王管理印度。同年 11 月，印度英国总督宣布维多利亚女王的诏书“尊

重当地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不干涉臣民中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或崇拜”，借此稳定印度上层封建阶级，分化瓦解印度民族大起义队伍。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为了从印度获取无尽的财富，开始变印度为廉价工业品推销市场，他们抑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控制印度贸易垄断权。印度原本是一个建筑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的国家，印度的手工棉纺织品曾经输往英国和其它国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1813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英国工厂主和商人均获得机会将商品直接运往印度。自此以后，英国工业品像洪水一样地涌入印度，英国和印度间的贸易迅速增加。在19世纪初，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免税或课以极低的进口税率（2.5%），而印度输往英国的货物则课以高达50—70%的高关税；此外，印度纺织品在国内销售须交纳17.5%的内地税，比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税还高出好几倍。在这样的贸易政策下，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激增。从1815年到1832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纺织品总值从2.60万英镑增加到400万英镑；而印度输出的棉纺织品总值则从130万英镑锐减到约10万英镑。从1814年到1835年，英国对印度输出的棉纺织品由不足10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从1818年到1836年，英国对印度输出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各种商品，尤其是纺织品不仅在印度各大城市倾销，而且在海港附近、恒河流域，以及孟加拉地区的许多农村市场上销售。19世纪中叶，印度已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品的主要的国外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对印度输出总值达到802.40万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约占522万英镑，占英国对外出口总值的1/8，占棉纺织品对外输出的1/4以上。棉纺织业当时已是英国整个经济制度的支柱，在棉纺织业中就业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1/8，近1/12的英国国民收入来自棉纺织业。因此，占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额1/4的印度市场对英国棉纺织厂主乃至英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在1813年以前还是一个出口贸易的国家，现在则变成了贸易进口的国家。自古号称世界棉业大工厂的印度，变成了英国棉纱和棉织品倾销的大市场。与此同时，印度的棉纺织业衰落了。号称“印度的曼彻斯特”的城市达卡原来是印度的棉纺织业中心，约有15万人，到1840年只有2万人，城内长满荆棘，疟疾流行，由一个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小镇；英国的蒸汽机替代了印度的纺车和织机。同样的情形在印度其它行业也发生了，英国的玻璃、纸张、铁器、陶器等工业品也大量涌入印度，印度手工业工场纷纷倒闭。此外，殖民者还垄断了印度鸦片、食盐和酒的专卖。“据19世纪50年代统计，在印度全部纯收入中，七分之一来自鸦片，九分之一来自盐。这两项，加上土地的收入，共占印度全部收入的85%，都操纵在殖民者手中。在这些收入中，用于设在英国的印度管理机关的要占3%，每年支付内债利息和支付东印度公司股东的红利要占14%。这两项合计，即收入的六分之一以上（17%），要汇到英国去。用在印度的支出中，66%作为军事费用，也就是供养英国殖民者为统治印度而经常保持的一支庞大的军队的费用。用于印度公共工程（修筑道路、河渠、桥梁及其它必需的工程）的支出，还占不到收入的3%。”50年代后期，英国开始对印度殖民地进行改革，以缓和印度人民的不满。1859年，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等实行柴明达尔制的地区实行“固定租佃制”，规定凡连续租种地主土地

12年的农民可成为“固定佃农”，柴明达尔无权随意提高地租，以后又允许固定佃农抵押或出卖所耕种的土地。同时，进入50年代以来还在工商企业的改革上鼓励个人投资，贸易政策上也作了若干调整。1851年，印度拜火教徒、富商买办纳纳勃依、达瓦尔在孟买创办印度第一家棉纺织厂。到1861年，孟买共有10所纺织厂。1854年，英国人在加尔各答建立第一家黄麻厂，开始用机器纺织黄麻织品，从而使印度黄麻织品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俄国亚麻对英国的出口；1839年阿萨姆设立第一家种茶公司，到50年代，英资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在孟加拉、南印度、锡兰迅速发展起来，印度茶叶出口超过中国茶叶出口英国的数量。1853年，印度第一条铁路和电报线路建成。

19世纪，印度不仅在政治上是大英帝国的一块殖民地，而且在经济上也演变为英国廉价商品倾销市场和农产品的原料基地。但是，印度的工业、农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经济也有一定的增长。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扩张是为了获取利润，在资本对印度进行扩张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使印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英国征服全部印度的同时，使封建割据、诸侯分立的印度实现了统一；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使农田开垦的面积增加；为了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而修筑铁路；建立了一些近代经济组织，建立了英国的银行，统一了印度的货币制度等等。印度是一个国土面积大小和整个欧洲差不多的大国，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为尔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在破坏印度旧的社会结构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土耳其、伊朗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扩张对象

以土耳其为主体的奥斯曼帝国到18世纪末已日趋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争夺所谓“奥斯曼的遗产”，如沙皇俄国想占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带，以便获得黑海上的出口权；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也想控制海峡为资本主义扩张作准备。为了挽救帝国，以苏丹为首的奥斯曼帝国接连实行了多次改革。但是，随着俄土战争、希腊起义、土埃战争等，到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已基本解体。土耳其近代后期经济史主要表现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改革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土耳其的扩张。30年代以前，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改革主要还限于军事方面的改革。1831—1833年的土埃战争促使马赫穆德二世实行进一步的改革；1834年，他宣布废除军事采邑制度，采邑成为与军役无关的国有地或大土地私有制，撤销阻碍国内商业发展的内地关卡等。但是，许多地区的大小采邑主仍保持了一些封建权利。采邑的农民只能终身使用所耕土地，不能传袭，并且必须向国家缴纳土地税；对于外国资本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马赫穆德二世不仅没有制止，反而采取奖励政策；同时仍保留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商人享有的“法外法权条款”制度，即奥斯曼帝国不能征收超过进口货值8%的关税，欧洲人免交大部分赋税等奥斯曼帝国特权条件。资本主义各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亚洲市场扩张。而奥斯曼帝国受特权条约的束缚，不能用关税保护的办来阻止外国商品的倾销；此外，马赫穆德二世废除了农产品的专卖制度，使外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方便地购买到廉价的原料以及粮食等农产品。1838年，英国迫使土耳其政府签订了新的商务协定，规定只能对进口的外国商品征收8%的进口关税；禁止对任何物资实行专卖制度；外国人有权在奥斯曼帝国内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同年，法国以“利益均等”的要求与土耳其之间也签订了类似的协定。特权条约签订以后，英法等国商品大量倾销于土耳其国内市场。外国资本主义开

始大规模在奥斯曼帝国扩张，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土耳其，柞蚕业中心布鲁萨和安那托利亚的毛纺织业中心安卡拉与迪雅别基尔，纺织品的产量大幅度减少，而土耳其的羊毛和生丝等初级产品的输出却大幅度增加。土耳其已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廉价商品的推销市场。英国还想将商务协定的规定推广到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已有较大发展的埃及，遭拒绝后，英国支持土耳其对埃及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1840年，英、俄、奥、普四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缔结关于集体援助土耳其，对付埃及的《伦敦协定》，共同“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迫使埃及接受了1838年的英土商务协定。1839年，新苏丹阿卜杜尔—默哲德接受并批准了新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穆斯塔法·拉施特伯沙（1800—1858年）实行新的改革的建议。11月3日，拉施特帕沙在皇宫的御花园里向各大臣、高级阿訇和各国外交使节，宣读他草拟经苏丹批准的敕令，即所谓“御园敕令”。敕令宣布保证帝国全体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享有生命、名誉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权；确定固定税率，废除包税制；建立合理的征兵制度等。以这个敕令为起点进行新的改革，史称“坦志麦特”，即改革的意思。这次改革和过去改革不同，改革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要求，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并对以后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次改革由于帝国内部的反对和外国资本主义担心土耳其改革将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因而没有实际进行下去。1841年春，拉施特帕沙被迫辞职。19世纪50年代，俄国已推进到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并控制了黑海的一些港口，奥斯曼帝国虽仍拥有庞大的版图，但帝国在经济方面已远落后于欧洲。1854—1856年俄土克里米亚战争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产生了新的改革要求。土耳其人也试图象美国、日本一样实现经济强盛。1856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布改革法令，除了在政治上创立公民权以外，在经济政策上宣布改革税收，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权等。改革使土耳其在以后的20年里兴起了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投资者纷纷来土耳其投资，修建的铁路将黑海和多瑙河连接在一起。阿卜杜尔·阿齐兹（1861—1876年）成了第一个到欧洲访问的苏丹，他参观访问了维也纳、伦敦和1867年的大巴黎世界博览会。但是，阿卜杜尔·阿齐兹在财政收支上没有节制，加上改革缺乏支持，奥斯曼帝国已基本解体，改革和复兴只是部分人的愿望以及少数人的尝试而已。

伊朗在19世纪初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有些地区仍保存了农村公社的残余。国王、教会贵族、游牧贵族等几乎垄断了全部土地，而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对封建主保持封建依附关系，通常要将收成的4/5交给地主；以德黑兰为中心的伊朗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从事织布、丝织、地毯等手工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手工业者除了受到行会把头和包买商盘剥以外，还要向国家缴纳很重的税赋；封建割据，战乱频繁，商人和小企业主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加上关卡林立、贸易垄断，伊朗工商业的发展艰难。从19世纪开始，伊朗成为英、法、俄等国争夺的对象。1800—1841年间，英国强迫伊朗订立了一系列条约。在经济方面，英国获得特权在伊朗购买土地、建立工厂，在波斯湾建筑商馆，商品免征关税并在伊朗全境自由贸易，以及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等。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输入伊朗的纺织品几乎占伊朗全国进口货物的90%；外国棉布在伊朗市场到处可见，破坏了伊朗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1841年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英国商品在伊朗只抽5%的进口关税，豁免国内关卡的各种税，并在大不里斯、德黑兰、班狄尔—

—布什尔设立了商业代办处。法国拿破仑早就想把伊朗作为远征的跳板并想与之建立反英同盟，但没有达到目的。尔后，法国和英国一起对伊朗进行政治、经济渗透，法国也获得了法伊通商条约，给予法国领事裁判权和其它特权。沙俄为了争夺高加索统治权与伊朗发生两次战争，并于1828年强迫伊朗签订了《土库曼恰伊条约》，伊朗放弃了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利，并付给俄国2000万卢布赔款，俄国还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其它经济特权，俄国商人取得了比伊朗本国商人还要多的优惠条件。随后，美国也于1856年和伊朗签订了与英、法类似的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等经济权利。1833年，从国外运到大不里斯的欧洲商品总值达到了1500万卢布，1836年增加至4000万卢布。伊朗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外国商品的涌入与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冲击了伊朗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伊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了固有的土地关系，公社瓦解、新地主阶层扩大、农民大量失去耕地，地主阶级要求以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新地主还增加地租与劳役，使农民负担日重、生活每况愈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外国商品的倾销使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纷纷破产。1848年至1852年，伊朗反封建压迫和殖民侵略的巴布教起义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爆发的。50年代以后，伊朗部分上层人物试图改革没有取得成功，1857年，英伊战争后，伊朗被迫在巴黎与英国签订条约，从此，英国在伊朗的势力日益加强。

（3）印度尼西亚是殖民地经济的又一楷模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以“千岛之国”著称。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荷兰恢复独立。根据1814年英荷所订条约，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重归荷兰；1816年，英国正式将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交还给荷兰。荷兰殖民者重新统治印度尼西亚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对付英、美两国在贸易上的竞争，虽然荷兰也是一个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国家，但是由于刚刚从亡国中恢复独立，国库空虚，无力与英国在商业上竞争。据统计，1819年来到爪哇各港口的150余艘商船中，属于英、美两国商行的商船约115艘，而属于荷兰的仅有43艘。英国商人不仅把廉价商品倾销到印度尼西亚市场，而且还从印度尼西亚运走农产品及其工业原料。荷兰殖民者因本国经济落后，因而无力同工业发达的英国自由竞争，只好重新恢复被英国废除了的贸易垄断制度，并实行关税保护。1824年，荷兰国王组建了尼德兰贸易公司，专门运输和销售印度尼西亚的农副产品；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实行了新的关税制度，对进口的外国货物课以重税，以保证尼德兰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贸易上的优越地位。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后，输入爪哇的纺织品总额中荷兰所占比重由1819年的1/3上升到1830年的2/3。同时，荷兰殖民者还恢复了对咖啡、烟草、靛蓝等实行强迫种植制和强迫供应制；荷兰殖民者还禁止印度尼西亚封建主出租土地给外国种植园主，要求废除还没有失效的租赁契约，以便排挤其它外国资本的势力；荷兰殖民者还保留了英国人曾采用的货币地租。印度尼西亚人还被强迫缴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多达30多种，如门户税、庭院税、牲畜税、稻谷税、迁居税、土地贸易税等，甚至通过桥梁、进入市场都必须纳税。荷兰殖民者1816年实行的这些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尼西亚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荷兰殖民者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农民、小生产者的贫困与破产，也使部分封建主对殖民统治不满，终于爆发了1825—1830年的爪哇大起义。

5年的起义不仅消灭了约15000荷兰殖民军，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而且烧毁了无数种植园，使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经济停滞不前。1830年以后，荷兰殖民者实行强迫种植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农民必须在自己1/3到2/3的土地上种植欧洲市场所需农作物如甘蔗、咖啡、靛蓝、棉花、烟草等等，并按照规定价格将产品出售给政府。在收购农产品时，殖民当局首先从产品中扣除土地税；当农产品的价格超过必须缴纳的税额时，超过部分不归还农民；但在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必须缴纳的税额时，农民必须出售粮食来偿付土地税的不足部分。农民必须把产品无偿交运政府仓库，并为政府无偿从事各种劳动。荷兰殖民者为了有效地推行强迫种植制度，规定给监督农民种植的封建主和官吏农作物总收成的一部分，同时还给予他们大片土地和种种特权。“数十年来，荷兰人一直沿用一种强迫劳动方式——耕作制——开发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这就是当局要农民缴纳一定数量指定的收获物作为税收，如糖或咖啡。1870年后才采用一种比较自由的制度。”荷兰殖民者采用强迫种植制度从印度尼西亚获取了巨额的利润。1830—1870年，实行强迫种植制度40年，约获取8亿盾的利润，相当于东印度公司两个世纪所获取的总和。由于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指定的农作物，谷物生产减少，连年发生饥荒。在爪哇的淡目，原来有居民33.60万人，1848年饥荒后仅剩12万人；格罗波甘原有居民8.95万人，1849年饥荒后仅剩9000人。为了获取利润，荷兰殖民者在对内实行强迫种植制度的同时，向外进一步扩张。1815年，荷兰人只占据爪哇岛和另外一些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人占领了新加坡等，法国人出现在印度支那，德国人占领了新几内亚东部等，美国势力也开始向这一地区扩张。荷兰为了阻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扩展、剿灭当地海盗和发现世界上所需求的原料，“他们把统治扩展到这整个长达三千英里的群岛上。一连串原来只与买卖有关的贸易站被他们创立的殖民帝国所取代。”到70年代初，荷兰基本上控制了印度尼西亚。荷属印度尼西亚和英属印度成为19世纪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楷模。

（4）朝鲜、越南、菲律宾、阿富汗、泰国经济

朝鲜在19世纪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国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国王将土地分给文武百官，以收入当作俸禄和衙署的经费，但土地在19世纪已开始买卖，国有土地制已开始向私有制转化；农民在各类土地上耕种必须缴纳土地税、人头税，以及服兵役和其它徭役。地方政府和官吏还向农民征收其它税，如火田税、芦田税、盐税、船税、工匠税、市场税等。19世纪以前，朝鲜手工业者都属于国家工曹管辖的官工匠，他们专门为国家生产，分为中央各官府的京工匠和各道、府、郡地方官衙的外工匠。工匠的人数也有一定的编制，京工匠约2800余人，外工匠3500余人。到19世纪，官工匠制度已开始瓦解，官工匠除了为国家生产以外，也开始直接为市场生产。手工业在朝鲜有了较大发展，丝织、造纸、瓷器等部门尤为突出，如罗州、宁边等地的丝绸以种类多、质地好而著名；韩山、舒山的苧布，全州、南原的纸；开城的铜器；广州的瓷器，江华的席；潭阳的扇等不仅在国内销路好，而且出口到国外。但是，朝鲜手工业是以传统的形式发展，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工场手工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同时，称为“五日市场”的定期集市在朝鲜

《近现代世界史》中册，第875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近现代世界史》中册，第874—875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农村很流行，它是近代朝鲜商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没有固定店铺的“行商”也相当发达。行商分为“裨商”和“负商”，裨商贩卖绢、绸、麻布、铜器等，而负商则贩卖陶器、漆器、干鱼、海产品、盐、铁器等较笨重的日常必需品。这些靠肩担背负的小商人活跃了朝鲜的城乡经济，对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朝鲜，有固定店铺的商号称之为“坐商”，他们又可分为“客主”、“旅阁”两种组织。客主从事棉布、麻布、丝类、皮货、药材、纸张、扇子等手工业产品的批发业务；旅阁主要经营盐、鱼、海产品、谷米、烟草、果品等批发业务，并设有仓库、马房等等。客主和旅阁还从事兑钱、存款、借贷等多种业务，而且掌握了较多的资本。首都汉城还有六家专门供应政府商品的商店，称为“六矣廛”，是半官半商性的垄断商行。它们垄断了绸、绢、布、纸、海产品等，禁止其他商人经营同类货物。以上情形表明，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朝鲜也将缓慢地向资本主义发展。但是，朝鲜资源丰富，从地理位置看，朝鲜是资本主义向中国以及东方扩张的门户和基地。1832年到1871年，英、法、美等国多次动武，胁迫朝鲜缔约通商均遭失败。1863年，执政的大院君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876年，日本派军队来到江华岛，朝鲜被迫签订江华条约，朝鲜逐渐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

19世纪中期以前，越南仍是一个封建国家，在经济上，越南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在政治上，封建地主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在文化上，崇尚孔孟之道，实行科举制度。1801年建立的阮氏王朝试图发展越南的经济。1831年改镇为省，全国共31个省，从政治、军事方面加强统治，力图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经济的环境；阮朝定期实行土地调查，以保证国家统治收入的来源。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由政府分配给农民耕种，一般土地肥沃，租税很重，私田由私人开垦，租税较轻。19世纪20年代起，土地被强占以及买卖流行，公田比重下降，私田比重上升。如南部土地调查簿册上登记的私田数目仅3400亩，但丈量后却有63万余亩，相差约130倍。未入簿册的大量土地大多被官吏和豪强所占。农民除必须缴纳实物租赋以外，还必须缴纳货币地租应付各种人头税、住宿税、灯火税等，此外，每年还有约两个月以上的力役。阮氏王朝也注重发展工业和贸易。王朝控制了仅有的铸钱、制枪和造船等工场。开采中的150座矿山也基本上由政府管理，对少数私人经营的手工业作坊，也都课以重税。国家还垄断了铜、锡、铝、锌、硫磺和焰硝等大部分工业原料的专卖以及对外贸易。越南资本主义已出现了初步的萌芽，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862年，法国用武力征服越南，6月5日，越南顺化朝廷被迫与法国首次签订了《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圻东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开放土伦、巴叻、广安三港为商埠；允许法国商人在越南境内自由贸易并得到保护；赔款400万披阿斯特；越南必须通过法国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涉。《西贡条约》使法国得以控制越南的内政和外交，标志着越南开始变成法国殖民地。

菲律宾19世纪仍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实行贸易垄断政策，只允许菲律宾在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进行有限的大帆船贸易；对烟草、酒类实行专卖。后来，在英、美的要求下，西班牙才开放马尼拉，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因经营出口作物的种植园而发财致富，同时，他们还经营借贷，以及各种小型手工业、帆船制造业、岛际间的贸易等。1869年，苏伊士

运河通航，菲律宾成为了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同时，交通运输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使菲律宾经济的发达。

阿富汗是印度、伊朗、中亚间商道的枢纽，在 19 世纪它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英、俄两国，争夺的对象，英国通过战争迫使阿富汗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缅甸早在 17 世纪就成为葡萄牙和荷兰资本扩张的对象，19 世纪，英国通过战争将缅甸置为其殖民地经济的一部分。曼同在缅甸实行改革，废除采邑制；1862 年又进行税制改革，实行全国统一税制，规定了固定的税率（1/10），按每户财产多少决定税额。曼同注重农业发展，采取措施开垦荒地、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从国外购回一批机器开办了 50 多家工厂。泰国是一个以“萨迪纳制”（封建土地制）为基础的国家。1855 年，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胁迫暹罗（今泰国）与之签订《鲍林条约》，泰国被迫接受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鸦片贸易等。原土邦、老挝、柬埔寨等属地也被列强蚕食。泰国“萨迪纳制”开始解体。

2.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1840—1894）

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从 1840 年开始的。1840 年英国发动旨在打开中国市场的鸦片战争，1842 年迫使中国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将中国也囊括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资本主义使用刀枪火炮和商品两种武器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且在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的其它国家，冲破了一道又一道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打开了一系列国家的大门。《中英江宁条约》是封建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开始丧失、被动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市场。这种被动开放使中国经济逐渐由独立型经济向附庸型经济、封建经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古代经济向近代经济演变。

（1）英国选择鸦片贸易打开中国市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较早，到明清时期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棉纺织业相当发达，方观承在《御题棉花图》中曾描述了能纺五根纱的纺车；手工工场已出现，而且还出现了包买商，如叶梦珠《阅世编》所记载的湖广、江西、两广诸路的富商巨贾动携白银数十万两到松江收购棉花。但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在这个社会里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掌握在地主、贵族和皇室手里，农民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发展的阶段，没有形成一种能够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力量。因此，中国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强国早已觊觎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巩固以后，就开始致力于侵入中华帝国的活动，面对中华帝国这样一个“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大国，英国选择了鸦片贸易。这是与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长期以来出现逆差有关的。据统计，从 1760—1833 年这 70 多年里，英国对华贸易基本上是贸易逆差。1820—1824 年，中国从英国进口 6525201 银两，出口 9816066 银两，英国逆差 3290865 银两；1830—1833 年，中国从英国进口 7335023 银两，出口 9950286 银两，英国逆差 2665263 银两。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除了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耕”

与“织”满足了衣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英国商人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用什么货物来华换取中国的货物可以实现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当时英国对外贸易的主导产品是毛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又不够便宜，面对习惯于男耕女织的中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因而向中国贩卖毛织品不仅不赢利，而且还亏本。其次是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的金属制品，包括刀子、钟表等，还有一些市场，如铅皮用来作茶叶打包用，但每年的利润不过数千银两。而英国商人从中国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是茶叶，其次是生丝、土布等。英国对茶叶的需要日益增多，中国茶叶输往英国的数量不断增加，1830—1833年上升为23.58万担。为了改变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英国选择了能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贸易。据统计，1830年，英国在不到2500万元的对华贸易额中，鸦片占了1300多万元，中国输出的白银达880万元。以后逐年增多。面对外国商人偷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多、烟毒泛滥和白银外流，清政府确定了严禁鸦片的政策，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大量缴获的烟土。英国制定了以武力保护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利益和打开中国市场的作战计划。英国政府借口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损害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1840年向中国发动了保护“鸦片贸易”的战争。1842年8月29日，中国清政府在被战败与被迫的情况下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共13项条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中国割让香港。由英国“掌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携带眷属自由居住，派驻领事，并可以自由进行贸易。

赔款。中国共赔款2100万银元给英国，其中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水陆军费1200万银元。

协定关税。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中国海关增减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经中英双方共同议定。条约中还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中国商人，遍运天下，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

取消行商制度。过去英商来华贸易，只准允在广州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亦称公行）进行贸易洽商。《中英江宁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可在各通商的口岸与中国商人自由交易。

《中英江宁条约》对于英国在华的特权还只是作了一般的规定，关于开埠通商、关税税率还没有详细的细则，所以，1843年7月和10月，又先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对《中英江宁条约》的补充。这两个“附约”有以下几点重要补充：

规定了极低的关税税率。表4—1为1843年中英协定关税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新旧税率水准。

1843年中英协定关税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新旧税率水准

表4—1

货物	单位	1843 年前	1843 年	新税率较旧
		旧税率	新税率	税率减少百分数
棉花	担	24.19	5.56	77.02
棉纱	担	13.38	5.56	58.45
头等白洋布	匹	29.93	6.95	76.78
二等白洋布	匹	32.53	6.95	78.64
本色洋布	匹	20.74	5.56	73.19
斜纹布	匹	14.92	5.56	62.73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59 页。）

英国在五口通商章程内，将中国关税的税率规定在 5—6%，比以前粤海关实征税率降低了 58% 到 79%。这种“值百抽五”的税率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税率。

开设租界。补充条约规定，在五处通商口岸，“英人携眷赴五港口居住，或租基地建屋一条。英人与家属所住房屋准予何处租赁，何处建造，尤应各就地方民情，先行议定，彼此出于两愿，方可相安。”

领事裁判权。凡中国人和英国侨民交涉词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最惠国待遇。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是一条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后所订立的《中英江宁条约》标志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经济向附庸型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转变。从此，中国开始了被动地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过程。

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市场大门的成功为其它资本主义强国做出了榜样。美国立刻派专使到澳门要求和清政府订立类似的条约，并派舰队到中国海面上示威。1844 年 3 月清政府与美国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五口贸易章程》（即《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 34 项条款。美国依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英国在《中英江宁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并增加了 16 项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条款，其中包括进一步明确协定关税原则、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肯定“利益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和修约的固定年限、创立洋货转口免税制度等等。如条约第二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继英、美之后，10 月法国同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即《黄埔条约》）。接着，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等纷纷与清政府订约，在通商方面，获得了同英国一样的权益。

鸦片战争和《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的签订在政治上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基础、中国独立主权遭到破坏、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是，从经济方面看，虽然条约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使中国被动地开放中国市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条约也体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成长期自由贸易的内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能立刻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理想王国，凭借一时的军事力量和自由贸易并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占领中国经济大市场。《中英江宁条约》签订以后，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

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但是,“1842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表4—2为当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情况。

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情况

表4—2 单位:镑

年代	自华输英值	自英输华值
1833 — 1835	3779385	850159
1837 — 1839	4273858	911560
1842 — 1846	5323388	1783888
1854 — 1858	9157001	1964242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8页。)

表4—3为英国输华货物价值统计。

英国输华货物价值统计

表4—3 单位:英镑

年代	输华货物总值	输华棉纱值	输华棉布值
1840	524198	88748	238389
1842	969381	245965	470349
1844	2305617	117853	1457794
1846	1791439	221856	1024662
1848	1445959	?	?
1850	1574145	1020915	
1852	2503599	1905321	
1854	1000716	640820	
1856	2216123	1544235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8页。)

从以上两表资料数据可以看出,《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英国对华贸易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中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得更快。1842—1846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3539500镑,1854—1858年扩大到7192759镑。其原因是英国人不了解中国市场的特点,“中国市场的特点是:自从它根据1842年的条约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丝向大不列颠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整个说来却没有变化。”那些宣传推销棉织睡帽的人,却没有想到“远在英格兰人知道有棉织物的许多世纪以前,这三万万居民的祖先从来就决不希罕这种东西。”“在1843、1844、1845年北方各商埠刚开放时,英国人兴奋若狂,舍菲尔德的一家有名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刀叉,并声明它准备把刀叉供给全中国。但是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他们对这些器物连看也不看,……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输出

1852年密切尔夫报告书。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第121页。

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1页。

了大批钢琴，但是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锣鼓，不能接受这种美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情况也和英国对中国的贸易类似，在签订 1844 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约 200 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 90 万英镑左右。《中英江宁条约》签订以后，通商口岸是增加了，由一个口岸增加到五个口岸；市场相应扩大了，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但是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也扩大了，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1852 年英国驻广州的代办密切尔曾这样说道：“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奇怪的结局”为什么会产生？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英国人对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认识不足。马克思指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又说：“因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直接结合而起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约，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习惯和封闭式的经济单元，它对市场的需求很小，购买力也有限，它是造成英国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首先是棉纺织品以极其顽强的抵制、使它们的机器制造产品在这里难以施展其威力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中国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1856 年 10 月至 1860 年 11 月，以英、法为首，美、俄背后支持的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动用武力谋求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一起打开中国市场、变中国为其附庸国的战争。加上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比较强大。中国清政府于 1858 年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 年又与英、法、俄分别订立了《北京条约》。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重新修改了税率（见表 4—4，1858 年中英重修进口税则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

1858 年中英重修进口税则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
表 4—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 1，第 493 页。

1852 年 3 月密切尔报告书。《经济研究》1955 年第 2 期，第 124 页。

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601 页，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373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货物	单位	1843 年税率	1858 年税率	1858 年税率较 1843 年税率减少百分数
棉花	担	6.54	5.72	12.54
斜纹布	匹	7.89	5.05	35.99
斜纹布(美)	匹	4.63	4.63	—
印花布	匹	14.25	4.98	65.05
袈裟布	匹	10.68	4.98	53.37
棉纱	担	6.94	4.86	29.97
羽缎	丈	9.46	6.31	33.30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59 页，表 2)

从 1858 年重修进口税的内容看，中国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比 1843 年的税率又降低了 13% 到 65%。1858 年重修税率不仅比 1843 年税率大为下降，而且许多货物的税率还没有达到 5% 的税率，此外“漂白市布只有百分之二点六，印度棉纱和日本棉纱，只有百分之二点八，印度标布只有百分之四等”。

如此低的税率，为英国等国的“廉价商品”创造了打开中国大门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中英天津条约》对外国商人在中国内地进行贸易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英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行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在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这即是说，外国货物销往中国内地或外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须一次交纳 2.5% 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而不必象中国商人运送商品“逢关抽税，遇卡抽厘”了。这对于当时仍处于封建统治的中国来说，外商和中国商人的竞争是极不平等的。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实现在中国市场有利可图，还必须控制中国的行政权。《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第 10 条中，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等事”的规定。由于英国势力当时比较大，英国人李泰国(H. N. Lay)于 1859 年被委任为“中国总税务司”。1863 年至 1907 年期间英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在各处设关 30 多个。1861 年上海总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规定：准英人“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

《天津条约》还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商埠和为外国划设租界。自 1842 年《中英江宁条约》五口通商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 1894 年期间，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的商埠有：北海、广州、拱北(澳门)、潮州(汕头)、琼州(海南岛海口)、厦门、台湾(台南)、淡水(台北)、福州、温州、宁波、上海、牛庄(营口)、登州(烟台)、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龙州、蒙自、亚东、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喀什噶尔(疏勒县)、

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古城、肃州（嘉峪关）、乌里雅苏台（哲布哈兰图）、库伦（乌兰巴托）等。1845年英国首先在上海设租界，到20世纪初，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等9国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和鼓浪屿等15个地方共划设37处租界。租界最初是外国居住和经商之用，后来，外国人在租界非法开设银行、工厂、商店、船坞等并设立武装和行政机构，租界成为殖民地。

以“利益均沾”为由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自《中英江宁条约》后已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利益。60年代以后，这个条款的范围竟扩大到中国本国，即中国政府如果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亦一体均沾。这种最惠国待遇世界上独一无二。

英、法古典经济学家们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在本国还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却完全彻底地实现了。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以上种种特权，积极展开了对中国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扩张。加上19世纪50、6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涨，工业技术革新、生产费用大幅度下降；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航程，减少了运输费用；1871年上海与香港、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缆的连接，使通信接洽更为方便。所有这些都利于外国商品对中国的输出，“廉价”商品的倾销也得以实现。表4—5为1864—1894年海关贸易统计。

从表4—5可以看出，中国清政府从1865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尔后，除1872—1876年曾一度有少量贸易顺差之外，就一直是贸易逆差，而且逆差的数字越来越大。这是因为进口贸易增加得异常迅猛，而出口贸易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增长相对缓慢。

1964—1894 海关贸易平衡统计

表—5

单位：千海关两

年份	洋货进口净值	国货进口总值	出超(+)或入超(-)
1864	46210	48654	+2444
1866	67174	50596	-16578
1868	63282	61826	-1456
1870	63693	55295	-8398
1872	67317	75288	+7797
1874	64361	66713	+2352
1876	70270	80851	+10581
1878	70804	67172	-3672
1880	79294	77884	-1409
1882	77175	67337	-10378
1884	72761	67148	-5613
1886	87479	77207	-10273
1888	124783	92401	-32381
1890	127093	87144	-39949
1892	135101	102584	-32518
1894	162102	128105	-33998

（资料来源：杨端六、侯厚培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第一表。)

从进口贸易看，除了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以及其他的装饰品和奢侈品。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输入的商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洋纱、纱布输入的比重在整个中国进口贸易中增大。1842年，中国进口的物品总值中，鸦片占第一位，为55.2%；棉花为第二位，占20%；棉制品占第三位，为8.4%。到1885年，棉制品已占35.7%，为第一位；鸦片占28.8%，居第二位。表4—6为1842—1894年外国棉纺织品入口统计。

外国绵纺织品入口统计

表4—6

年别	棉纱入口量(担)	棉布入口量(匹)	棉纱棉布入口值(两)
1872	49809	11920332	22857375
1874	68819	9575385	18270196
1876	112908	11644846	20216246
1878	108360	8962390	16029231
1880	151519	13169447	23382957
1882	184940	12158762	22706784
1884	261458	11229096	22141222
1886	384581	14040642	29114622
1888	684959	18664067	44437525
1890	1083405	1561460	45020302
1892	1305572	16358790	52707432
1894	1161694	13795884	5210544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252—253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进口的棉制品中，棉纱增长速度超过棉布增长速度。1872年棉纱进口量为49809担，到1890年增加为1083405担，为1872年的2175%；1872年棉布进口量为11920332匹，到1890年增加为16561460匹，为1872年的138.93%。

从出口贸易看，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都是农产品，其中以茶、丝为主。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茶、丝两项占出口总值的50—90%。

表4—7为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口商品分类比例表。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口商品分类比例表

表4—7

种类	占总计的百分比 (%)			
	1867	1873	1883	1893
1. 工业产品	7.90	8.97	18.23	20.45
丝织品	1.30	3.14	6.67	7.53
茶	1.24	1.35	2.14	2.49
糖	0.80	2.34	5.42	1.99
其它	1.83	2.14	4.00	8.44
2. 农副产品	90.68	90.24	79.71	70.55
茶叶 58.43	49.33	43.70	23.71	
生丝 28.28	36.48	24.88	22.11	
废丝 0.20	0.59	2.29	2.50	
棉花 0.79	0.30	0.34	5.29	
草帽辫	0.05	0.24	2.09	2.08
其它	2.93	3.30	6.41	14.86
3. 其它	1.42	0.79	2.06	9.00
总计	100.00	100.00	100.0	100.00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60—1061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茶丝的出口值也有增加，但是它们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则在下降，尤其是茶的出口比重下降幅度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世界茶叶市场竞争加强。英国在所属的印度和锡兰培植了茶园。在英国市场上，印度和锡兰的茶叶1889年以12239.9万磅，超过中国9250万磅；到1894年，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增加到18663.2万磅，而中国输英茶叶则下降到5437.2万磅；在美国茶叶市场上，日本出口的绿茶逐年增多，到1893年，中国茶的出口量已由过去占世界市场上绝大部分下降到只占将近一半了。丝的出口比较稳定，但在整个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在下降。表4—8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丝类出口值及其在出口货总值中所占比重。

中国丝类五年平均出口值及其所占比重

表4—8 单位：千关两

年代	出口量	占出口货总值 (%)
1874—1878	22064	31
1879—1883	21409	29
1884—1888	20404	26
1889—1893	27905	27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111页。)

在出口的货物中，除丝茶以外，还有棉花、豆类、糖、草席、花生、皮毛、桐油、锡、猪鬃等。出口货物种类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与化学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料种类的需求。

以上事实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将中国变为廉价商品的推销地和工业原料产品的来源地，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下的中国经济正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经济。

（2）“呼之欲出”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为主的社会生产形式，它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核心；在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自 40 年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这一耕织结合体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松弛；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主要的动因是农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增长的影响。中国传统农业在鸦片战争前后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外贸易中农副产品约占出口总值的 90% 左右即是明证；1850 年一般亩产谷 200 多公斤，高于 19 世纪日本水稻亩产水平，同时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如蚕桑业不仅在苏、浙很普遍，而且在鄂、皖、粤、桂等省也广植桑树发展蚕业。“据估计，从 1840—1894 年的 54 年间，几种主要农产品商品量的增长率大致如下：粮食 59.2%，棉花 32%，土丝 105%，茶叶 79%。但总的说来，1842—1894 年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这个时期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所受震荡虽大，而解体进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封建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和土地的兼并造成农村贫困差距和矛盾激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农民在内外力量的冲击下爆发了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天朝田亩制度》是 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基本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本任务，规定了土地分配的具体办法。

《天朝田亩制度》宣布，世界上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归“上帝”所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因而“天下田”由“天下人同耕”。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土地分配的具体办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苕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天朝田亩制度》构想出社会基础组织成为传统农民理想的自给自足经济单元。《天朝田亩制度》一直未实施。《天朝田亩制度》是研究农民经济思想的文献。

洪仁玕所作《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著作之一。洪仁玕想在太平天国内实行一些新的改良措施，把太平天国建成与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国家。《资政新篇》共分四部分：“用人察失类”。提出“禁朋党之弊；”“风风类。”采用新的移风易俗生产方式；“法法类。”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刑刑类。”健全司法制度，整篇以“法法类”为主，其经济改革的主要设想有：

主张修铁路造轮船。“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兹有火船气船，一日夜

能行二千余里者，大商则搭客运货，国家则战守缉捕，皆不数日而成功。”

鼓励开发矿藏。“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蠔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探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焉。”

鼓励发明创造，并实行专利。“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美奇便利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

建立银行，发行纸币。“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货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50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

设邮亭，办报馆。“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

此外，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还主张“兴医院以济疾苦”、“兴跛盲聋哑院”、“兴孤寡独院”、“兴市镇公司”、“兴士民公会”等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处时，洪仁玕主张平等相等，许其通商，“并教技艺之人入内地，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

《资政新篇》是一个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但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治不稳固，军事吃紧，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太平天国经济方面不得不实行“圣库制度”，以后试图废止商业但行不通；《资政新篇》不具备实践的环境和条件，在实际中也没有实行，因而它对太平天国也没起什么作用。

19世纪下半叶，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已是“呼之欲出”。一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它要使一切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它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它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二是当时中国的门户被外国资本主义打开后，中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从落后便要挨打的教训中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一批人开始从事资本主义实业，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解体：首先是洋纱替代土纱，使织与纺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耕与织分离。

洋纱替代土纱关键是价格因素。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价格在中国市场上大幅度降价，仅从1872年到1886年的14年里，棉纱价格就下降了1/3以上，使洋纱价格远低于土纱的价格。如1887年牛庄，每包300斤的洋纱售银57两，而同量土纱却要售银87两左右。价格如此悬殊，手工织业者自然舍弃土纱织布而改用洋纱了。土纱价格比洋纱价格贵除了洋纱生产效率高、航程缩

短运费降低，以及洋纱进口享受很低的进口税等优惠待遇外，还因为土纱生产所需棉花价格昂贵。7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印度棉花的一个重要市场，每年有大量印棉输入中国；70年代以后，印棉一方面开始转销英国，另一方面印度本国纺织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加上日本纺织业的发展等因素，印棉出口中国的数量减少，而中国的棉花出口则在增加。1868年厦门海关报告：“从前棉花是本口主要进口货，和1867年相比，本年进口不到一半。这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并无变动，而用棉花纺成的绵纱市价，却每包几乎跌去50元之多。所以人们把棉花纺成棉纱，就无利可图了”。1890年宜昌海关报告：“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使用洋纱更贵。”中国手纺业在洋纱跌价、棉花价格相对昂贵，与大机器工业的竞争中趋于没落。

在洋纱代替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正如密切尔报告所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的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尽管土布结实耐穿，但洋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又“比土布便宜”，因而使用洋布的人自然增多。虽然洋纱替代土纱、洋布替代土布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自70年代以后，中国自给自足的手工纺纱业已开始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趋于没落的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破坏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击中了自然经济的中心；同时依靠廉价商品这个武器也冲击了中国其它手工业部门。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布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中国的冶铁与铁器制造是手工业中一个比较发达的部门；但自60年代后，洋铁因价格低廉也逐渐替代土铁；1867年进口的铁是113441担，1885年增加到1202881担，增加了10倍。其原因在于“因为洋铁的形式便利，所以人们弃土铁而用洋铁。用洋铁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与劳力，因而洋铁产品的成本也就较土铁产品的成本低得多。”例如，山东省以前“使用的土铁大部分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1869年）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由于洋铁价格便宜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湖南、浙江、山西等地，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其它冶炼业。但也有一些地方是因自然资源枯竭而凋萎，洋货乘虚而入，如广东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此外，进口的煤油因价格便宜、发光好逐渐取代菜油、花生油；进口火柴代替打火石和铁片；洋针代替土针；洋染料代替土染料；洋皂代替土皂等等。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65页。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65页。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第20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174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175页。

“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 5300 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毡毯、火油、食物，以至钮扣针线之细，皆窥我情形，探我玩好，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鸦片战争后，以手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一些手工业衰落了。与此同时，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手工业不仅维持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如制茶、酿酒、榨油、丝织、制瓷、井盐、煤矿业等；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业，如抽纱、发网、猪鬃加工、肠衣等。中国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发生了联系，成为中国近代工业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台阶。

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扩张和中国人盼望自强求富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机器工业是由外国人经办的。19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投资重点是航运业和船舶修造业，到 60 年代，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处设立船厂 47 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862 年设在上海的祥生船厂，1863 年设在黄埔的黄埔船坞公司，1864 年在上海成立的耶松船厂；60 年代至 80 年代，投资重点于加工业，如设立缫丝厂、制革厂、制糖厂、轧花厂、打包厂等；80 年代以后，投资于火柴、肥皂、玻璃、造纸、制药、建筑材料，以及自来水公司和光电公司等。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机器工业是以清政府的名义经营的。19 世纪 60 年代，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刘铭传以及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实力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机器，兴办军事工业，发展民用工业，自强求富；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兴办实业，兴起洋务运动。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1863 年他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1865 年运回上海装备江南制造总局，从此揭开了中国办机器工业的序幕。从 1861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到 1890 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洋务派兴起的自强创办了约 19 个军火厂，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

江南制造局。1865 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在上海虹口买下了美商旗记铁工厂，并将 1862 年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制炮局和 1863 年在苏州设立的苏州炮局并入，加上容闳从美国买回来的机器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 年，为了扩充生产，李鸿章将该局迁往城南高昌庙，购地 70 余亩；总局下分设机器厂、汽炉厂、轮船厂、熟铁厂等，到 1893 年又增设黑火药厂、钢厂、炮厂、炮弹厂、栗色火药厂和无烟火药厂。制造枪炮、水雷、弹药、火药、钢铁机器和修造轮船等。

江南制造局在创建的过程中，注重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868 年，在局内设立翻译馆，聘请了一些“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的洋员，如英国的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的林乐知和徐寿、华蘅等共同译述西方科技书籍。十年中译成西洋书近百种，比较有名的如《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轨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

江南制造局创办经费约 54.3 万两，1867 年后常经费约 30—60 万两，均从清政府调拨。

福州船政局。1866 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创办时共用 47 万两，常经费自 1866 年起每月由闽海关拨银 5 万两，从 1873 年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 2 万两。厂内设有转

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肋厂等及船坞一座。1869年6月，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这是一只用法国旧引擎作主机而装配起来的木质暗轮，载重350吨，其速率据称顺风90里/时，逆风逆水时70里/时。船政局设有船政学堂，设航海建筑和航海理论两班，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天津机器局。1867年由崇厚奉旨在天津创办。创办经费21.333万两，常年经费约20—50万两。1870年李鸿章接办后，将其整顿扩充，建立东西两局，增添设备，建立了一个小型炼钢厂，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此外，还有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开办的机器兵工厂搬至南京成立的金陵制造局；1869年左宗棠在西安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并于1872年搬迁兰州成立的兰州机器局；1869年由英桂创办的福州机器局；1872年由岑毓英创办的云南机器局；1874年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丁宝楨1875年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和1877年创办的四川机器局；1881年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1883年奕在北京创办神机营机器局；1883年刘秉璋在杭州创办浙江机器局；1885年刘铭传在台北创办台湾机器局；以及张之洞1892年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从中央到省，一共设立了大小十九个军事工厂，雇佣工人约一万到一万三千人，花费了4500万两左右的国库经费。”

军事工业的生产需要原材料和燃料，“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因此，燃料工业、采掘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成为配套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维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还必须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自强与求富是分不开的。此外，外国在华近代工业的优越性，其丰厚的利润也刺激了国内资金流动的方向。在求富的主张下，70年代后兴起了创办民用工业的过程，在采矿、炼铁、纺织、轮船、电讯、铁路等部门建立了数十家民用企业。1894年以前，主要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共建有工矿企业15家，交通运输企业7家，两项合计22家。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

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办，是洋务派最早举办的一个民用企业，由海运委员朱其昂、徐润等具体总办。招商局1872年只有3艘轮船，1876年又购轮船9艘，1877年以222万两的价钱收买了美商旗昌洋行的轮船18艘，使轮船招商局总船数达30艘，占在华轮船总吨位的36.7%。招商局曾先后派遣轮船驶往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地贸易，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不久即告停顿。

开平煤矿。1876年唐廷枢筹建，1878年正式开办。开办开平煤矿主要是解决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和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煤的需要。由于煤藏量丰富，煤的质量好，1881年开始出煤，1882年已日产煤500—600吨，1894年为1500吨。开平煤矿所产煤除供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使用以外，还大量在市场上销售，利润在20%左右。

漠河金矿。漠河金矿在同治初年就被发现，有“金穴”之称。1887年李鸿章以“筹边兴利”奏准开办，1888年成立漠河矿务局。1891年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漠河金矿的开办：“光绪十三年春间，李金镛带同员司由墨尔根入山

《中国近代经济简史》第121—12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9页。

勘道 ,度地兴工 ,缔造经营 ,时历二载 ,规模始具。开厂后 ,招回流民数千 ,……三年以来 ,先后出金沙六万二千余两 ,除陆续归还借款 ,分给股商官利外 ,所有勇夫、饷械、粮运及各局经费 ,均由该厂筹给 ,不费公家之款。并提存余利 ,解充黑龙江军饷 ,以伸报效 ,实属办理得法 ,成效昭彰。 ”

汉阳铁厂。该厂前身为广州炼铁厂 ,1889 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清政府令他筑修芦汉铁路 ,他认为 “ 铁路修造应尽量用中国材料与中国资本 ,故须大规模开采矿山 ,并建立炼铁厂。 ” 张之洞把广州炼铁厂移到湖北于 1893 年建成汉阳铁厂 ;在建厂的同时又勘察煤、铁矿 ,发现大冶铁矿蕴藏极为丰富 ,大都露在表面 ,开采非常容易 ,开始修建运矿铁路。汉阳铁厂一切机器厂房、工料均从德、英、比订购。汉阳铁厂规模庞大 ,有熟铁厂、铁货厂、马丁厂、贝色麻厂、拉钢厂等大的分厂 ,还有修理、翻砂、锅炉、打铜、打铁、木模、钩丁等小分厂 ,并有炼铁炉 2 座 ,炼钢炉 4 座。汉阳铁厂最大的问题是厂址设在地势低洼的汉阳大别山下 ,既不靠近原料产地 ,也不接近燃料地 ,原料和燃料的运费增加 ,从而使产品成本增加。盛宣怀曾提出 : “ 大冶江边煤铁锰矿与白石均在一处 ,天生美利 ,如在江边设厂 ,百世之功。惜在大别山下 ,转运费力 ,屡谏不从。 ” 张之洞以 “ 与省城对岸 ,可以时常亲往督察。 ” 为由 ,把厂址选择在汉阳。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 年由彭汝琮兴办 ,1890 年正式开车生产。该企业设在杨树浦临江 ,占地 300 余亩。织布局机器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 ,依照纺机 3.5 万锭 ,布机 530 台配置的。李鸿章曾给上海机器织布局奏请了减税和 10 年专利权。 “ 十年以内 ,只准华商附股搭办 ,不准另行设局。 ” 在这种优厚条件下 ,织布局到 1892 年 , “ 每日夜能出布六百匹 ,销路颇畅 ,利润优厚 ,仅股红即达 25% ”。1893 年计划向国外增购新式细纱机 ,扩充纺纱车间的生产能力。不料十月间 ,清花间不慎起火 ,织布局全厂被焚毁。1893 年 11 月 ,李鸿章令盛宣怀等负责恢复织布局 ,改为华盛纺织总厂。与此同时 ,张之洞 1893 年也在武昌建立湖北织布官局并部分投入生产。据 1893 年 3 月间的一项记载称 : “ 织布官局当时有纱锭三万枚 ,布机一千张 ,每日出纱达一百担。 ”

天津电报总局。19 世纪 80 年代 ,洋务派认识到电讯事业的重要性 ,且投资少 ,获利快。1880 年经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电报总局 ,派盛宣怀为总办。津沪线是中国正式开办的第一条陆路电线 ,1881 年 4 月从上海出发 ,循运河 ,越长江 ,经镇江而于 11 月间抵达天津 ,12 月开始使用 ,全线 3000 余里。继津沪线之后 ,1883 年开始架设苏浙闽粤电线 ,第二年夏天完成 ;1884 年全长达 1600 里左右的长江线建成 ;1888 年九江庾岭线、1890 年陕西甘肃线 ,以及 1890 年汉口襄阳线和沙市湘潭线分别建成。 “ 五年以来 ,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 ,绵亘一万数千里 ,国家所费无多 ,巨款悉由商集。 ”

综合上述若干经济部门若干典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 ,官督商办企业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产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官督商办企业大都采用官商融资、政府拨款的办法 ,但是企业吸收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75,第 19—20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748—749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774 页。

《华北捷报》,1893 年 3 月 17 日,第 393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54。

私人资本、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期发展；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这些企业而引入，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官督商办积累了近代企业管理的经验、技术，培养了人材等，这些也为纯商办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官督商办毕竟还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必然使企业官僚主义化、衙门化，因而不可能不赔钱。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容闳在给曾国藩办第一家工厂安庆军械所时，一开始就主张：“官厂只备工作母机，造就各种机械，由民间办厂生产。顺天府尹胡燏芬也曾指出官办之大弊病，说有此之弊，办一百年也办不好，因而主张开放民营，甚至主张军工业也要民营，认为那样才能造出最好的枪炮。”

中国纯民办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始见于 1872 年，1872—1894 年，一共办了 100 多家企业，大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和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商督办企业的竞争中处境艰难。

机器缫丝业是中国民办资本近代工业最早的行业。1872 年广东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源于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使用“法国式之器械制丝”。1881 年广州附近已有机器缫丝厂 10 家，到 90 年代初大厂已雇工数百人，广州成为民办资本机器缫丝业中心；1881 年，上海建“公和永”为名的第一家机器缫丝厂，1884—1895 年间又相继建立了五家机器缫丝厂，每厂有缫丝车 200~300 部，雇佣 500~1000 工人不等。

棉纺织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初民办资本集资，后为官商合办。直到 1894 年朱鸿度在上海开办民办裕源纱厂，一切机器设备均通过上海瑞生洋行购自英国，纱锭 2.5 万枚。

机器轧花业。1886 年在宁波成立“通久源”的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厂内有 40 台日本制造的踏板轧花机，1887 年改建了厂房，安装了 12 台用蒸汽机发动的轧花机。1891 年上海建立的棉利公司和上海源记公司，以及 1893 年建立的礼永和轧花厂也具有一定规模。

面粉业。1878 年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1883 年上海建立裕泰恒火轮面局；1887 年建立福州机器面粉厂；1891 年在北京东便门外成立北京机器磨坊。1888 年祝大椿建源昌碾米厂。

火柴业。1887 年至 1890 年间，先后兴办厦门自来火柴厂、上海庆昌水柴厂、浙江火柴厂、重庆森昌泰火柴厂、上海燮昌火柴公司等。

造纸业。1881 年美国商人在上海建华章纸厂，获利极厚，引起中国资本家重视。1882 年广州开始建立用机器造纸的工厂；1889 年广州商人钟锡良创办广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1 年上海创办伦模纸厂。

印刷业。中国商人见英商在上海创办的点石斋石印局获利优厚，便模仿建立各种印刷局。其中以 1882 年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规模较大。

采矿业。1880 年前后创办的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广西富川与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均在土法开采的基础上开始使用部分机器。民办资本还投资其它金属矿，1883 年，李宗岱创办山东平度招远金矿。

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适应外国来华轮船装备和修理的需要，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开始经营船舶修造厂。上海的均昌船厂规模较大，

修造了9只小汽船。60年代民办企业已使用车床、70年代初开始使用蒸汽动力设备。

此外，在机器榨油、豆饼制造，以及制茶、制糖、制冰、制药、制玻璃、碾米等行业中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民办投资也不少，1890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1891年供电灯700盏，这是中国第一个用电照明的城市。

民办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从性质上讲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属性，较好地利用了当时火柴、缫丝、面粉、煤炭等市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资本少、规模小、数量集中、竞争能力不强，因而发展是有限的。

五、其它国家近代后期经济（1816—1872）

世界近代后期经济从总体上说有两个重点：一是英、法、德、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建成了资本主义强国。1870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英国占32%，美国占23%，德国占13.2%，法国占13%，四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81.2%。从国际贸易的划分看，到1860年，在国际贸易中，英国占25%，法国占11%，德国和美国分别占9%，四国占国际贸易的比重达到54%；二是资本主义强大了必然向全球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尤其是拓展亚洲市场具有典型特征。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曾经辉煌但在近代却趋衰落；有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达但在1816—1872年并未发达。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1. 日本、俄国的近代后期经济

（1）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明治维新

19世纪上半期，日本仍处于一个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这一时期的德川幕府统治，从封建统治制度上看，天皇仅是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大权掌握在德川将军手里，从将军、大名到武士构成金字塔式的封建统治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看，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是幕府统治的基础，“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

在德川时期，大小封建领主占有全部土地，农民完全没有土地，而德川将军是全国最大的领主，其领地均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各藩大名都是年收入在1万石贡米以上的大领主，他们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0%以上；天皇与神社分别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和12‰；上层武士一般可从将军那里获得年收入不超过1万石贡米的领地，而下层武士一般没有领地，靠从大名或将军那里领取每年为30—100石大米的俸禄。将军按等级高低，把土地分封给大名，因而将军和大名之间是一种封主和封臣的关系。在日本封建社会晚期，封臣不能自动解除对封主的关系，而土地分封又是与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更为稳定的领主制。农民租种将军和大名以及武士的土地，半数以上农民租种土地不足5反（约合7市亩），农民对土地具有世袭耕作权，但没有所有权。农民不仅要向领主交纳地租，还要交纳各种赋税，地租和赋税合称年贡，用实物交纳，约占农民年收获量的60~80%。

19世纪初，日本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农业看，由于农民精耕细作，使用新的农具等使农民用于出卖产品的数量略有增加；封建领主为了取得货币购买奢侈品，大量出卖从征收年贡得来的大米并要求农民将年贡改为实物、货币混合交纳；农民为了取得货币交纳年贡，也必须出卖部分农产品并种植经济作物，这样，大米和其它农产品便进一步商品化。此外，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动摇，破产农民往往以份地作为抵押，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借款；农民到期不能还清所借款项，商人和高利贷者便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虽然他们还不是土地的名义所有者，但却掌握了土地的实际支配权。随着富

裕农民和商业高利贷者兼并土地，或开垦新田，形成了日本的新兴地主。19世纪中期，他们手中集中了全国约1/3的土地，但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领主的认可，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征收地租，同时经商、放高利贷、开办手工工场，一身数任。从工业方面看，19世纪日本已从家庭手工业发展到了工场手工业。19世纪初，除旧有丝织业中心京都西阵以外，关东、奥羽、越后、美浓等地区都出现了丝织工场。造纸业主要在土佐，酿酒业等遍及全国各地。19世纪中叶约有工场267家，每家有织机6~7架。在桐生，随着丝织手工工场的发展，人口也增加了。1757年有300多户，1400多人，1855年增加到980多户，4000多人。在越后，农民经常把耕地租给邻村，专门从事丝织业。棉织业方面，家庭手工业者主要经营技术比较简单的本色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尤以和泉、河内、知多、伊予等地最为发达；手工工场则多半经营技术比较复杂的染色棉纱、棉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足利、尾西、久留米等地。19世纪中期，足利的手工工场已拥有织机30~200架（一家），足利的棉织品与桐生的丝织品竞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虽然最初只是在日本的纺织业中出现，19世纪前半期已扩展到榨油、制蜡、制糖、酿酒、造纸、采矿、铸造、陶瓷等生产部门。各地的官营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1854年，日本全国雇佣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300所，到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有400多家。在手工工场里，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技能有显著的改进和提高。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农村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市封建行会组织的解散。1831年和1843年，幕府一再颁布废除行会的法令，自此以后行会组织逐步被废除。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收购和贩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并兼营高利贷，19世纪，商人已成为最富有的阶层。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加速了武士阶层走向没落。德川时代末期，封建经济的衰落，幕藩的收入增加不多，支出却不断增加，从而给武士的俸禄也随之减少了，有的竟将武士的俸禄削减了70%。为数约40万的中下级武士连同家属共约180万人左右，贫穷的武士往往典当一空仍不能维持家室的温饱。不少武士从事教师、医生、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糊伞、糊灯笼、制笔、印刷、饲养鱼鸟等，有的为高利贷者服役。西南某些大名也逐渐改变了鄙视工商业的态度，也经营商业和手工工场。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冲破了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等级界限。此外，德川幕府的财政进入19世纪后已日益拮据。1834年到1836年期间，平均每年财政赤字达59万两金，1854年到1856年间平均70多万两金。大名的财政也异常困难。19世纪20年代末，萨摩藩负债已达500万两，仅利息每年就须支付35万两。将军大名向高利贷商人借贷，大名仅从大阪一地商人的贷款就达黄金6000万两，每年利息值大米300万石。将军和大名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不断增加年贡数量和提前征收年贡；增加各种捐税的征收，对各种土特产品也征收重税；幕府多次改铸硬币，降低硬币的含银量，加上纸币流通数量的增加，货币贬值。到19世纪中叶，货币的购买力只相当于17世纪中叶的1/8；另外，各藩还对盐、糖、烟草、纸张等产品实行藩营主卖制度，垄断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为了挽救封建制度，幕府统治者在19世纪30至40年代，曾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长州、萨摩、肥前、土佐等西南诸藩所进行的“藩政改革”。西南多数地区商业和工业比较发达，与荷兰、中国商人接触比较多，对西方

情况有所了解。一批要求改革的中下级武士主张奖励工商业，学习西方技术、整顿财政等。西南各藩和幕府先后实行改革，因多开始于天保年间（1830—1843年），史称天保改革。

最先实行改革的长州藩是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1838年实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灾年减免祖税；整顿藩债，豁免武士债务；采用洋枪洋炮，以西洋方式练兵，提倡航海技术；定朱子学为藩学，同时奖励西学，即自然科学；广求人才，破格登用，吸收下级武士参与藩政；打破狭隘的藩界意识，奖励藩外留学，招聘外藩人才；公布藩政府财政和藩主的私人用度。以后，萨摩、佐贺和土佐等藩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萨摩藩发展对琉球的贸易，实行砂糖专卖制度；佐贺藩积极奖励保护藩内陶器的生产和煤炭的开采；土佐藩内造纸等发达，采取了奖励生产的政策。幕府受各藩的影响，1841年至1843年实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厉行节约，奖励武艺，整肃风纪；禁止农民移住江户，规定农民入城劳作年限，到期必须回乡；救济大名和旗本的生活，豁免其对幕府债务之半，其余部分逐年偿还，不付利息；解散具有特权的商人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巨额捐税；江户、大阪四周十里方圆以内的大名与旗本的领地收归幕府直辖；禁止西学。1842年颁布的节约令中禁止从农村招雇机织女，一些地方的大名也于1842年颁布类似的禁令，不许手工工场雇佣男女工人，农家只许有织机一架，人手多者亦不得过两架，不许赁借织机等；一些地方禁止雇佣工人弹棉纺纱等。幕府维护旧的经济基础的措施，阻碍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西南各藩为代表的改革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改革措施虽然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却大大增强了西南诸藩的财政和军事实力。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日本也遭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幕府自1633年以来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建立了严密的锁国体制。这些法令规定：禁止本国船只出海，禁止本国人出国；不许旅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在海上遇难漂泊异国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不准外国船只来日本，不准外国人在日本居留；除长崎港与中国、朝鲜和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外，禁止日本人同外国接触。19世纪上半期，虽然“锁国令”的一些措施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已有松动，但日本仍然还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锁国时代”；而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以蒸汽为动力向世界扩张，天涯海角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19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船只来日本的次数增多，英、俄、美政府都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1804年9月，俄国派使节到长崎要求通商，幕府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理由，加以拒绝，1808年和1813年，英国船悬挂荷兰国旗，两次闯入日本海岛，被日本地方官驱逐；1824年，英国船只再到大津港登陆，要求通商，水户藩主调兵千余人迫令英船立即离去；1825年，幕府重申“驱逐令”，指示各藩不必待命，即行击退迫近的外国船只；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众为曲要求通商，日本海防军执行将军命令炮击美国船。从1824年至1854年的31年间，西方国家船只来日本达30次。19世纪40年代，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于1842年修正驱逐令，指示各藩允许外国船只在日本的某些港口加煤上水。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正如火如荼，美国政府决定用武力迫使日本开国。19世纪50年代，美国正在进行产业革命，急需扩大国外市场和原料等供应基地。1853年和1854年，美国政府两次授命海军准将培利率军舰进入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3月，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

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两港，供应美船粮食、淡水和煤炭等必需品，允许美国在两港设立领事馆，并享有最惠国待遇。1858年6月，美国和日本又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因时值日本安政五年，亦称《安政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自由贸易原则和美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同意开放函馆、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等五口通商；实行对美国有利的低关税率，进出口税率为5—30%；允许美国人在大阪和江户居住经商。接着，荷、俄、英、法等国也效法美国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日本被迫开港通商，日本220年来的闭关锁国局面从此结束。国门打开后，一方面日本大量输出了生丝、茶叶等商品，在客观上使日本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使日本的制丝和制茶工场手工业获得了发展；另一方面，棉布等廉价商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纺织业受到冲击，许多手工业者破产，工场主在竞争中采用价格便宜的洋纱进行生产。日本开港以后，国际贸易增长很快。1860年出口470多万美元，进口160多万美元；1867年出口1200多万美元，进口2160多万美元。8年间，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5倍多，其中出口仅增加2.5倍，进口则增加了13倍。在进口产品中，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船只、武器等工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主要是生丝、棉花、蚕卵纸、茶叶、海味、铜、油等工业原料和食品。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生丝、棉花、茶叶等产品出口量的增加造成了国内价格的上涨，从而加剧了日本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外国商人还利用金银比价关系大量套购日本的黄金。在日本开港通商之前，日本国内金银比价是1:5，而世界金融市场的金银比价是1:15。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国外开采白银的成本便宜，白银的供应量较多，在世界金融市场上黄金的价格远比白银昂贵；另一方面，日本是一个使用银币的国家，在国内抬高白银价格有利。外国商人便利用这种差额的条件，以外国银元，主要是墨西哥银元，在日本国内按照1:1的比例换成日本银币，再把日本银币按照5:1的比例换成金块，然后把这些金块运往中国上海，在那里按照1:16的比例换成白银，转手倒卖获取巨额利润。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促使米、麦、盐等生活物资价格上涨。1859年至1867年的9年中，三都物价上涨了2.5—7倍。外国棉布充斥国内市场，生丝供应减少，不少织工失业，仅桐生一地就有1500个手工业者破产。日本内部革新、幕府经济基础的动摇，加上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使日本已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以前的状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使日本也不能例外，在西方铁甲坚船和商品重炮的威逼下，闭关锁国200多年的日本被动开放市场，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以此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19世纪中期，日本封建制度的危机已经成熟。1868年发生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明治政权建立后面临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经济实力很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得很强大。在这种形势下，明治政府决定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以便快速改变日本落后面貌，把日本建设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868年4月6日，日本新政政府以天皇宣誓的形式发布了《五条誓约》的施政纲领，强调要“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并要

“万事决于公论”。这个《誓约》表明了明治政府除旧布新，走近代化道路的决心。为了实现目标，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兴产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下，自上而下地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首先，明治政府“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经济改革准备了前提条件。在幕府统治推翻以后，各藩依然存在，不仅政令无法统一，而且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无法形成。1869—1871年，明治政府在各藩“奉还版籍”的基础上，“废藩置县”。全国被划分为东京、京都、大阪三府和72县，统一了国家政权。取消大名和武士的终身年俸，废除封建等级制度。1876年8月，明治政府实行“秩禄处分”，规定大名和武士的终身年俸改由国家一次发放公债的方法，以后不再支付。所支付的公债从第6年起，每年以抽签方式偿还，规定30年内偿还完毕。当时领取公债的武士总计31万人左右，公债总额合计17300万日元。一般武士平均只能得到500多日元，而大名和上层武士可领到1—100万日元。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领得巨额公债的大名和上层武士纷纷投资于银行、工商业或购买土地。公债可以在证券交易所转让出卖，也可以凭它向银行借款，还可以用它还债。这些公债大都转化为资本。在日本，用这种赎买办法取消大名和武士俸禄的过程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实行土地改革和租税改革，这是明治政府加速原始积累进程中最根本的手段。1871年，政府宣布允许农民缴纳货币地租和自由栽培农作物，取消幕府对于农业的种种限制；1872年3月，政府宣布解除自1643年以来幕府制定的永世不得买卖土地的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且宣布个人对土地有所有权，并在全国颁发证明土地私有的“土地执照”。农民世袭租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短期租用的土地，归出租人所有；抵押过期的土地，归接受抵押的人所有。至于那些无主的土地，例如山林和原野则一律收归国家所有。1873年7月，明治政府又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颁布《地税改革条例》。规定地税一律用货币缴纳，税率为法定地价的3%，附加税为地税的1/3；新地税不论土地归谁经营，一律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土地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土地改革和租税改革，在日本最终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土地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工商业制度的改革是明治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成立时，就把“富国强兵”、“殖兴产业”作为“商工立国”的国策。“殖兴产业”是明治政府为了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制定的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其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和动用国库资金，以国营军事工业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成长。正如日本通商产业省编著的《商工政策史》中所指出的“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目标——商工业（包括贸易和矿业）的近代化。1868年至1870年，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禁止各藩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制度；允许一切人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买卖土地；设置通商司，奖励贸易；整顿全国货币和汇兑业务；建筑铁路并募集所需外资和发展邮电通讯业等等。为了贯彻“殖兴

产业”的方针，扶植资本主义成长，明治政府决定大力创办国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产业革命。为此，明治政府在接收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军工企业和矿山后，首先在这些企业和矿山中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不断加以改造和扩充。如 1868 年接收幕府的关口制造所后，创办为东京炮兵工厂，后又聘请外国技师并从英国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然后对该企业进行扩充。到 1875 年，该企业已具有五金、火药、鞣工、木工、锻工和铸造等 6 个作业场，同时还有板桥火药制造所为其附属工厂。1870 年明治政府接收幕府的长崎制铁所后，将该所的机器设备及工人迁至大阪内，创立大阪炮兵工厂。1868 年明治政府接收幕府横须贺制铁所，成立了横须贺海军工厂，到 1871 年，该厂又建成了炼钢、炼铁、蒸汽锅炉、铸造及船台。其船渠分工厂，规模很大，配备了 116 种机器，蒸汽动力达 180 马力，工人 960 人，设有熔矿炉及铸铁炉等 50 个。1871 年明治政府在赤羽还创办了一个制造机器的企业，它以佐贺藩交出的机器设备为基础创办，这个称为赤羽工作分局的企业机器设备齐全，约有 130 多种设备，生产的机器有玉米脱粒机和造苹果酱、挤葡萄汁的机器用具以及发动机、机床等等。明治政府还建立一批“模范工厂”以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开始将一些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以较低价格卖给个人，直接对私人资本实行扶植和保护的方针。明治政府还采取发给巨额补贴、进口优先、发放大笔企业贷款、减免出口税等办法，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岩崎弥太郎是下级武士出身的大商业高利贷者，他于 1871 年买下藩属的几艘小轮船，开办了三菱航运公司。私营机械工具生产的企业也有所发展，1871 年废藩置县后，曾在久留米藩制造所工作的田中久重创办了一个机械所。后来他又在东京开办工厂，制造生丝试验器及电报机等，并发明了许多类型机器。长野县的卧云辰致，发明了卧云式纺纱机。私营机械工业的发展对产业革命也起到了促进作用。1872 年日本全国铺设的铁路已经达到 17.69 英里；蒸汽动力的船舶 1870 年已达到 15498 吨；棉纱产量、煤产量、铸铁以及钢的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870 年秋日本设立工部省，聘请了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师，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当时明治政府中薪金最高为月薪 800 日元，但政府各部所聘外国专家月薪最低 800 日元，最高 2000 日元。1871 年 11 月，明治政府派岩仓具视率庞大的考察团访问欧美各国，历时近两年。回国后集中力量抓工业建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直到 1868 年日本发生“明治维新”才使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是，日本 70 年代在“殖兴产业”方针的推动下开始迈入产业革命的进程。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一二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路程，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并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英国学者威尔斯曾这样评论：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明治维新，日本却“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象日本当年那样阔步前进。”

（2）俄国农奴制经济的危机与改革

自从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以来，俄国的存在令人瞩目。彼得大帝曾派遣使团赴西欧考察，他化名随团同行，在荷兰的船厂作工，在英国研究造

船。彼得大帝率先在俄国发动的改革不仅是要按照西欧的成功办法来回答西欧各国工业化的挑战，而且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创了同保守、封闭倾向相抗衡的改革、开放的潮流，它贯穿于俄国近代史之中并对俄国未来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的近代化改造尽管步伐缓慢，18世纪末年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到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已有很大的发展。1804年，全国共有手工工场2400多个，工人近245000人；到1825年，手工工场增加到5200多个，工人340000人。工场中的雇佣工人数不断增加，如在加工制造工业中，1804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8%，1825年提高到了54%；而棉纺织工业中，1825年雇佣工人已占工人总数的94%以上。在许多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渐替代手工劳动；全部纺纱业和大部分印花布业都已使用机器生产，一些工业部门开始应用蒸汽机和水力涡轮机等动力机器。交通运输业也在快速发展，1815年，第一艘汽船在涅瓦河上出现；30年代至40年代，在伏尔加等河流开辟了定期的汽船航线；铁路建设开始于30年代，1851年建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长达600多公里的铁路线；以冶金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也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改造，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由于俄国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也迈入了产业革命的进程。从30年代到50年代，俄国的工厂和工人都增加了3倍；在1835年至1860年的25年中，机器的进口增加了24倍；19世纪前60年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2.5倍。

在农业中，俄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也在缓慢进行。尽管木犁等小农具还在普遍使用，但在少数地区已采用打谷机、播种机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机器。从30年代开始，俄国建立了一些农业机器制造厂，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布奇那波工厂，这个厂的产品在全国畅销，1858年出售的各种机器和农具共值14万卢布。土地耕作也有改进，少数地主把落后的三圃制改为轮种制。经济作物如甜菜、马铃薯、王蜀黍等的播种面积扩大了，30年代以后成立了许多农业协会，出版了有关农艺、提高农业产量的书籍与刊物。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区农业生产专业化增强，同时也使国内市场更为活跃。19世纪中期，全国约有4300个市集，贸易总额达到2.3亿卢布。从19世纪初到50年代，俄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3倍多。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期间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行了禁止3110种货物进口和禁止21种货物出口的关税法，并进行以实行银本位制的币制改革，以稳定俄国卢布价值。俄国的经济发展还与对外战争有密切关系，1828年俄国与伊朗签订《土库曼条约》，伊朗偿付俄国2000万卢布的赔款，同意俄国在伊朗有领事裁判权和多种经济特权。

但是，俄国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却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农奴制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要求农奴制经济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为交换而生产，为增殖货币财富而生产，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奴制经济是无法提高商品率的。在农奴制度下，大部分可耕地仍然被地主和国家占有，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妨碍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地主无偿使用农奴的劳动，很少关心劳动工具的改进。一个地主在解释他为什么反对使用打谷机时说：“打谷机要花钱，要修理，还要为它养马，但农民的劳动却可一文不费。”在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和其它土壤肥沃的省份，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不断减少、甚至全部收回农民的份地，把农奴变成家奴，每月发给他们口粮；在北部非黑土地带，因土质较为贫瘠，地主要通过提高代役租来增加收入，这

就促使农民进城做工或经商；有的地主还允许农民以重金赎取自由。俄国的农奴制经济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顺畅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制经济已成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并开始在生产中瓦解；在工业生产中，封建农奴制的阻碍作用束缚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到1860年底，在工厂中作工的86万工人中，44%属于强制劳动。发展工业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于是大部分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的雇佣工人，大多数是向地主缴纳代役租的农民。地主有权随时召回他们。因此，他们只是在对企业主的关系上是自由劳动者，还不是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工人，造成工业生产的不稳定。发展工业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原料来源，可是农奴制下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工役制经济、农民低微的购买能力很难提供这样的条件。工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订货结束，工厂就难以为继，因为官方市场一撤销，它们就找不到别的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至于国际市场，因有先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欧邻国早已占领国际市场，加之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俄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上市场占有率不高，这些都使俄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大大落后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生铁生产增长了11倍，而同期的俄国生铁生产增长不到1倍；在18世纪时，俄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位，而到19世纪则退居第四位。农奴制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废除不可避免。

1856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1857年1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召开了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拟订解放农奴的草案；11月2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给西部边区总督的敕令中，允许立陶宛3个省先后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拟定解放农奴的草案；1861年1月28日至2月17日，沙皇俄国国务会议就农奴制改革草案进行讨论和审批，国务会议于2月17日最后批准农奴制改革法令；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的特别宣言。3月3日颁布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一共包括了17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关于农奴的人身解放。从法令颁布时起，农民获得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人身自由权。但地主对农民的经济以外的强制并没有完全消除。例如，根据法令的规定，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之前，农民对地主还负有“临时义务”。

关于份地和农民因使用份地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得到一块份地，同时承担一定的义务。份地分配情况视各地情况由不同法令规定。如俄国欧洲部分将土地划分为黑土、非黑土和草原三个地带。授予农民的份地，在法律上仍是地主的财产，农民只有“永久使用”权，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取份地契约前必须对地主尽一定的义务。

关于赎取份地的手续。农民的宅旁园地随时可以赎取，向政府交纳约60卢布的法定赎金，6个月以后即可取得所有权。赎取份地则必须得到地主的同意，赎金数额以每年代役租作为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后得出。例如每年代役租为12个卢布，则赎金为 $12 \div 6\% = 200$ 卢布。在赎地时，农民必须先

付赎金的 20—25%，其余的由政府从国库拨款垫付给地主，农民在以后 49 年内每年以“赎地费”的形式偿还。这样，作为赎金基础的就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资本化的代役租，因而农民实际上并不是赎土地，而是赎取封建赋役。赎金也大大高出了当时的实际地价。如 1854—1855 年份地的实际价格共值 5.54 亿卢布，而赎金的总数却高达 8.67 亿卢布。

关于改革后农民的管理组织。主要是从下至上建立一定的行政组织来执行废除农奴制的具体法令和政策。1861 年 3 月 3 日的法令只涉及俄国欧洲部分的地主和农民，以后在 1866 年又根据这一法令的基本原则，先后解放了 100 多万采邑农民和 950 万国家农民。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和土地改革，正是走的普鲁士道路，它实际上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在责成农民对地主担负一定义务的前提下，给予农民有永久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一块份地。

第二步，强制农民必须以高额赎金获取这块份地。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和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沙皇和贵族地主阶级的政府进行的，但就其性质来说则是资产阶级的，它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1861 年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农奴制的废除使农民能够摆脱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问题，政府通过赎金方式从农民那里获取了约 20 亿卢布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为俄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农业经济也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没有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象俄国这样多的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旧制度，农奴制残余的大量存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依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大量封建残余的错综交织成为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这一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机器工业和蒸汽动力的增长。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渐排挤手工劳动，到 1880 年，在纺织工业中使用机器的机床已占 2/3，而手工操作的纺织机只占 1/3；在冶金工业中，虽然各地发展水平不平衡，但到 80 年代初，蒸汽机的总马力已超过水车的马力。1860—1890 年，生铁产量增加了 2 倍，钢铁产量和棉纺织品产量各增加了 3 倍，顿涅茨矿区的形成使煤的开采量增加了 19 倍，俄国欧洲地区机器制造工厂总数增加了 2.5 倍；铁路线在 1861 年有 1600 公里，到 1880 年达到 30000 公里；1866—1890 年，雇佣工人 1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数目增加了一倍多，工人人数增加 2 倍多，产品总值增加 4 倍多。到 1890 年，全部棉纺工人的 3/4 都集中在雇佣 1000 人以上的大棉纺工厂中；在采矿、铁路部门和其它大工业中劳动的工人数达到 143 万人。俄国工业生产集中程度超过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在工业生产的技术经济指标上俄国仍落后于西欧国家和美国，俄国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 1/2 至 2/3。然而在 1861 年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俄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令人瞩目，形成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波罗的海沿岸成为机器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工业区；高加索的沿海城市巴库成为石油生产的中心；南方的顿涅茨盆地成为煤和冶金的中心。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国。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引起了对农业原料和商品粮食需要的增长，俄国农业经济也日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农奴制废除后，俄国农

村以土地为中心资本主义发展正在缓慢进行。一些富裕农民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不仅购买贫苦农民的土地，而且还购买和租佃一部分地主的土地。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办起了许多大农场；同时，有一部分贵族地主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同时引进新式农具和农业技术，使地主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到 80 年代，在俄国欧洲部分的 43 个农业省份中，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占优势的省份已有 19 个；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使雇佣工人人数在 90 年代达到 350 万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1865 年，沙俄派兵进入中亚中南部的浩罕汗国，占领其首府塔什干，1868 年和 1873 年，又先后进攻中亚南部的另外两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迫使它们臣服俄国，并且赔款割地。在对伊朗、土耳其以及克里木战争前后，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50 年，沙俄以武力强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随后又占领了中国库页岛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北岸的大片领土；1854—1857 年，沙皇又强占了包括海兰泡在内的部分中国领土；1858 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之机，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爱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从中国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 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两国共管；沙俄以“调解”中英、中法关系为名，1858 年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860 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1864 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走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约 4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71 年沙俄又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

在俄国近代（后期）历史中，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和经济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

屠格涅夫 1818 年发表的《税收理论的经验》。他认为，向地主经济征收土地税而不是征收收入税是有利的，因为若土地税与收入同时增加的话，那么土地所有者就很少会致力于完善耕作以便增加收入，因为他们预先知道，随着他的利润的增加，他必须缴给政府的那部分收入也要增加。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自由是民族繁荣的必不可少因素。政府应该使每一个人有可能寻找自己的利益并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本；税收应按照收入均匀地分摊，征收的时间和税额应预先规定，纳税应在对纳税人有利的时刻进行，而征税制度应是简便的、对国家来说是花销少的。他认为“向收入，并且是向纯收入征税，而不是向资本本身征税”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有工资税，因为工资不是利润。《税收理论的经验》一书以纸币一章结束，纸币在作为流通手段与金属货币作用相同时，纸币的发行量与经济流转的需要量相适应，若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的需要量，则它们的价值就会低于“纯货币”价值，它们就将变成“在公民之间不均匀地分摊”的税收。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他的大部分著作的内容是批判农奴制度的，其中较突出的经济著作主要有《论作为财富要素的土地》（1854 年）、《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1857 年）、《论土地所有制》（1857 年）等。他认为，农奴制度的本质就是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迫使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进行对地主个人有利的农业工作”。地主占有农民劳动成果的形式主要有：劳役地租——直接占有剩余劳动，实物地租——占有剩余产品，货币地租——占有货币形式的剩余产品；农奴制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要低，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自

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而且要预付资本，农奴主——地主则不预付任何东西，而是通过超经济强制获得自己的收入。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农奴制是否符合合理性的观点出发来批判农奴制，农奴制不是人为引进的制度，而是自然地产生的制度，只是它不符合“健康的经济概念”。他反对 1861 年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是掠夺式的和半途而废的，目的是使农奴制度适应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条件。他的纲领的出发点是必须完全消灭农奴制，给农民人身自由、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也有许多著作，如《莫利纳里。政治经济学教程》（1857 年）、《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58 年）、《经济活动与文法》（1858 年）、《资本与劳动》（1860 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注释》（1860—1861 年）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经常产生萧条，不是以消费而是以销售为基础的整个经济制度不可避免产生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损失了成百万和上千万个劳动日”。在分析利润、工资和地租时，他认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其中每一个都是“由竞争决定的”，利润的扩大压低了工资，而地租既压低了利润，也压低了工资。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创造以及他们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尝试，他认为否定劣等地的地租是李嘉图理论的缺陷，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

2. 荷兰、意大利、墨西哥等欧美国家近代后期经济

（1）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经济

荷兰是西欧历史上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早在 15 世纪至 16 世纪，荷兰的封建关系已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渔业、航海业、造船业以及与造船业有关的生产部门出现并得到发展，17 世纪是荷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是“17 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作为“世界运输队”的商业贸易上，荷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商业来实现的。荷兰的船只把瑞典的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粮食和黄麻运往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各港口，然后又装载着酒和香料返程。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靠海外扩张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先后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到 19 世纪初，荷兰已被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的英国等所超过。法国拿破仑帝国使荷兰失去了独立。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荷兰恢复了独立，根据 1814 年英荷所订条约，荷兰恢复了对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殖民统治。19 世纪 60 年代，当欧洲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时候，荷兰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19 世纪中叶以前，荷兰主要还依赖于 19 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发达的成就，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所需要的工业品主要从英国和比利时进口。1839 年荷兰建成第一条铁路，1850 年的铁路线只有 176 公里，相当于英国的 1.8%，德国的 3%，法国的 6%，奥匈帝国的 13%，爱尔兰的 20.3%，比利时的 20.6%，意大利的 28.4%。这不仅减少了国内对钢铁的需求，同时也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1849 年，在

雷季娜《经济学说史》第 15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0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就业总人数 125.10 万人中，农业就业人数 55.20 万人，占 44.1%，工业就业人数 30.10 万人，占 24.1%，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仅占 19.1%。在这个时期，荷兰既无铁又无煤。荷兰的农业从 16 世纪以来就较为发达，荷兰依靠国内高产的农业和从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获得工业所需的原料。

19 世纪 60 年代荷兰开始产业革命，荷兰的工业革命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荷兰的工业革命不是建立在加工本国的矿产资源和原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加工从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输入的原料，并向这些殖民地输出工业品和输出资本的基础上的。荷兰殖民者对殖民地农民实行强迫种植制度，规定农民必须在自己 1/3 到 2/3 的土地上种植他们所需要的农作物如甘蔗、咖啡、蓝靛、棉花、烟草等，并必须按规定价格出售给荷兰殖民政府。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由于殖民利润的增长、由于荷兰位于工业区的出入口这样有利的地理位置、由于围海造田工程取得好的效益，也由于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荷兰的经济也加快了发展。荷兰重建了商船队，加快了铁路建筑，运输业逐步完善。1870 年的铁路线已达到 1419 公里，为 1850 年的 8.1 倍；1870 年荷兰已有 3200 台蒸汽机；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开始发达，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西部各港口以阿姆斯特丹的变化尤为显著，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以加工殖民地农产品为基础的工业由于原料价格便宜发展更快；机械制造业特别是造船、修船业得到迅速发展。1870 年，荷兰政府通过在印度尼西亚施行糖业法和土地法。糖业法废除了在印度尼西亚推行的甘蔗强迫种植制，允许私人经营种植园。土地法规定凡不能确证私有权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到 19 世纪末，荷兰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最早，发展较晚的国家。“在 14 和 15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这些城市就是指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尽管意大利许多发达的商业城市早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到 19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仍处于封建割据的局面。整个意大利被贸易壁垒、地方关税、各种不同的方言以及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猜忌和冲突所隔断，境内各邦关卡林立，币制和度量衡也不统一，没有形成全意大利统一市场。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又阻碍工业的发展，工商业最发达的伦巴底和威尼斯已被并入奥地利帝国。在农业中，对分制地租和高利贷使农民实际处于农奴的地位。农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北部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已开始发展，垦荒和灌溉已较为普遍，而南部则保持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分成租佃制和自耕农经营小块土地。意大利的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得到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因为封建统治的复辟而被摧毁。从外部原因看，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其它国家与地理大发现有关。地理大发现是西欧商人为了绕过地中海而开辟的新航线，新航线的开辟使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打破了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垄断地位，也给其它西欧国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市场。由于大部分西欧商品已不再经过地中海而取道大西洋，从而使发达的意大利北方商业城市因远离新航线而失去了东西方贸易和欧洲商业中心的地位。19 世纪初，除西西里以外，整个意大利都从属于拿破仑帝国。在拿破仑统治下，虽然在意大利实行了若干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如废除贵族特权、教皇政权和关卡，封闭大批寺院并拍卖其地产，推行《拿破仑法典》等，扫除了许多封建残余，

有利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使意大利实现统一；在经济上，拿破仑的统治使意大利更为落后了，意大利的贸易受到种种限制，工业原料如生丝、羊毛等只许输往法国，法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大陆封锁政策更使意大利商业衰落；拿破仑还从意大利拿走了大量赔款和军费。19世纪上半期的意大利经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意大利人更多地忙于政治斗争。1848年，意大利的庇蒙特、托斯坎尼和教皇辖地间建立了关税同盟，工商业开始逐渐活跃。1853年，意大利颁布了“期票和支票法”；1855年颁布了“工业垄断法”等一系列促进经济活动的法规与政策。19世纪50至60年代，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高涨，在意大利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形势，在意大利北部的庇蒙特、伦巴底、托斯坎尼等地区，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企业日益增多。纺织业的发展尤为明显，在这期间，棉织品的产量增加了3倍；毛织品产量增加了2倍，丝织品产量增加了1倍。冶金和机械制造业等新的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在农业方面，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地主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产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势力也有了增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进入高潮。1870年意大利实现了统一，建立了意大利地主、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意大利的统一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能够充分利用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成就来发展资本主义，一些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纷纷建立，生产和资本集中过程也大大加强。例如，1862年成立的巴斯托吉公司控制了铁路、金融和电力部门；1865年成立的意大利水泥公司控制了建筑材料的生产；1872年成立皮雷利公司控制了采矿和橡胶生产等等。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大量封建残余混合生产，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它的工业原始资本的积累从一开始就依靠外国资本和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在意大利的首批重工业大企业中，除了政府的投资外，还有法国、德国、瑞士等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加上意大利国内缺乏煤炭资源等，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与对外扩张是分不开的。1870年意大利统一时，南部和北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差别，南方生产率低，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严重；工业规模小、资本缺乏、市场狭小。意大利统一后，开始了产业革命的进程。

西班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尽管西班牙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殖民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西班牙国内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以及发动战争对外扩张等原因，从海外流入的金银财富并没有在本国起到原始积累的作用。拿破仑政权崩溃后，1817年，西班牙同英国签订条约结束奴隶贸易；1819年，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1821年，西班牙新议会开幕，代表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保守派，在议会中占多数，组成政府。议会通过若干反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法令，废除宗教裁判所，减轻什一税，没收并出卖寺院领地，取消领主裁判权和狩猎权，废除行会和国内关卡，取消政府对盐、烟等商品的垄断权。1822年，激进派政府颁布法令，把荒地分配给参加革命的士兵和无地的农民；1835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设备检查项目条约》，相互检查船只，以缉拿贩运奴隶的船只。西班牙的工业和农业在19世纪上半期仍处于欧洲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列。19世纪后半叶，西班牙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工业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工业水平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

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西南，葡萄牙资本主义萌芽很早，15世纪就开

始向海外扩张，葡萄牙占领的殖民地有非洲的佛得角群岛、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印度的果阿、达曼、第乌、东南亚的马六甲、摩鹿加群岛、帝汶、南美洲的巴西和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中国澳门等。总面积超过其本土 100 倍以上。19 世纪，葡萄牙的殖民地有的摆脱了葡萄牙殖民统治独立了，有的则变成了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葡萄牙已成为二流的资本主义国家。1825 年葡萄牙承认巴西独立。葡萄牙农业制度和耕作方法落后，粮食不能自给；19 世纪上半期还没有重工业，仅有一些不发达的加工工业，葡萄牙的经济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依赖于贸易和殖民扩张。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工业革命浪潮冲击葡萄牙，1856 年葡萄牙建成了第一条铁路和第一条电报线路。1861—1889 年间，完成了主要铁路网，并建造了一条从里斯本通向里约热内卢的海底电缆。

（2）奥地利、比利时、希腊、挪威、瑞典、瑞士、卢森堡、丹麦经济

奥地利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比其它欧洲的先进国家晚，但 19 世纪前半期，奥地利帝国仍是一个不发达的帝国。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继续存在，农民除承担封建义务以外，还要向国家和教会交纳各种税，农业生产率低；19 世纪初，纺织业已成为奥地利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但是，奥地利政府关于发展工业和经济不得与王室的政治利益相抵触的政策，以及行会限制等阻碍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带动其它经济领域的发展。虽然在 19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奥地利已开始产业革命，但在 50 年代以前进程缓慢。40 年代初，奥地利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仍占优势，较大的、采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维也纳与伦巴第等。但是，由于资本短缺、自由劳动力少，社会购买力低、关卡林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进展缓慢。奥地利史学家埃·普里斯特尔认为，19 世纪前半期的奥地利经济史可以说是木材与煤的斗争史，而又是以木材的胜利作为结局。因此，直到 50 年代初，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铁路运输（机车），都是使用木炭和木柴作为燃料。1825 年，奥地利修筑了“第一皇家私营铁路公司”，1832 年第一条铁路通车，在私人修筑铁路的同时，1842 年起国家也开始修建铁路，到 1850 年奥地利铁路线已有 1357 公里。铁路建设刺激了其它部门的发展，加上奥地利政府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进行了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奥地利的采矿业和机器制造业明显发展，而且掀起了修筑铁路的热潮，1870 年奥地利铁路线急剧增加到 6112 公里。这对于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对于工业生产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 19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奥地利基本完成产业革命。

比利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从 1830 年才开始的。独立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早已产生并得到发展，佛兰德尔是西欧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区之一；布鲁日、根特、伊普尔、亚拉斯的毛纺织业很早就驰名全欧。地理大发现后，安特卫普成为世界航路的中心。比利时在采煤、纺织等方面具有先进水平，1817 年比利时兴建了第一个铁厂。比利时建国以后，在持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比利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迅速，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1831 年，比利时的煤产量已达 230.50 万吨，生铁产量 9 万吨；1835 年比利时制造了第一台机车；1840 年建成欧洲大陆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和铸铁厂，雇佣工人超过 2500 人。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后，工业与出海口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建设铁路网成为独立后的比利时的迫切任务，从 1835 年 5 月 5 日欧洲大陆的第一班定期客车正式通车、同年 12 月第一辆比利时制造的机车运行开

始，到 1843 年，比利时铁路网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铁路线总长 350 英里；1845 年比利时蒸汽机已达到 4.8 万匹马力。1846 年比利时的工业就业人数已达 72.80 万人，农业就业人数 102.30 万人。1850 年开始炼钢，人均钢产量居世界前列。此外，在 19 世纪比利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原锌生产国，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垄断了许多种玻璃制品。比利时有储量丰富的煤和一定数量的铁，主要煤田分布在比利时中部的埃诺——桑布尔——默兹河谷一线，瓦隆煤田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一直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煤田。比利时的钢铁工业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19 世纪 70 年代始，比利时开始采用托马斯炼钢法并逐步替代了贝西默炼钢法，钢产量在 1879 年已达到 11 万吨。比利时在欧洲是一个小国，但工业产量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需要，生产的产品需要输出，因此比利时是积极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的国家。

希腊在 1832 年建立希腊王国。从 19 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希腊发展较明显。由于大量引进外资，特别是向英、法、德等国借款，导致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出现了纺织厂、造酒厂、皮革厂。1869 年希腊的铁路线只有 9 公里。在西欧的大多数国家已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时，希腊还是一个农业国。

挪威（Norway），意思是“朝北之路”，有“万岛之国”的称号。1830 年以前，挪威连年饥荒，生活水平只相当于 1530 年。当时，挪威的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都落后，人口的 70—80% 都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工业很少。一直到 1850 年，半加工商品，如鱼、木材和未经精加工的金属仍然在出口中占主要地位，没有多少工业品可供销售。挪威的经济主要靠农业、渔业和航运业。根据当时的统计，挪威主要经济部门的年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1835—1845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9%。1850 年以后，经济增长加快，木材工业和航运业成为挪威经济的主要部门，挪威在世界商船队的地位由第 6 位上升至第 3 位，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国内贸易和交通也相应发展。1875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830 年增长 2 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

瑞典在 19 世纪上半叶重视农业生产，1803 年开始土地制度改革，1827 年推广到全国，宣告了古老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结束。新土地制度推动勤奋农民把小块份地合并成较大的农田，改变耕作制度和办法，采用新农具，扩大作物品种，以及开垦新区荒地。1818 年全国耕地面积比 1805 年增加了 17%。1830 年谷物产量比 1810 年增长 58%。农业生产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不能够承担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1810 年瑞典人口为 240 万人，1850 年上升为 350 万人。19 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企业家和富有的钢铁商从英国学来焦炭炼铁新法，新型炼铁厂到处出现。1846 年取消了对制铁限制的决定。1848 年颁布新公司法为经济发展带来新机会。铁产量从 20 年代平均每年为 8 万吨上升到 50 年代的 14.5 万吨。与此同时，瑞典企业家重视木材工业的开发。1849 年在诺尔兰海岸建成第一座蒸汽锯木厂，不久，建立了许多锯木厂，到 1860 年木材出口达到 114 万立方米，比 30 年代平均年出口量增加 5 倍。木材出口为瑞典赚得了大量外汇。利用这些资金，瑞典 50 年代从英国购买棉纺织机器，取代了国内落后的家庭手工业。木塔拉能够生产出包括大型蒸汽机在内的多种机械，成为新兴的机器制造业中心。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始，瑞典改革邮政、创办电报，并逐步建立起现代银行业；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瑞典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865 年，瑞典同法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最终确定了自由贸易原则，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3.4%。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下半期开始，一些地方和厂矿开始建设短途铁路。议会决定，地方铁路由私人修建经营，全国性干线由国家从国外借款修建。1862 年从首都到哥德堡干线的通车对瑞典现代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促进了农村和内地城镇的繁荣，加快了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

瑞士是山地之国，1815 年维也纳会议确定瑞士为“永久中立国”。埃·邦儒尔在《瑞士简史》一书中论述这一时期瑞士工业发展的因素时写道：“首先，中立政策使瑞士领土避开了战争，所以经济发展从未全部停顿过。……瑞士商业在欧洲战争中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而且，雇佣军服役、津贴和对外出口，带来了大量外国资本。这些资本，或有利于本国工业，或直接投入本国工业。在 200 年间，瑞士作为避难所的权利，也引进了许多流亡者。他们主要是来自法国、萨尔、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这些人创建了新的工业部门或使原有工业近代化，从而使瑞士的工业更加繁荣。最后，国家在欧洲的中心位置和很多的水道，促成了工业不寻常的发展，……。”1848 年瑞士制订联邦宪法，结束了瑞士的封建割据局面。关税、邮政、度量衡和币制的统一为瑞士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850 年瑞士的铁路长度仅有 25 公里，1860 年增加到 1053 公里，1870 年达到 1421 公里。尽管 1852 年的铁路法规定联邦国家没有控制铁路的权利使瑞士没有形成一个有计划的国有化铁路系统，但 19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兴起的修建铁路的热潮，对于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国内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股份公司也纷纷建立起来，如 1866 年建立英瑞炼乳公司、1867 年建立亨利·雀巢公司等。瑞士的金融业也开始发达，1862 年建立温特呼尔银行，1863 年建立托根巴哈银行，1872 年建成巴塞尔银行，以及 1856 年建成的瑞士信贷银行等。星罗棋布的银行网络对疏通国内外经济渠道、促进瑞士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到 19 世纪后期，瑞士已形成了工业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金融财团。

卢森堡于 1839 年成为独立国家，1842 年，卢森堡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1867 年欧洲国家伦敦会议公认卢森堡为永久中立国。19 世纪下半期，卢森堡开始建设铁路网，依靠本国的铁矿石和鲁尔的煤，并引进吉尔克莱特和托马斯发明的碱性底吹转炉炼钢法即托马斯炼钢法，使卢森堡冶金工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1855 年生铁产量 60 万吨，1873 年达到 25 万吨，其中约多半炼成了钢。同时，由于大量施用从矿渣中提炼出来的钙肥，贫瘠的阿登区也变成了肥沃的阿登区，农业生产发展了。到 19 世纪下半期，卢森堡已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

丹麦以农立国，19 世纪上半叶，由于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丹麦农产品已不仅能够实现自给，而且能够有剩余农产品输出。19 世纪下半叶，东欧以及北美大量廉价谷物涌入西欧市场，促使丹麦农业生产的重心从种植业向畜牧业转移，使畜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农业、牧业生产的提高，促使了农、牧业的结合，许多中、小农户纷纷组成合作生产组织，如乳品生产合作社等。同时，腌肉、家禽、蛋制品加工等也成立了加工合作社。渔业生产因机动渔船、冷冻设备的应用，使丹麦的水产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手工业是丹麦传统经济的支柱，丹麦人利用当地丰富的陶土和原木发展陶瓷、家具等。制造业在 19 世纪上半期还处于萌芽状态，1863 年丹麦颁布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新

关税法，为丹麦制造业及其它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经济

波兰在拿破仑战败后，华沙大公国的一部分与比亚威斯托克省组成波兰王国，俄国沙皇为国王。1848年奥地利占领区废除农奴制，1865年沙皇也宣布在波兰王国废除农奴制，整个波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波兰的农业以谷物和大豆为主，生产效率低，大地主控制了大部分土地。1842年普鲁士占领区建成了弗罗茨瓦夫——奥瓦瓦铁路线，它是波兰的第一条铁路。

南斯拉夫1815年建立公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约占80%，因为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半岛，多瑙河流经东北，西南濒亚得里亚海，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1848年欧洲革命促进了南斯拉夫北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已先后出现工商业资产阶级，但土耳其占领区仍保留了封建主义经济。

匈牙利在19世纪基本上是奥地利的附庸国。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改为奥匈帝国，匈牙利在一些方面独立于奥地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匈牙利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土地巨富和乡绅对工商业不感兴趣，小型工场常不足10人。

（4）墨西哥、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经济

19世纪以前，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拿破仑战败，西、葡的衰弱，以及美国反英殖民统治的成功，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1816年阿根廷独立，1819年哥伦比亚独立，1821年，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相继独立。

墨西哥独立后的经济仍十分落后，从国内来看主要是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土地，以“多罗列斯的呼声”为代表的争取土地的农民运动接连不断。从国际方面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墨西哥扩张。1848年2月，美国迫使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这是美国兼并墨西哥北方大片领土战争的结果。条约规定，墨西哥把部分领土割让给美国。这部分领土包括：今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的大部，俄克拉荷马州狭长地带，科罗拉多州大部，堪萨斯州西南部和怀俄明州西南部。1854年至1860年，墨西哥政府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1859年墨西哥总统胡亚雷斯颁布改革法令，废除僧侣和军人的特权等，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农民或是租种地主土地，或是当季节工人，土地被少数地主或外国人所有。工业在这段时期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886年，共有棉纺织厂110家，毛织厂27家，造纸厂10家，肥皂厂146家，卷烟厂41家，玻璃厂7家，酿酒厂3175家，制造其它产品的工厂192家。

巴西于1822年独立，但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继续保存奴隶制，阻碍了巴西社会经济的进步。奴隶劳动是巴西种植场经济的基础。19世纪中叶，巴西的经济纳入世界市场，咖啡、糖、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的产量日益增加，但巴西所需的稻米、玉蜀黍等粮食产品依赖从国外进口。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也开始出现和成长，1850年已有50家工厂；1851年巴西与英国轮船通航；1852年，巴西建成了国内第一条铁路；1874年，开辟了通往欧洲的海底电报。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同奴隶制、封建制的矛盾在加剧。

到1826年，除古巴、波多黎各、圭亚那等外，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地区都已摆脱西、葡、法等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但是政治上的独立并不等

于经济上的独立。19 世纪拉丁美洲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单一产品经济，即不少国家主要只生产某种单一的农产品或矿产品，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全靠咖啡维持；糖的生产则在古巴和多米尼加；巴拿马（当时属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唯一出口是香蕉；铜和锡分别构成了智利和玻利维亚的经济支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停止向拉丁美洲的扩张，他们向拉丁美洲倾销大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并从拉丁美洲取走原材料；他们利用当地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经营经济作物；他们设立银行，进行投资贷款，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同时进行。1807—1814 年，英国对拉丁美洲输出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为 400 万英镑，1825—1827 年增加到每年平均 6600 万英镑；1822—1826 年，英国向除巴西外的拉美国家先后贷款 10 次，共达 2100 万英镑，1870 年投资增加到 8500 万英镑。到 19 世纪末，拉丁美洲各国的主要经济部门，如中南美洲的热带作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智利的硝石和铜都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1850 年，英美两国签订了《克莱顿——布尔瓦条约》，两国共享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权利。若运河开通可使美国从纽约到旧金山的海路减少 9000 海里；1850—1855 年，美国在巴拿马修筑铁路。这些仅仅是美国要独占巴拿马运河的开始。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物产丰盛，适宜种植甘蔗、烟叶，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和地下矿藏。1817 年糖产量已达 7 万吨。古巴也是美国资本扩张的重要目标。美国总统杰弗逊 1820 年就认为古巴是美国的“一个最有趣的补充物”。1823 年美国国务卿阿丹姆斯称古巴是“北美大陆的天然延续，”“古巴脱离西班牙后无以自立，只能倒向美国，根据与苹果落地相同的自然法则，美国也不能把它们从怀抱中推开。”

加拿大在 19 世纪上半期仍是英帝国的一小块殖民地。构成后来加拿大核心的新斯科舍和魁北克不过是英属北美广大地区的一部分。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加拿大在英属地界以内，除了少数位置适中的地点显出几分接近于美国的繁荣以外，所有的地方似乎仍是不毛之地，古老的蒙特利尔天然成为加拿大的商业都市，但是它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美国新建的布法罗城。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都是农业区的中心，有少量工商业以及皮毛贸易，沿海和内陆河流与湖泊里，渔产很丰富，许多居民从事渔业。在大湖和大西洋之间还有大片森林，它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建筑材料和车船的制造材料，因此伐木业、木材加工业较为发达，另外还有一些小型工业如面粉业、制革业等。1867 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它是加拿大采取联邦制以及加拿大独立的开始。随着 19 世纪的进展，小麦日益成为加拿大的重要农产品。小麦产区在加拿大中部。要发展小麦的生产就得筑一条从东到西的铁路，把加拿大的中部地区和大西洋的沿岸地区连接起来。1871 年，英属哥伦比亚省同意加入加拿大自治领，唯一的条件是十年之内要修筑横贯东西的铁路线。从此，加拿大兴起了建筑铁路的浪潮，从而也使加拿大经济迈入了快速增长的里程。

3. 埃及等非洲国家和澳洲等国家近代后期经济

（1）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经济

埃及在 19 世纪上半期虽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穆罕默德·阿里已成为埃及的最高统治者。阿里在 19 世纪前期对埃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经济改革使尼罗河三角洲地带资本主义关系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1814年，阿里正式宣布废除包税制，将全部包税地收归国有。被没收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属阿里所有。阿里把一部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每户农民可得土地3~5费丹，约合19.5~31.5亩，租种土地的农民必须每年向政府缴纳定额的租税，违者则停止其租佃。阿里把大量土地分赐给王亲国戚、政府官吏和地方豪绅，使他们成为新的地主阶级。阿里改革了原有的赋税制度。在包税制度下，赋税没有统一规定，由包税人任意决定。阿里把包税人过去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赋税合并为一，统称土地税，规定只向农民征收土地税，税额按土质好坏和灌溉条件而定。税收制度及其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适应农业发展，阿里非常重视水利灌溉事业，他修缮和兴建灌溉系统，改良耕种方法，播种面积由1820年的203万费丹扩大为1833年的312万费丹；棉花收获量由1831年的4.20万包增加至1835年的10.40万包，甘蔗、蓝靛、生丝、小麦和稻谷产量都有增加，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阿里推行国家强制征购农产品和垄断对外贸易的政策，鼓励输出谷物以换取工业品。到1836年，政府已控制总出口额的95%。1816年，规定手工业产品由国家专卖，促使旧有手工业行会的解体，便利了新式工业的发展。阿里特别重视发展军事工业，效仿西方建立硝石、火药、造船等工厂，其中以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占地60费丹，有职工5500人，分成15个车间，主要制造战舰，并有维修机器的车间。同时，阿里也注重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1818年创办第一批纺织工厂，据1829年统计：各工厂共有纺机1459台和织机1215台，机器主要从法国进口，同时，制糖、榨油、造船等近代工业也发展起来；1840年全国约有3.50万工人。为了加速工业发展，阿里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从西方购买了大批机器，聘请了许多国外技术人员，吸收外国资金，并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阿里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建立了新式企业，发展了经济，扩充了军队，并开始向外扩张，埃及先后占领了苏丹和叙利亚，并打败了宗主国土耳其。英国唯恐埃及强大，1840年出兵贝鲁特并迫使埃及签订《英埃协定》，规定埃及缩减军队并实行协定关税，埃及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埃及军需订货减少，主要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工业衰落；同时，英国利用英土商约，大量输入廉价商品，使埃及的新式企业纷纷倒闭。棉花等原料输出增加，一些商人深入农村，低价预购尚未收摘的棉花，1840年棉花的收购量为15.90坎塔尔，约合714万公斤，1852年增加至67万坎塔尔。1851年英国获得修筑亚历山大至开罗铁路的特许权，不久英国即开始建设贯穿尼罗河三角洲的铁路，架设电报线，建立商船队。1856年法国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开工，1869年完成，全长182.5公里。运河的开凿大大缩短了欧亚航程，埃及为此有12万人献出了生命并担负了1600万英镑的开凿费用，而欧洲国家只付出了400万英镑。埃及为了支付这笔费用被迫大量从国外借债，1862年一次即达到329.30万英镑，埃及也因此因此在财政上依赖外国资本。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影响了欧洲纺织工业用棉的供给，工业化国家从埃及大量进口棉花，棉花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棉花生产；与此同时，西印度群岛发生种植园危机，蔗糖产量下降，因此，埃及同时扩大了棉花和甘蔗的种植面积，使埃及的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埃及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已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心，亚历山大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埠之

一。1860—1876年，埃及铁路线从200多公里增加到1800公里。但是偿付外债已成为埃及国家预算的主要支出，埃及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以前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经济国家。1834年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的殖民地。1844年和1846年，法国殖民者两次颁布法令，要求长期以来根据习惯获得土地的人呈缴文件以证明土地所有权，从而没收了大量土地。法国政府将没收来的土地交给法国商人、军官和垄断公司，建立了种植园。1853年成立的日内瓦公司占有2万公顷土地；1862—1863年，30多个殖民者获得了16万公顷森林地。1870年法国殖民者所占土地已达76.50万公顷。阿尔及利亚的农民或者变成种植园的工人，或者租种地主或殖民者所占土地，农民所得收获量仅有1/5—1/10。与此同时，法国将大批本国人和欧洲人移入阿尔及利亚，1833年移民只有约8000人，1860年增加到20万人。从1851年起，法国把阿尔及利亚的关税和法国统一起来，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市场的一部分，法国商品充斥阿尔及利亚市场，排挤了当地手工业生产。法国资本掌握了阿尔及利亚全部的航运业、铁路运输业、银行业和对外贸易。法郎成为阿尔及利亚的货币单位。19世纪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是一个贫穷的经济落后国家，1868年的大饥荒有30万人死亡。

突尼斯19世纪上半期开始进行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1846年宣布取消奴隶制；1857年规定一切臣民不分信仰一律平等，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等，这些措施促进了突尼斯经济的发展。但是，宫廷挥霍和官吏贪污造成财政困难，军备支出的增加使国库空虚，统治者为了弥补开支，除在国内征收新税以及垄断贸易外，大量举借外债。1863年和1865年，突尼斯政府以关税收入为保证，两次向法国借款。1867年，突尼斯发生灾荒，宣布暂停偿付外债。1868年，法、英、意三国对突尼斯的财政实行监督，三国组成了“财政委员会”，将突尼斯的债务清理为1.25亿法郎，其中借自法国的款项约占80%。突尼斯每年所付利息占国家收入的半数以上。外国资本借此不断渗入突尼斯，法国和英国资本家取得了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建立自来水厂的特权。外国资本的扩张，一方面冲击了突尼斯的自然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突尼斯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并为以后的军事占领准备了条件。

摩洛哥和突尼斯一样在19世纪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对象。1836年美国取得在摩洛哥的治外法权；英国则不仅享有治外法权，而且还干涉摩洛哥的关税自主；1844年10月，法国与摩洛哥签订了《丹吉尔条约》；1859年，西班牙迫使摩洛哥于1860年割让伊夫尼区，1861年又迫使摩洛哥接受不平等商约使摩洛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摩洛哥虽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实际上已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

埃塞俄比亚在19世纪初已分为绍阿、底格列和阿姆哈尔等6个独立公国。1854年哈萨取得阿姆哈尔政权并征服格烈和绍阿，并于1856年自立皇帝，称提奥多二世（1856—1868年）。提奥多实行了广泛的改革，取缔奴隶贩卖、改进税制、税赋征收集中于皇帝、从欧洲招聘工人和技师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经济的发展和统一政权的巩固。

（2）西非、中非、东非、南非以及马达加斯加经济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向非洲内陆扩张的时期，为了开辟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本主义各国的“探险家”在1801—1870年间探险活动达70多次，他们调查了刚果河、尼日尔河、尼罗河流域和中非大湖地区的情况。30年代

英国人理查·兰德尔从布萨沿尼日尔河直达大西洋，证明尼日尔河与乍得湖并不相通；英国传教士利文斯登在 1841—1873 年间长期在非洲活动，他是第一个从东到西穿越非洲大陆的欧洲人。各国殖民者踏着探险家和传教士的遗迹从沿海出发向非洲内地扩张。英国在黄金海岸、冈比亚和塞拉勒窝内实现殖民地经济统治后，进而将拉各斯以西地区变成其保护地；法国殖民者沿塞内加尔河向内地扩张，先后迫使部落酋长签订条约，将加蓬、中央刚果、乌班吉沙立和乍得等地为殖民地；还廉价购买了几内亚的一部分，称为法属几内亚；德国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对非洲内陆进行经济扩张，汉堡和不来梅商人积极进行贸易和经济调查；美国于 1817 年成立“殖民协会”，在其它欧洲工业发展国家认为奴隶贩卖阻碍工业资本发展因而禁止奴隶贩卖的同时，美国为了发展种植园经济使奴隶贩卖兴盛起来，1808—1860 年间运入美国的奴隶即有 50 万。1822 年，美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与西非酋长达成交易购买一块土地，用当时总统门罗之名命名为门罗维亚，以后又迁入一些美国黑人建立了利比里亚殖民地。南非是非洲的一颗明珠，1814 年，英国在《巴黎条约》中以约 600 万英镑代价换取了荷兰承认英国对南非开普的殖民统治。1819 年，英国政府开始资助移民迁往南非，1820 年英国移民已达 4 千人；英国殖民者以 1806 年占领的开普殖民地据点，向东北、北部、西北扩张。1828 年，英殖民当局颁布改善有色人种的第 50 号法令，通过补偿奴隶主释放奴隶，从而为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英殖民者输入美利奴种羊，替代了本地的肥尾羊，使开普殖民地向英国出口羊毛剧增，1822 年为 2 万英镑，1862 年达到 2500 万英镑。1867 年，奥伦治河岸发现金刚石矿，大批欧洲移民进入这一地区，并在奥伦治河岸建立了新城市金伯利。他们建立许多股份公司，强迫当地居民为他们采掘。为了垄断金钢石产区，英国在开普的殖民当局从 70 年代起兼并了大片南非土地。1871 年吞并了金刚石产区西格利加兰。

马达加斯加在 19 世纪初已形成强大的伊默利那国家并奠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统一的伊默利那国家积极进行改革、发展经济，到 19 世纪后半期，在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如土地准许买卖、农村公社开始瓦解、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开始确立等等。英、法在 19 世纪初期就开始对马达加斯加的资本主义扩张，先后占领了东部的几个岛屿并同时取得了通商的权利。马达加斯加 70 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法国殖民地经济的一部分。以乌干达为代表的东部非洲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地，但已开始建立了一些商站，资本渗透已在进行之中。

（3）澳大利亚、新西兰经济

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海运畅通，从英国流放到新南威尔士的人数增加。他们经过几年苦役之后，获得自由成为当地公民并可以获得土地。同时，许多自由移民也开始向澳大利亚迁徙，他们也可以获得土地。澳大利亚的许多地区是沙漠地带，但还有许多地区土地肥沃，足可发展。19 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的经济有缓慢的发展，那里有广大的地区适合发展养羊业，当时英国的毛纺织业正需要大量羊毛，养羊业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兴旺的主要基础。随着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经济的发展，“1817 年，商人和较富有的移民联合创办了新南威尔士银行。两个殖民区的贸易都增加了；羊毛源源不断地由悉尼输往英国；鲸鱼油和海豹皮也都是成功的输出品；腌猪肉、檀香和海参的贸易获利越来越大。新南威尔士的

移民在亨特河地区，在巴瑟斯特地方，在卡姆登西南朝向莫斯——维尔地方，并沿着南部海岸由伊拉瓦腊至杰尔维斯湾从事耕作。”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在澳大利亚先后建立了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三个殖民地；50年代相继建立了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两个殖民地。1851年10月15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发现金矿，移民大量涌入，1851年以后的10年之内，澳大利亚移民人口从40万人上升到100万人以上。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有寻金人争先定购往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船票。已到加利福尼亚参加采金的澳大利亚人也试图返回家乡；有些美洲人认为在他们那里，象1849年那样兴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也乘船来到悉尼或墨尔本。1855—1856年开始有大批中国人来到维多利亚金矿场。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853年，一个美国商人G·F·特雷恩来到了墨尔本，想在金矿场经营企业，他从美国带来了一部底有弹簧板的、供长途行驶的马车，很快就改善了墨尔本与悉尼以及与各矿场之间的运输。1854年，第一列火车行驶于威廉斯敦和墨尔本之间；1855年，郊区火车开始在悉尼行驶；1862年，维多利亚政府已修筑从墨尔本到巴拉腊特金矿场以及到本迪戈金矿场的铁路；1864年，又将后一条铁路延长到墨累河畔的厄丘卡，以便把里弗来纳区的羊毛和小麦以及沿达令河和墨累河运来的新南威尔士西部的羊毛运到墨尔本港口，而不必运到悉尼；1856年10月，“伊斯坦布尔号”开通从伦敦至墨尔本的航程；1858年10月19日，悉尼、墨尔本和阿得雷德之间的电信交通网架设完成。1861年，新南威尔士议会通过了两个法令——土地让渡条例和土地占用条例。从1862年1月1日起，任何人可以购买40—320英亩皇家土地（市镇土地、郊区土地或已被正式宣布的金矿场除外），地价每英亩20先令，但须先付地价25%作为定金，在3年内向殖民区财务主管结清余额，并提出改良土地的措施。接着，在维多利亚、昆士兰以及南澳大利亚等地先后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淘金狂潮低落以后，许多新到的移民转向农业和牧羊业，澳大利亚逐渐成为世界上小麦、羊毛和肉类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新西兰远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1670公里以外，包括两个主要的岛屿，即北岛和南岛。北岛有相当稠密的由毛利人组成的农业人口，南岛人口较少。19世纪上半期，新南威尔士的商人和美国的捕鲸船到新西兰，但毛利人仍拒绝与其接触。1840年，英国组建新西兰公司，第一次运送移民到达新西兰，在北岛建立了奥克兰城和惠灵顿城。英国政府宣布新西兰属于英国，并同毛利人族长签约承诺毛利人可以拥有他们不愿出卖的任何土地。此后，英国移民大量涌入并很快在数量上超过毛利人，1867年前后，总数超过17万人。他们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职业，羊毛、肉类和奶制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和经济发展的支柱。

